

#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二期

## 要目

時事評論	從吉田內閣觀測日本政局的發展……海	康君明
	印度問題之新僵局……	康君
	巴黎外長會議之又一幕喜劇……	鶴君
	滿庫黃金遍地工潮……	康君
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	陳人白	
維新與革命……	唐虞世	
波茨坦會議與德國問題……	西岑	
戰後世界經濟特徵……	竹雲龍	
戰後蘇聯之經濟……	劉少嚴譯	
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	李季·歐伯	
論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	冰夷編譯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	朱維基譯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李毓鏞	
大時代的小船(小說)……	謝少翁	

求真雜誌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一日

A. B. C.

# 標準工裝

質料上等 式樣美觀  
稱體舒適 一致公認

中國內衣紡織染廠出品

製造廠

商場

康定路一〇九九號

電話：三二九二〇

南京路五六二號

電話：九一〇六四一五

美國色必麗油漆廠

SUPERIOR PAINT & LACQUER WORKS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出品：各種油漆

美國亞美粉漆廠

ARMOR LABORATORIES INC.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出品：最新科學防水避潮可洗  
房屋內外粉漆

美國茂利藥廠

H. E. MAURRY BIOLOGICAL COMPAN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出品：各種最新維他命製劑及  
其他名藥

美國戈登化粧品廠

H. B. GORDON LABORATORIES  
HOLLYWOOD, CALIFORNIA, U.S.A.

出品：各種美容用品

美國威克斯輪船用具廠

WEEKS-HOWE-EMERSON COMPANY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出品：各種船上用具

美國北貨貿易公司

NORTH AMERICAN TRADING COMPAN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經營：進出口貨

美國中美貿易公司

CHINESE AMERICAN TRADING CORP.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A.

經營：進出口貨

# 遠東總經 同昌洋行

## 總行

上海四川路三二〇號

郵政信箱：一九六八

電話一九五四〇

電報掛號 四二九九 (英文) "Tonywong, SHANGHAI"

美國 126 South Front St., Mankato, Minn., U.S.A.

## 分行

香港 德輔道西三四號

廣州 沙基路一七八號

# 樓酒大樂康

旨 要 務 服

號六五四路西京南

四八六二三 話 電

點茶菜酒西中

品飲熱冷種各

堂禮事壽事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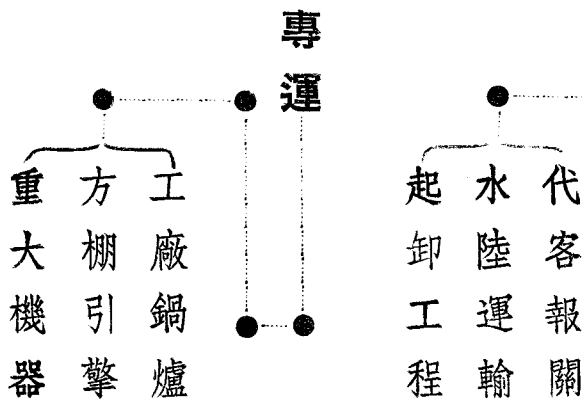
# 行 輸 運 富 華

HWA FOO TRANSPORTATION CO.

電

話

九 九  
七 六  
七 五  
二 四  
七 二



事務所：漢口路四五五弄五號

# 求 真 雜 誌

第一卷 第二期 目錄

## 時事評論

從吉田內閣觀測日本政局的發展……………海明(四)

印度問題之新僵局……………康君(五)

巴黎外長會議之又一幕喜劇……………鶴臯(七)

滿庫黃金遍地工潮……………康君(八)

密勒氏評論報論中國農民騷動……………康君譯(九)

## 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

維新與革命

補白：失掉『紳士風度』的苦戰

## 波茨坦會議與德國問題

戰後世界經濟特徵

戰後蘇聯之經濟

## 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

行不得也哥哥

回頭是岸

論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

英國詩歌發展三個的階段(續)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續)

大時代的小船(小說)

旅途隨筆(自重慶到上海)

『勝利』在珠江(廣州通訊)

編後餘談

海明(四)

康君(五)

鶴臯(七)

康君(八)

康君譯(九)

陳人白(一三)

唐虞世(二二)

西岑(二六)

竹雲龍(二九)

彼得F·戴勒喀著·劉少嚴譯(三四)

李季(四一)

歐伯(四三)

冰夷編譯(四七)

英C.考特威爾著·朱維基譯(五七)

李毓鏞(六二)

謝少翁(六八)

蘇閑(七七)

劉朝真(七九)

編者(八〇)

# 時事評論

## 從吉田內閣觀測日本政局的發展

日本大選已於四月十日舉行，按照民主政治的常軌，當選的多數黨應即進行組閣，而舊內閣也應該辭職退讓。但這次日本組閣竟延遲如是之久，波折竟如是之多，直至美國的統治當局已表示不耐煩，民衆的不滿已日漸增長，幣原內閣經過再三躊躇考慮之後，才勉強抬出一個吉田來；以日本官僚政治之特有方法，把他栽在所謂自由黨上面，負起組閣的責任。但吉田一上台，便引起一連串的反感，甚至連最穩健的觀察者，都認定他只是幣原的化身，他的內閣壽命將很短促。

日本這次的內閣危機究竟含有什麼意味呢？牠反映着日本目前的嚴重的社會和經濟的危機！吉田上台之翌日立即聲明日本當局唯一的任務是解決糧食問題。是的，這個問題是日本目前最急迫的問題之一，但與牠有密切關連而其嚴重性不稍減的問題還多着哩。吉田絕口不提，這就表示他一定要繼承幣原的敷衍作風，僅僅做一些浮面功夫而已。譬如幣原曾費盡了一切氣力，從麥克阿塞方面取得一道命令：准許日本用物物交換的方式輸入糧食。但這與其說是一個解決辦法，還不如說是在這個問題之外再牽出另一個嚴重問題來：日本用什麼東西去交換糧食呢？她的工廠已大多數停工或遭受破壞。工業的停頓與失業恐慌之遍及全國，再加上幾百萬海外軍隊的復員和通貨膨脹的過分刺激，日本食糧問題的緊張，在往後幾個月內，勢將達到異乎尋常的境地。

怎樣才能解決食糧問題？怎樣才能替日本的工業開闢一個國內市場？怎樣才能減少日本失業人口的壓力？稍為對日本的社會和經濟狀況有過研究的人，無論日本人自己也好，外國人也好，終歸會得出一個結論：主要是日本的落後的農業制度防礙着這些問題的解決。日本大部分耕地落在少數地主的手裏，他們則過着都市的寄生生活，把土地零碎地租給農民，而在細分的土地上，農民也只好運用最原始的耕作方法。此外還有佔百分之六十以上未開墾的山林原野，差不多全部操縱在皇室手中。這就是日本一貫糧食不足，國內市場狹隘，人口壓力年年增長的基本原因。

日本統治者以皇室爲代表，本身就是地主兼資本家，這次麥克阿塞調查天皇的財產所暴露的正是這一點。他們一方面採用最新式的工業生產方法，另一方面則儘可能保持最落後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在農業方面）。這兩者的奇特結合就是日本天皇制統治的秘密。你能希望這個統治階級自動的改革農業，分配土地給農民嗎？這等於你希望牠能自動放棄天皇政制，將政權交還人民一樣渺茫和荒唐！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統治者一代一代的碰到上述的幾個問題時，便得出日本必須向外侵略的結論。今天的幣原和吉田只不過用反面的方法來辯解吧了。他們認爲這些問題之所以發生，是在於日本的戰敗！失去了殖民地和向外擴張的機會。

我們對吉田內閣沒有幻想，事實上他對自己的能力也沒有多大幻想。他所代表的自由黨就是往日最反動的政友會的化身，他的閣員就有不少是幣原的前任同僚，他將來的成績又那能超出幣原之上呢？日本國內的社會和經濟危機今後愈是緊張和尖銳化，日本的統治者將愈表現出無能和優柔寡斷。日本民衆在無出路的状态中，將迅速恢復他們原有的戰鬥精神。這次大選結果雖然是資產階級政黨占了上風，但社會黨的躍居第二位却準確的指出：日本民衆已開始走向左方。儘管社會黨的領袖們在戰爭中曾表現過如何可恥的投降，竟担当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馬前卒；又儘管這個黨過去如何出賣自己的羣衆，現在又如何盡一種欺騙和叛賣的作用（牠的黨綱竟不敢提出推翻天皇制度！）但牠的標榜社會主義而現在數目相當大的民衆把幻想放在牠上面却是事實，那末，牠之迅速膨脹起來無論如何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象徵！

下一階段，即使可能經過幾度資產階級政黨的組閣，但牠們將一個一個的暴露自己的束手無策，民衆將勢必把左面的政黨——社會黨或社會黨與共產黨的聯合——推上政權，社會黨之流將試用一切改良的半吊子的辦法來挽救日本資本主義的統治——甚至天皇的統治！牠們將設法築一道『民主陣線』之類的大堤擋住日本民衆走向真正社會改革的高潮。這是未來日本政局發展的遠景。

我們當然不能忽視美國的軍事當局，牠雖久已宣稱要把民主主義賜給日本，但牠今天却又忽然發現日本實現民主政治『尙言之過早』！因此，牠今天所唯一能够做的只有：去掉一些對美國過於危險的事物，儘可能把日本的統治階級加以再教育，使牠徹底屈服於華盛頓，當牠險遭民衆推翻的時候，儘可能的實施一些救濟或改良，甚至威嚇，希望把日本民衆永遠限制在『中庸』之道上，總而言之，牠想在日本民衆的澈底的社會改革運動過程中，充當一個最後的安全塞。但問題在這裏：日本民衆不經過澈底的社會改革，又怎能找到出路呢？歷史久已證明：任何彌縫的政策，其最優良的結果都不過是把問題拖延到不久之將來，來一個更難堪的爆炸而已。不幸美國在日本和這個地球的其他部分所實施的正是這種政策！（滙明）

## 印度問題之新僵局

由於國民大會黨之要求設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回教聯盟則堅持巴基斯坦（獨立分治）運動，致使西姆拉會議於十二日正式宣佈破裂了。隨着這會議的破裂，尤其隨着糧荒之逐漸嚴重（據路透社廿一日電：出席糧食大會之印代表稱，胡佛赴印視察後，認爲印度於五月至九月間，至少須輸入糧食二、三三六、〇〇〇噸），又使『印度已面臨數月前海軍譁變以來之最嚴重危機』（合衆社十二日電）。老朽無能的大英帝國，在印度革命的威脅之下，已經懂得不能再沿用一貫的直接統治政策了。她必須被迫對印度資產階級（以甘地、尼赫魯爲代表），表示讓步——即使是表面上的讓步。艾德禮首相宣佈主張成立印度聯邦，設立中央行政機關及全印議會，就是爲此。

可是，與此同時，英國印度事務部大臣勞倫斯又宣稱：駐印英軍將繼續留印，協助維持治安，直至憲法完成，政權移交後爲止（中央社新德里十七日電）。這正如邱吉爾所批評的一樣，是『首先以決定印度憲法之責任，自印度各黨（應該說：自印度人

民——作者）移至政府……吾人不能用英國兵力，違反印度任何一黨之意志，強制其施行英國製憲法」（聯合社十六日電）。他這幾句話雖然主要是贊真納抱不平，替世代相傳的「分而治之」政策之放棄表示惋惜，但另一方面却暴露了「建議書」的價值：即使憲法完成，也只是「用英國兵力，強制執行的英國製憲法」。這證明英國今天允許印度的自治政府，還遠比不上加拿大和南非聯邦那樣的自治領呢！即使將來「政權移交」給國大黨資產階級，最多也只是表示英國從直接統治印度，改由其代理人間接地統治而已。

但英國這一「讓步」，馬上使甘地沾沾自滿，樂不可支了；他認為「英內閣代表團的成就是可以自豪的」（大公報十八日電），而且，「表示英政府宣佈之方案，為印度史上重大之舉」，「希望羣衆保持鎮靜，勿受極端份子之誘惑」（路透社十九日電）。這證明他底「道德上」厭惡暴力，正是反映出印度資產階級在自國羣衆面前的恐懼心理。在印度羣衆反英運動到了飽和點的今天，他們固然不願和英國同歸於盡，因而要利用羣衆的壓力，去和主人——英國做筆買賣；但另一方面，他們害怕羣衆，比害怕其主人還要厲害，所以除了力勸人民「鎮靜」外，不能不「授權該黨主席阿薩德，往訪勞倫斯勳爵……希望能獲得保證」（路透社廿一日電）。主人能够「保證」奴隸的獨立，當奴隸沒有力量時，可不會取消以前的「保證」嗎？顯然，迫使英國讓步的，是孟買暴動所反映出來的羣衆壓力，絕不是甘地的「不抵抗」的「絕食」；同樣，唯一能够「保證」印度獨立的只有印度人民，絕不是牠自己的主人——正陷於解體而作臨死掙扎的英帝國主義。

印度資產階級這種投機取巧、希望廉價地和平地從英國主人方面收回「政權」的心理，唐寧街的統治者是非常明白的，牠正在有系統地利用他們去催眠印度的民衆，準備在最不得已的時候，與這些候補的奴隸總管結成聯合戰線去平服印度的反叛。英國此刻第一步顯然仍在希望用冠冕堂皇的「允諾」和談判，去阻緩及癱瘓印度民衆的過於尖銳的情緒，她仍在玩弄陰謀，把「獨立」的蘋果高高地懸在天花板上，讓印度的資產階級——地主去爭吵，真納要分割一半，甘地和尼赫魯要全吞或至少一大半。好的，這種永無了結的爭執，首先可以延緩獨立的實現，其次可以讓英國把獨立延緩實現的責任推到印度資產階級身上（在這個資產階級內部，真納又和甘地互相推諉），最後，還可以讓印度的奴隸們發生混亂和迷惑。你們不相信麼？瞧吧，英國的軍隊不但沒有退出印度，反之，莫斯科廣播稱，「據悉印度警力已予增強，監獄已予擴大」（路透社廿三日電）。這種詭計甚至迫得印度的候補的奴隸總管也以一種不合慣例的口氣說話了：「大會黨執委會決議……臨時政府及最後之憲法，必須完全承認印度獨立之原則……英軍仍駐在印度，即無異否認印度之獨立」（路透社廿五日電）。

但，儘管印度的上層在爭吵，今天印度之客觀上需要完成民族獨立統一的任務，已成了全體民衆所深深了解的了，真納所堅持的分治主張，實際上只能幫助了英國。印度的宗教成見和爭執早已在經濟利害衝突之前黯然無色。例如西北部的農民，大都是回教徒，而地主則多數是印度教徒；他們宗教上的不同，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印度教徒地主壓迫回教徒農民的表現。前幾天在舊德里發生了印回教徒間的暴動，「據警察局公布，此次暴動係因回教徒青年所牧之羊，誤入印度教青年之足球場而起」（聯合社廿



日電)。這雖是小小的衝突，但仍具有很大的象徵意義，牠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單純爲了宗教信仰不同之故。而且印度工農從來就沒有以宗教爲基礎，分成印回兩種工會或農會，這是雄辯的事實，證明印度的下層民衆是在共同的經濟與政治利益的基礎上統一起來的，其實也只有共同的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基礎上，才能統一民衆去爭取最後的民族獨立！這也是印度民衆目前唯一的出路。我們相信印度民衆在土地革命，八小時工作制與國民會議的鬥爭中團結起來，遠遠超過了「巴基斯坦」之類的虛幻要求，而真納所虛偽地担心的少數民族利益，也只有在這種鬥爭的光輝之下才能得到解決。（康君）

## 巴黎外長會議之又一幕喜劇

從四月杪至五月中旬，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外長會議，幾乎全同去年九月的倫敦外長會議一樣，又是以一幕互相爭吵而毫無結果的喜劇收場！而且收場後，爭吵過的雙方也同以前一樣，都各自將會議失敗的責任譏諸對方，盡量互相攻訐，好像歷史專在開玩笑，有意要讓在這些會議上演過的角色，各自互相暴露其真相似的。

這次的巴黎外長會議，據最初宣佈，原是為了專門解決意大利的問題。但後來貝爾納斯提出了奧國問題，法外長皮杜爾提出了德國魯爾區問題。最後，貝氏又提出了『對德草案』。在對所有這些問題上，英美和蘇聯都站在完全對立的地位，而法國則搖擺於兩者之間。一方（蘇聯）故意提高條件，另一方（英美）又故意降低條件或另提條件以抗之。於是，討價還價，勾心鬥角，爭來爭去，簡直有如一個交易所，但結果總沒有一筆像樣的買賣成交。現在讓我們來略一檢視經過的情形吧。

當討論處置意大利的殖民地問題時，最初莫洛托夫要求蘇聯主管意屬北非的的黎波里，貝文則強調的黎波里的『自主』或『獨立』以對抗之。貝爾納斯主張聯合國託管，而皮杜爾則提議在聯合國託管下，讓意大利保持這殖民地的管轄權。隨後，莫洛托夫轉而贊成皮杜爾的提議，貝文則同意貝爾納斯的主張，結果仍然是兩派對立，無法調和。在這個問題上的實際意義是：蘇聯企圖利用解決的黎波里的問題來干擾英國在地中海上的霸權，而英國則認爲『意在切斷大英帝國之咽喉』（貝文語）。

在特里雅斯特問題上，蘇聯堅持將該港及其腹地割給南斯拉夫，爲的借此謀取自由進出地中海的港口。而英美則主張由聯合國託管，至多也只割一無港口設備之部份歸南國（還得經過當地的居民投票）。在賠款問題上，蘇聯要求意國賠償三億元（一億元歸自己，兩億歸匈保），企圖以此增厚自己及其保護國的經濟力量。但美國却認爲意大利根本無款，現時尚須依靠向美借款維持，美國當然不容許以自己借給意國的款來賠償蘇聯。關於魯爾區問題，法國由於歷史上的『恐德病』，主張將該區從德國割讓開來，由聯合國託管，蘇聯站在法國方面。但現時正在佔領魯爾區的英國，却認爲該區在政治和經濟上都不能同德國其他部份分離（實際上是怕蘇聯藉聯合國共管之名而伸張其勢力於該區），應當謀取總的解決。因而美國便乘機提出了謀取總解決的『對德草案』，英國自然贊成，但蘇聯又堅決起來反對了。因爲要總解決德國問題，就無異於叫蘇聯的軍事力量退出德國，好讓美國的經

濟力量來填補它。至於美國之提出解決奧國問題，名義上雖說是爲了開放多腦河的交通，以便恢復中歐及東南歐的經濟生活。而實際上却也顯然是企圖解除蘇聯對這一地區的軍事統治，讓英美的經濟勢力逐步去代替它。所以蘇聯也就乾脆地拒絕了。巴黎的外長會議，便是在如此這般的利害矛盾，勾心鬥角而陷於極端僵持的局面下，大家勉強『到盧森堡宮喝一杯酒』閉了幕的。

跟着巴黎外長會議的閉幕，蘇聯的『輿論』，立即以憤慨的口吻向英美發出責言：『巴黎外長會議的失敗，乃由於英美兩國採取「著名的原子外交政策」所致』（『新時代』）。『美國外交之新傾向，即在世界各地建立根據地之鎖鏈，以謀控制世界』（『真理報』）。但差不多同時，美國范登堡乃以極堅決的語氣提出『警告』，謂『美國決不犧牲她的原則，向蘇聯讓步』（大公報紐約特派員廿二日專電）。而美國的『輿論』則大肆頌揚貝爾納斯在巴黎會議上的『堅強政策』，說『巴黎外長會議的最重要結果，或者是給貝爾納斯增添了新的力量……』（二十一日紐約前鋒論壇報）。於是『增添了新的力量』的貝爾納斯起來廣播了。他以一種抑制却堅決的口吻斥責蘇聯。說它無理地向意大利要求賠款；壟斷了中歐及東南歐地區，視奧國爲衛星，希圖一意擴張勢力，威脅世界和平。因此，他主張美國『必須發動攻勢』，并聲言：『吾人決爲爭取歐洲近東及其他地區之政治及經濟和平而奮鬥』（見貝氏廣播全文——載廿二日大公報）。這就迫着莫洛托夫也不得不發表聲明。他帶着受屈的控訴口氣說道：『對意和約問題的失敗，其主要責任在英美方面』。『在意大利賠款方面，吾人又遭遇英美集團之阻撓。英美集團決定採取者，非「和平進攻」，而爲對蘇聯的攻勢』。『美國若干政界人士與英國方面之友人形成一集團之後，正謀在世界各地建立海空軍根據地。若干國家內，提倡新帝國主義霸制世界現在已獲得極大勢力，刻正宣傳擴張計劃，并挑撥侵略戰爭』。『英美擬使大小各國之經濟，盡入其勢力範圍之內，以所謂經濟協力，作爲達到此種目的之工具』（見莫洛托夫對記者演詞——載廿九日時代日報）。……

人們看到了這次巴黎外長會議的喜劇所暴露出來的，英、美和蘇聯關於歐洲問題如此不可調和的矛盾，以及會議失敗後雙方『輿論』的指責，尤其是貝爾納斯和莫洛托夫間的互相推諉和攻擊，將得到何種教訓呢？所謂和平機構的『聯合國』，能够藉着這類的會議以解決這個世界的根本糾紛問題而維持和平嗎？英美和蘇聯間這種日益生長和加深的矛盾，能否不致走到新的爆炸點嗎？像這類的喜劇老是導演下去，能否避免悲劇之出台嗎？倘使全世界的民衆不澈底覺醒過來，不積極用自己的力量起來干涉，來解決這個世界的根本矛盾和糾紛，我們認爲答案將是否定的。（鶴皋）

## 滿庫黃金遍地工潮

羅斯福總統任內所嘗試的『新政』，雖然耗費了幾百萬萬元以圖緩和一下社會的危機，但實際上這嘗試終於失敗了。而遠自『新政』實施時起，規模愈來愈大的工人罷工就很少間斷過。在那時及以後的戰爭中，罷工全都是因戰爭工業的畸形繁榮而引起的。戰爭結束後，美國的軍事工業都要轉變爲和平工業了。但這種轉變是非常艱難而遲緩的，結果大量的軍需工廠倒閉，失業隊伍

更加擴大，通貨更加膨脹，使美國工人突然感受到失業的威脅，好像馳騁着的馬碰了壁一樣，致使罷工的浪潮特別來得兇猛了。緊隨着幾乎每次都有幾十萬人的一連串大規模罷工（汽車製造業、電器製造業、鋼鐵、拖船和正在休戰兩星期的煤礦工人等罷工）之後，全國廿五萬鐵路工人的罷工又爆發了。這罷工將使「全國幹線二十三萬五千餘哩的交通陷於停頓，原料及燃料無法運輸，外洋輪船亦將停航，國內重要工業均將關閉，全國經濟將隨之逐漸呆滯……」（聯合社十七日電）。這種此起彼伏、洶湧澎湃的大罷工，都不斷地充分證明了：美國內部的階級矛盾，愈來愈緊張了；整個美洲已趨向於歐洲化，就是說：她絕不是美麗可愛的和平「天國」，而是充滿尖銳矛盾和紛爭的火藥庫了。

美國在二次大戰中雖然得到了勝利，獲取了龐大的國際市場，但她能否消化這個勝利的成果呢？在今天看來，她顯然遭遇到歐亞所難以解決的種種難題：譬如一般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荷印、越南、印度、埃及和巴勒斯坦等），中國的內戰，整個星球的普遍的饑饉（據路透社四月十八日電：胡佛昨廣播稱，「世界三分之一，八萬萬餘人已受飢饉之威脅」），農工業因大戰破壞所引起的破產，大量失業，通貨膨脹，以及蘇聯為自保而作的對立行為……這些都不是美國在幾年的短期內所能解決的，而且以後能否完滿地解決這些難題，也是一個無法答覆的疑問哩！這說明美國耗去無量數的代價獲得的世界市場，却是殘破不堪、難於穩定而又日趨狹隘化的市場，今天她不但從其中得不到好處，而且還受了這個市場的內在矛盾所牽累，即是說，美國獲得世界霸權的一天，就是她趨於衰落的開始。現在她國內的不斷的大罷工浪潮，就是這種衰落的產品，這產品反過來又加深了她的衰落。

美國工人的罷工運動，顯然已經從經濟鬥爭發展到政治鬥爭的前夜了。杜魯門總統在鐵路工人罷工之翌日，一方面要「命令美國軍隊接收」，一方面又向國會演說：「此並非勞資糾紛之問題。事勢現已演變至以政府為對象之罷工。此項工潮如任其持續存在，政府勢將宣告解體」（美國新聞處廿五日電）。美國政府居然應用戰時的方法來對付工人，遲早要迫得他們走上與政府公然對立的地步的。至於美國工人轉向政治鬥爭的速度，則多份要視歐亞矛盾爆發之速度而定。如果美國不能迅速而順利地恢復世界的市場，那她的工業便無法復興。美國的統治者不能解決國外問題，自然也不能解決國內問題。因此，美國統治者以改良和民主的奢侈方法來維持統治愈少可能，則美國工人對改良與民主的拜物教式幻想便愈容易打破。美國陸軍之不斷地接收罷工工廠，尤其是美衆院在五月廿五日通過的阻止罷工緊急法案，充分表明民主的範圍已愈來愈縮少，而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則愈來愈接近了。

固然，美國直到今天還沒有徹底代表工人自己利益的政黨。他們還是在資產階級的兩大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選擇其一來投票。但美國工人在全世界工人中是從沒有遭遇過嚴重的失敗，而新生的戰鬥力又是最富於朝氣，最龐大可驚的（據聯合社華盛頓本年四月廿八日電：民用生產管理局今日宣佈，三月份美國工業獲得勝利以來最大的進展……在業工人現約五千五百七十萬名，較二月份增加一百萬名），而且，如此大量的工人，又都是集中而有組織的。像美國的工業組織大會，現在已有五百萬會員，光是汽車工人聯合會就有一百多萬會員了，因而在本年二月前後，汽車及其他產業部門工人的罷工竟在一百三十萬人以上，這就是他們組織力量的表現和結果。即使他們的組織目前正被那些改良主義的領袖們所壟斷，但在無數的鉅大工潮中，具有高度

文化水平的他們，是不難漸漸發現這些『領袖』們的妥協、無能、以至叛賣，同時發現出誰才是堅決勇敢地代表自己利益的。總之，他們那種絲毫不可忽視的革命潛力，將會在世界上起領導作用。

我們從中國民衆的觀點看來，當然不能幻想美國六十家族那些大王們會真正地仁慈地幫助我們的繁榮和解放；我們最切實的希望，還是寄托在美國民衆未來的命運上面的。（康君）

## 密勒氏評論報論中國農民騷動

上週間，普遍而公開的腐敗、米價狂漲和農民暴動底記載，都隨着不宜而舉行的大規模內戰，隨着經濟狀況之急遽地更趨混亂，而成爲不祥之兆了。

關於公共機關腐敗的傳述，近來竟如此常見而普遍，以致牠們不再是『新聞』，每個人總可在中外報紙的字裏行間，蒐集到這一類的詳細記載了。在許多地方，這種情形使我們回憶起一九四四年那些黑暗的日子，那時，日軍突破了中央政府的第四戰區，經貴州省長驅北進，威脅了重慶本身。那時，許多公務人員之出色表現，並不是他們的愛國心，也不是他們正面和敵人勇敢搏戰，而是他們的貪婪，企圖在末日來臨以前，救護私人財富，置人民生死於不顧。今日的官場，也許又在害怕末日將近，且當仍可掠奪之時，就利用一切值得利用的形勢吧。

在這許多關於公然作弊的傳述中，最可恥的便是上週從昆明、天津和上海傳出來的消息；在這些地方，所有獨立觀察家都被官場莊嚴地稱爲『民主公開選舉制度』的滑稽劇所震驚了。毋須乎說，在每一場合，選舉都事先被人『操縱』，然後纔然再令人相信，宛似美國有組織的政治的行爲，在選舉場中實現了。『代書人』替那些不能讀和寫的選舉人寫選票，而在某些選區中，竟發現有脅迫及投純粹不正當選票於選舉箱的事情。既然選舉這樣公然欺詐，以致他們連表面裝做選舉的目的也不能達到，選舉就完全像是頗爲浪費的選任官吏方法了。

過去兩週間，在記載公務人員枉法貪污的小案件中，其中之一就是安徽省合肥縣長隆武功，據說他公然誇耀自己已有錢，因而被人控告挪用縣款法幣五萬萬元而被捕。但據新聞報載稱，單是湖北省就有三十二個縣長被控貪污罪待審判了，這證明上述安徽的事件并不是偶然的。●

雖然有些人希望把全國許多這一類的作惡官吏予以審判，但這最多只能是微弱的希望。某人某人將要受審判的傳說是多極了，但定罪和判決的記載却少得很。就算行將逮捕也是一種『懲罰』，這種懲罰似乎也只是加在小官吏的頭上吧。例如，本週北平來訊說，當地一政府銀行竟爲了一位『高』官動用國庫法幣一百萬另三千元購買禮物。事情雖已大白：這筆款耗用於酒、香烟、咖啡、銅樂隊和廁所用紙之類的東西，但當局并無急於實行取締的表示。

同時，上海居民聽到兩件牽連政府的重要醜聞了。一件是米的舞弊：十七個有權勢的米商，竟利用政府的米貸金（政府貸款的原意是讓他們運米來滬，藉以減少糧荒的），操縱上海市場，高抬早已過份了的米價。另一件則牽連到一個政府的代理機關，中央信託局。據本市報載，這個機關竟准許牠的食糖棧單在黑市中買賣。據說，每商人三袋的配給額，也不是嚴格遵守的，那些有「關係」的可以比法定配給買得更多。

假如想進一步明瞭公共和私人的腐敗，以及情形的不穩固，那人們只需讀讀本埠的中文報紙便够了，這些報紙每天都載有富商們愈來愈多地動身到香港去，在那裏，他們是不怕政府的檢舉和政府的強徵的。

也許一切記載中最困擾人的，要算浙江、江蘇和西康的農民暴動，以及廣東省的搶米暴動了。

據保守的中國時報說，浙江的暴動，乃是官吏苛政的直接結果。據說，成千成萬的農民，都以燒毀土劣的房屋，引起其他的騷亂，來表示他們對土劣的忿怒。暴動的中心是在寧平縣。

江蘇的騷亂，據載是出現於鄰近南京的常熟，該地的農民們都拒納軍米。最近的記載指出農民們都堅如鐵石，使當地收軍米的官員左右為難。

在西康的暴動中，報載有二十萬農民被殺死和創傷，據說，這是官吏企圖剷除烟苗的結果。據載天全、榮經地方的農民，當政府派遣第九十八師增援當地守備隊時候，他們便全體武裝起來了。

當上週廣州米價暴漲至每担法幣十萬元時候，發生了許多米店被貧民搶掠的事件。當地的慈善機關，一天內埋葬了五十三具餓死的屍體。

其他較少暴烈地表示國家經濟與社會結構底可憐狀態的，還有下列幾項消息：飢餓襲擊中的湖南人民，向當局和平請願，要求政府停止徵收軍米，且又要求准許他們遷居到其他省分去；成都急電稱二十三間烟廠悉數停工，對捲烟稅表示抗議；龍游來訊敘述大批人民正飢餓至死，並說及十六歲少女現在只賣得法幣四千元，這正是廣州以法幣九萬六千元還買不到一担米的時候呢。

雖然我們不能如此輕率地說末日是臨近了——在近代四千年當中許多人說過這種話，都已證明是錯誤了——但我們想，除非設法立即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醫治這國家的許多政治、經濟和別的病症，否則，在往後幾月間，騷亂、死亡和痛苦，將在中國歷史上達到一個新的高點。……

（康君節譯自密勒氏評論報一〇一卷十一期）

●像這種貪污的例子，我們可在報端上「俯拾即是」。拿今天（五月廿七日）的大公報來說，就載有這樣的一件「醜聞」：河南總共一百一十縣，交代不清的縣長，就有一百零一個。財政廳已登報通知，限期辦竣」云云。

●中國報載常熟一帶農民中現已盛行一貫道，其口號為抗租抗稅，反對收軍米。

●據五月十七日大公報成都電稱：「西康省……政府軍自保安司令張祿賢被殺後，陸軍第一百三十七師師長劉元察復率隊數團開往增援，現正進行激戰。劉師長被數萬武裝農民圍困於經城內，其勢至為危急。」——譯者註



HAND EMBROIDERED SILK

Underwear, Pyjamas, Kimonos, Lounging Robes, etc.

LINEN HANDKERCHIEFS

of all description for ladies and gentlemen

DECORATIVE LINENS

of all sizes Hand made Lace, Banquet sets,

PURE SILK SCARVES.

PHONE 18499

利 通 行

LEE TONG & COMPANY

專營手工業製成品出口

代理歐美名廠產品入口

== MANUFACTURERS & EXPORTERS OF CHINESE THINGS ==

行址：上海漢口路四五五弄廿七號

HOUSE 27, 455 HANKOW ROAD, SHANGHAI.

電報掛號 三 LEETONGCO. 三 電話 九六五四六  
 CABLE ADDRESS 三 SHANGHAI 三 PHONE 96546

# 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

陳人白

『取消專政』，『實現民主』，近來已成了我們全國一種最普遍的要求。不但一般民衆要求民主，一切在野的黨派高唱民主，就是當權的專政的政黨也被迫再三宣告要『還政於民』，預許『實現民主政治』了。不管將來的結果如何，這總算是一種差強人意的現象，是戰後唯一進步的現象，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來歷史開始表示轉換的象徵。

但要求實現民主，是一回事，而怎樣才能真正實現民主，又是一回事。在中國要求民主的呼聲，早在半世紀之前就已喊出了，甚至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招牌也已掛出了三十五年。可是，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不但真正的民主沒有能絲毫實現，反而人民大眾愈來愈陷於極端軍事專政的煉獄之中！這邊不值得今天要求民主的人們加以深省的反省，加以嚴重的檢討麼？要想現時正在開始的民主解放運動，不致重蹈已往的覆轍，首先便須對於『民主的真實內容』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尤其對於『怎樣才能實現民主』，須要有一個澈底的了解。但現在一般要求民主，高唱民主的人們，無論在其所發表的言論或政綱上，對此有關民主的最基本的問題，却不會有過明確的表示。最壞的是：甚至連認真探討的態度，亦很少看見。人們所慣於重復的，不是一些最普通的民主口號，一些缺乏內容的民主公式，就是把過去致使民主解放運動失敗的許多錯誤思想，改頭換面地重新散播開來。像這樣的情形，如果聽其繼續蔓延下去，民主解放運動的前途是不許樂觀的。

人們應當知道：中國當前的民主問題，決不是一個單純的臨時政治問題，這乃是落後國家一個遲延未決的『歷史任務問題』。要深刻而正確地懂得這個問題，至少又必須將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發展，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關係，以及與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關係，加以精確的分析和探討。然後才有可能從中抽出科學的結論，構成民主的綱領，以作民主運動的指南。其次，必須從先進國家的民主解放運動中去學得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須將我們自己近半世紀以來的民主改革運動的經驗加以科學的檢討，以便從中獲得真正的教訓；因為這教訓是我們自己犧牲了無數的生命

，償付了極大的代價，對於我們的民主解放運動的前途是具有決定的意義的。倘使對於『民主問題』不從這種嚴肅的態度和科學的研究上去求得理解，無論你主觀上怎樣渴望民主，要求民主，高唱民主，乃至不惜犧牲生命去爭取民主，但其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又是一幕悲劇的收場。在日常的生活上，人們也許偶然僥倖地獲得某種成果。但在廣大的歷史問題上，『偶然的僥倖』是絕不存在的。歷史是一個鐵面無私的裁判者，它總是將『勝利』（歷史進步性的勝利）判給那些理解歷史規律并忠實替這一規律服務的人們，而懲罰那些投機取巧貪圖僥倖的份子的。

現在既具有種種徵兆，足以預示中國歷史又快臨到一個轉換點，這就是說，現時已在開始的民主運動，有可能轉變到一個新的解放時代的前途。但先決的問題，必須有正確的理論（根據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民主解放運動的教訓）來指導行動。『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這已由近代全部歷史證明其為顛撲不破的真理了。誰能聆悟并運用這一真理，誰才能獲得未來勝利的錦標。

自然，關於民主問題的全部理論，以及近代民主解放運動的許多經驗和教訓，絕非一篇短文所能勝任發揮。但我們深望誠心從事民主解放運動的人們，對此加以嚴重的注意和認真的探討。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民主問題的內涵及怎樣實現這一民主的方法。本文的任務，只在將問題莊重地提出，并略予以闡究，希望由此引起大家來作進一步的討論而已。

## 民主的歷史根源及其意義

民主主義或民主運動，也同其它的社會現象一樣，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因而它的發生，發展和衰亡，都要受着歷史發展條件的限制。雖然由於各個民族或國家的歷史發展條件不同，因而其民主的內容及其解決的方法，不會完全一樣，但在本質上總是相同的。

民主主義（Democracy）的思想，本發源於古代的希臘，但在那時只是

少數奴隸主或自由民的民主，而絕大多數的奴隸們是完全被擯絕於民主權利之外的。所以古代希臘的民主，只是近代民主主義的一個預言罷了。

近代的民主主義，乃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產物。當資本主義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懷裏發生并發展至某一程度時，它便感到封建制度的束縛。而且這種經濟愈是往前發展，則它所感到的束縛也就愈不可忍受。因而在代表資本主義經濟利益的階級——資產階級中，便發出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進行民主解放的運動來了。因此，民主主義運動的發展，又往往跟着資產階級本身的發展而發生變化的。

近代的民主主義既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因此它在本質上是資產階級性的。它的歷史意義，主要是在等資本主義的發展清除障礙，開闢道路。在經濟上，資本主義需要自由的勞動力，需要提高農民的購買力，需要自由的國內市場，需要自由地發展它的生產。在政治上，它需要法律的保障（私有財產），需要統一集中的國家政權。但在封建制度的或繼承封建制度的君主專制底下，勞動力是不自由的，因為農民既多半附着於土地，而手工業者又深受行會傳統的束縛。同時，農民因為自己沒有土地或缺乏土地，不得不忍受過份的封建榨取，無法發展自己的生產，根本談不上有購買城市商品的能力。此外，如行會限制生產的種種法規，封建的關稅壟斷，以及貨幣與度量衡之紛亂和不一等等，都是妨害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發展的障礙物。但這些障礙物與封建的地方主義，貴族僧侶的特權，以及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是緊相聯繫着的。所以，新興的資產階級，爲了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的經濟，便不得要求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以提高農民的購買力並獲得自由的勞動力；不得要求打破手工業生產的行會制度，以便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的工業；最後，不得要求推翻封建傳統的君主專制，剝奪一切貴族僧侶的特權，以便組織自己的代議制政權，建立民族統一集中的國家，以此來統一國內市場，并進而向國外市場擴大自己的勢力或抵抗外來的侵略；——這些便是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歷史任務。而自由（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思想、信仰自由等）和平等（所謂在法律前的平等），不僅是達到實現這一民主歷史任務的前提條件，而且也是其應有的結果。歐洲自文藝復興時代後幾百年的歷史，差不多都是爲了爭取實現上敘的民主任務而鬥爭的歷史。十六世紀尼德蘭（荷蘭）的革命，十七世紀英吉利的革命，以及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大革命，不過是這一民主鬥爭之最尖銳，最高度和最典型的表現。

美國的獨立運動，也是屬於這一民主鬥爭之另一典型。十九世紀中葉法、德、奧、意的革命運動，國家統一運動，則是這一民主鬥爭之繼續。最後，就是俄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也是由於此種民主的歷史任務所促成。

就西方先進國家的民主解放運動的歷史體現看來，民主主義的內容或民主的歷史任務，其中最主要之點就是：解決土地問題，摧毀封建貴族的特權及其專制政治，建立民族獨立統一的國家，而普選的代議制政治則是這一民主主義在政治上之集中表現。這種民主主義，在近代歷史上確曾起了偉大的進步作用——它會替資本主義的經濟清除了封建制度的障礙，開闢了自由發展的道路。倘使沒有民主主義的幫助，資本主義是無法向前發展的。但民主主義自身亦有一定的階級內容和歷史界限，絕不是像一般庸俗的民主主義者所想像：它是超階級，超歷史，『放之萬世而皆準的』永久真理。它同宇宙間一切事物一樣，有它的發生，發展和衰亡。假如西方先進國家的民主主義，在十八世紀以前是發生和生長時期，十九世紀是繁榮時期，到了二十世紀初便已開始進入衰落時期了。因此，西方先進國家的民主主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是歷史進步的因素，而到了二十世紀便已開始變質而成爲負的因素了。所以在現時西方先進國家中所急切要求的，已不是什麼一般的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範圍內所能容許的民主主義，而是更進一步的代表勞動民衆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了。而且事實上，像德意的資產階級已經放棄了以前的民主主義，而轉到了極端反動的納粹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這便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在西方先進國家已經顯示衰落的確切表徵。然而這絕不是說，東方落後國家的民主主義也達到了同樣的階段。相反地，民主主義在東方落後國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國家）中還具有推動歷史進步的重大作用。假使這些落後國家不解決民主的歷史任務（如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掃除封建殘餘，解決土地問題等），便絕對無法向前發展。但同時也絕不是說，東方落後國家（像中國、印度等）之解決民主的歷史任務，一定要依樣畫葫蘆地循着西方先進國家（如英法德等）的軌道進行。我們根據落後國家之歷史發展的不平衡律和綜合律，寧可說，它們解決這一任務，有它們自己的途徑。而且這途徑也可以從西方先進國家歷史發展的經驗中獲得指示。

## 西方先進國家民主改革的經驗

民主改革的運動，即解決資產階級性的民主歷史任務的鬥爭，在西方先



進國家中一直延長了好幾個世紀。且其過程是異常之盤旋曲折，錯綜複雜而多種多樣的。但其中有幾個主要的國家，可以作為民主改革的典型，那就是英、法、美、德、俄。

英國，如大家所知道的，它是首先發動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革命（所謂工業革命）的一個國家。但在這個生產革命之前，英國却曾經歷了整整半個世紀的最嚴重的民主鬥爭，經歷了兩次的革命。尤其是第一次革命（一六四〇——一六〇年）不但經過的時間最長，且其鬥爭亦最為嚴酷。因而它的經驗和教訓亦最為豐富。這次革命最顯著的表現，就是：它一度摧毀了代表封建特權的斯圖亞特君主專制政府，將國王查理第一送上了斷頭台，成立了民主共和國，解決了一部份農民的土地問題。但在這次革命的過程中，當革命愈是往前進展，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鬥爭愈趨激烈，要求民主的解決愈趨徹底（如均分土地，建立普選的一院制等），下層的民衆城市的工人，手工業者和鄉村的農民）愈趨積極，愈表現得勇敢和堅決時；而資產階級的上層（如長老會派及清教徒會右派所代表的）便愈來愈往後退，愈來愈趨於同王黨貴族的反動勢力謀取妥協了。也正因為如此，一方面使革命推行了極限（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言），而另一方面又使反革命獲得了新力量（即從革命隊伍裏脫離出來的資產階級份子），當革命走到精疲力竭時，斯圖亞特王朝又重復出現於英國的歷史舞台。但英國經過了這一次大革命之後，整個的社會基礎是變化了，專制君主和封建貴族們的立脚地是動搖了，無論查理第二和詹姆斯第二及其臣僕們如何企圖恢復已往的權位，但歷史已註定了他們的命運。所以至一六八八年，當資產階級又感到不能忍受，起而向專制王權進行鬥爭時，即輕易地結束了斯圖亞特，獲得了所謂『光榮革命』的勝利，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的代議制政權，這便給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法蘭西的大革命（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比起英國的第一次革命來，進行得更為徹底。它不但徹底敲碎了布爾邦王朝的君主專制，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建立了最革命最民主的共和國，而且還徹底地取消了一切封建貴族和僧侶們的特權，掃清了封建的殘跡，解決了土地問題（即無條件沒收一切貴族僧侶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或轉讓於資產階級）。但另一方面，當革命愈是往前進展，革命的民主改革愈趨於徹底，下層的羣衆（巴黎的山克洛特和鄉村的農民）愈趨於急進時，法國的上層資產階級（如米拉波，辣斐德及整個的基朗特黨）也同它在英國的前輩一樣，愈來愈脫離革命的行列，轉而

陰謀破壞革命，力圖與王黨貴族妥協，積極進行反革命去了。結果便形成了德爾米多月的悲劇，產生了那那巴特（拿破崙）的獨裁，最後又是布爾邦王朝的復辟。但法國大革命所解決的民主歷史任務（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條件，無論路易第十八及查理第十如何想阻礙它們，却終究是徒然！所以僅由於『七月革命』（一八三〇年）的輕輕的一擊，布爾邦王朝也就最後被送進了歷史博物院。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是替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革命奠定了基礎；則法國十八世紀的大革命，便是給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昭示了最完竣的模範。

美國的獨立運動（一七七五——一八三年），是資本主義初期一個最典型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因為美洲完全沒有封建的傳統，所以當時北美的敵人只是單純的英國的壓迫和束縛。在獨立運動中，由於美國民衆反英的異常勇敢和犧牲的精神，以及其領導者（如華盛頓）的堅決意志和無誤的戰略，很快地就完成了北美合衆國獨立的使命，在新大陸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以此開闢了一條向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坦途。

德國，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還是歐洲一個落後的國家。它不但保留了濃厚的封建傳統，而且還深深停滯在封建割據的四分五裂之中。所以那時橫在德國民族面前的民主任務，不僅僅是需要解決土地問題，而且特別急切需要的，是如何打破封建的割據，建立民族統一的國家。一八四八年的『三月革命』，原是適應這種歷史需要而產生的。但德國資產階級由於自身的卑怯，又鑑於法國『二月革命』的『恐怖』，於是竟在工農羣衆向着王權及封建勢力英勇進攻的當中，即卑劣地同反革命勢力妥協去了。結果是革命陷於流產，土地改革和國家統一的任務，只得等待着採用另一方法去解決，那便是俾斯麥的『鐵血主義』及其『社會改良政策』。『鐵血主義』藉着兩次對外的惡戰（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確曾把德意志統一起來了。但這種統一是以資產階級屈服於普魯士的地主貴族為代價的，因此，德國的資本主義也就和普魯士的軍國主義結成了不解緣。而『社會改良政策』運用在土地問題上，則是將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封建傳統的壓榨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得普魯士的農民變成了資本主義化的地主們的馴服奴僕。正因德國的民主任務之解決，不是由於革命，而是藉助於俾斯麥主義（我們東方的日本，也是俾斯麥主義的驚腳的模倣者），雖然德國因此很快地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並很快地走上了帝國主義，但它所包含的爆炸性也就特別猛烈。兩次世界大戰之均由德

國發動，與此種歷史根源并不是沒有關係的。

東歐的俄國，比起中歐的德國來更為落後。因此，不僅它的民主改革運動落後了半個世紀，而且它完成這一改革所走的道路也就成了另一典型。如果民主的歷史任務，在德國最迫切和最主要的是建立民族統一的國家，則在俄國便是解決農奴式的土地問題。但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又必須徹底摧毀代表地主貴族的沙皇專制政府。可是，俄國的資產階級（像立憲民主黨所代表的），比起德國的資產階級更為卑怯無能。所以它對於土地問題，自始就採取了藐視和怠工的態度，而對於沙皇政府則更希圖謀取有利於自階級的妥協。因為它與地主貴族保有着極密切的聯繫，所以不敢、也不願爲了土地問題去同它們決裂，以致打斷了自己和沙皇政府謀取妥協的橋梁。俄國的無產階級（如布爾塞維克所代表的）則完全相反。它不只是贊助農民解決土地問題，而且還以解決這一問題爲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務。因為它認爲當前直接的政利益，是在於同農民聯合去摧毀代表地主貴族利益的沙皇制度，以便乘此踏進政治舞台。城鄉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如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所代表者）雖然也同情於農民取得土地，可是它們缺乏決心和勇氣去幫助農民解決問題。所以它們在這一問題上，也同對於其它的民主問題一樣，經常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結果總是幫助了前者，而拖延了土地問題的解決。

由於上級幾個階級對於土地問題所採取的根本態度不同，因而便決定了俄國民主改革運動的特殊道路。這就是說，俄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任務，不是由資產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在內），而是由無產階級去完成。正由於無產階級決心領導農民來解決土地問題，所以能獲得農民羣衆的忠心擁護，因而它乘着民主運動的高潮便踏上了政權。結果也就最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及其他的民主問題（如國內弱小民族自決問題）。俄國十月革命所表現的歷史事實就是如此。因此，我們可以說，俄國的十月革命是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改革運動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有機地啣接起來了。

從西方先進國家民主改革運動的一般經驗看來，民主任務（如土地改革，廢除封建特權，取消君主專制，建立民族獨立統一國家等）的解決，雖然是替資本主義的發展清除道路，是最有利於資產階級的。但資產階級本身對此却往往採取不徹底的妥協態度，這在最早期的英法民主改革運動中便已如此。而在後期的（即十九世紀以後的）民主改革運動中，特別在較落後的國家中（如德我等），資產階級更是顯得卑怯和反動。反之，下層平民羣衆

，特別是城市工人和鄉村農民，總是在民主改革運動中形成了最主要的和最堅決的動力。而且歷史越是往前進，越是在落後的國家中，這種情形也表現得越明顯。最後到了廿世紀的俄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任務，甚至由無產階級才將它加以完成。但當俄國無產階級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任務後，它却不能再循着發展資本主義的民主道路走，而是要跨進自己的社會主義的前途了。這便是西方先進國家民主改革運動發展的基本邏輯，是它們的主要經驗和教訓，是民主任務遲延未決的東方落後國家值得特別加以考慮和借鏡的。

## 中國的民主任務

中國是東方一個最典型的落後國家。而它的落後性，則主要表現於社會生產的長期停滯和被國際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地位上面。

由於生產的長期停滯，我們兩千餘年來（秦以後）的社會經濟基礎也就停滯在自然性的農業上。但同時因爲「前資本主義期」的商業和高利貸之某種程度的發展，土地却早已走上了私有化的階段。因此，一切官僚貴族，商人和高利貸者，差不多都以取得土地爲剝削農民增加財富的唯一手段。於是土地也就經常集中於它們的掌握中。另一方面，整個君主專制的官僚的上層機構，又全靠壓榨農民（如各種各式的賦稅）來維持。這樣一來，我們的農民便成了全部社會生活的負擔者，一切上層階級剝削和敲榨的對象了。這便是中國「農民問題」，亦即「土地問題」的歷史根源。

自鴉片戰爭的結果，西方資本主義得以自由侵入中國每一角落後，而首先遭受到嚴重打擊的又是我們的農民。因爲外來商品的「價廉物美」，便破壞了它們的手工業（家庭副業）；因爲農產物的商品化，使它們更依賴於商人，聽其操縱；因爲專制官僚政府費用的急速擴大（連幾次對外戰爭的戰費及賠款在內），大大地增加了它們的負擔，即增加賦稅；因爲一切官吏加速地貪污和腐化，其惡果自然也是落在它們身上；至於舊有地主們因商業發展而生活費用提高，更只有靠增加地租，加重剝削農民來維持；——這一切綜合起來，農民羣衆便愈益陷於貧窮化，陷於困苦的地境了。而暫時解鬆困境的唯一方法，便是出賣土地或舉行高利債。前者的結果，使土地越來越集中於少數人（官僚，軍閥，商人，高利貸者，工業家等）之手；而後者則使農民永久陷於高利貸的吸吮，迄至吮到最後一滴血爲止；——這便是西方資本帝國主義侵入後對於農民方面所造成的最一般的情形。這情形，經過清末的

，辛亥革命後的軍閥統治時代，直至國民黨專政多年，不但沒有絲毫改善，反而跟着時間的前進而日趨嚴重。尤其是抗戰八年，我們的農民既經過了敵偽的無比蹂躪和榨取之後，又遭受『勝利的』軍人官吏和土豪劣紳的種種強征勒索（如派軍米），簡直是墮入了『人間地獄』！所以近來農民騷動（如西康及浙江寧平縣的暴動），日有所聞，這證明農民的痛苦，已達到臨界點了，再也難於忍受了！

但大家知道，中國的農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這個無比廣大的羣衆，既日益陷於地主、商人、高利貸者、軍閥、官僚及土劣的重重壓迫和剝削之下，日益陷於飢餓的死亡線上，它們的生產力當然只有日趨衰落，它們的購買力更是日益縮小以至於零；再加上天災人禍（如軍閥混戰，國共戰爭等），它們當中的一部份不是流於盜匪，就是舉行暴動，其結果當然又是轉而加速農村經濟的破產；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內市場除了日趨衰落和縮小之外，還有什麼前途呢？然而這對於城市生產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一個絕對的障礙！所以解決農民問題，或土地問題，即沒收地主土地重新配給無土地或缺少土地的農民，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和高利貸，制止一切軍閥、貪官污吏及土豪劣紳的橫敲勒索，乃是恢復並擴大國內市場，提高城市生產，復興國民經濟的最基本的前提。同時這也就是中國民主主義最基本的內容之一。

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經濟的異常打擊、束縛、以及對於整個民族的危害，現在差不多已成了公認的常識。但人們所容易了解的多是那些最表面、最露骨的不平等現象，如：割據土地，建立租界，創設特別法權，以及外軍的自由駐紮，外輪的自由航行……然而埋伏在這些現象下面最重要的作用，却是自由消售商品，購買原料，以及無限的投資（如築鐵路、開鑛山、設工廠等），——這才是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最基本的經濟目的。爲要達到此種目的，便必須在經濟上操縱中國的海關權，在政治上用各種威脅利誘的手段使中國的統治者變爲自己的代理工具。如果海關不完全獲得自主，中國的政府不徹底脫離任何帝國主義的羈絆，即令某些租借地收回了，租界廢止了，特別法權撤消了，外國軍隊不自由駐紮了，外國商輪不自由航行了，……但中國的國民經濟還是無法發展，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還是無法提高，整個的社會政治還是無法走上軌道的。這一層，我們只須略一注視現時的情形就够明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不是名義上已被取消了嗎？可是實際情形究竟如何呢？不但香港、九龍和澳門仍然被握在外人手裏，而且東北的旅順大連和主要的鐵路幹線又在『雅爾達秘密協定』之下重新被斷送了。最重要的是：海關權雖已從日帝掌握中收回來，但暗地又落在美國人手裏。所以最近美國的商品已如潮水般湧進來。這情形如果繼續並開展下去，事實上也將繼續並開展下去，中國的一點民族工業一定會淹死的。同時，又以金元借款爲條件，企圖將整個中國擱在菲律賓的狀態之中。所謂『四強』或『五強』之一的中國，難道應該如此嗎？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民族獨立還遠沒有完成。澈底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一切主權，脫離任何帝國主義的羈絆，求得真正的土地完整和獨立，——這一最重要的民主任務，還擺在我們面前急待解決呢。

除了對外需要民族完全獨立，對內急待解決土地問題外，我們國內還有一個弱小民族的問題。所謂漢、滿、蒙、回、藏；除了滿族已完全漢化并與漢人混居外，蒙、回、藏三族確還保持着各自的經濟生活，各自的言語、風俗、宗教，并各據有一定的地域。這三個民族的人口，雖然比起漢族來是居於『少數』（但也不下三千萬人），并住於邊疆，但它們對於中國的統一與和平，對於整個國家經濟生活的發展，還是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的。中國歷史上，漢族和這些弱小民族，演過多少次的戰爭，耗過多少的物力和人力，凡是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的。即以最近的情形來說，『伊寧問題』已鬧得滿城風雨，『東蒙問題』亦一度提出，但這還不過是表示我們戰後的弱小民族問題尚在重新開始而已。倘使這個問題不迅速謀取合理的解決，將來糾紛的爆發是不可收拾的。正因此，國內的弱小民族問題，也是我們當前一個重要的民主任務問題。

其次，就是一般下層勞苦羣衆的地位急待改善。尤其是工人羣衆的地位必須提高，它們的最低限度生活，必須獲得保障。因爲它們是現代生產的唯一負擔者。如果它們不能過活或陷於奴隸狀態，不但現代的生產無法提高，就是整個的國民經濟也是無法開展的。因此，在先進的國家中，訂定『勞工保護法』，早就成了一种迫切的民主任務。如『八小時工作』，『保護童工和女工』，『工人自由組織工會』，以及爭取改善待遇的『罷工權』等，早已成爲公認的民主權利了。但我們中國的工人羣衆，幾十年來都是處於極端被壓迫和剝削的地位，它們的工資，除了極少數外，總是養活自己還不够，

更不要說供養家屬了。它們的時間，都是在十小時以上，有些甚至超過十五、六小時。自由組織工會和罷工，直到現在還是視為不合法的。至於童工和女工的保護法，更是談不上了。這種情形，不僅僅是表示中國的落後，而且證明我們的資產階級『只顧擠牛奶，連牛奶的死活也是不管的』。因此，改善一般勞苦羣衆的地位，特別是改善工人羣衆的地位，還是我們當前的民主任務之一。

最後，成爲民主改革的最大障礙的，是專制傳統的政治機構。它的核心，是專橫而又腐敗的官僚制度。這制度，在滿清是以君主專制的面貌表現出來；入『民國』後，前一時期是在各個軍閥之下活動；而最近二十年來，則體現在一黨軍事專政的機構裏。官僚制度的階級成份，是跟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變化的：在滿清，主要是地主貴族和商業高利貸者；而往後則以買辦階級，銀行財閥及少數上層工業家爲其中心。正因此，這種官僚制度是最仇視任何民主的改革的。例如解決土地問題，便要侵犯到它所代表的地主的利益；對外完成民族自主，則要使它所代表的買辦失去其主子的歡心；提高工人待遇，又要得罪它所代表的工業資本家。而且這種官僚制度的本身，也好像有它自己的『進化』律。在滿清時代的官僚制度，早已爲西方人所驚異，可是以滿清的官僚制度比起現在的來，却是小巫見大巫了！所以，爲了解決民主的任務，首先必得徹底摧毀這種根本違反民主，阻礙民主的官僚制度及其外殼，而以現代普選的民主制去代替它。

民主任務的解決，可以說是從落後國家走上進步國家的一道橋梁。凡是民主任務未經解決的國家，它一定永遠陷於癱瘓、混亂和聽人擺佈的泥沼裏而不能自拔的。

## 中國過去民主改革運動的教訓

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民主思想（當然不是出於侵略者的自願）。當中國的經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而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變化，即發生了某種資本主義的經濟而要求向前發展，但同時又受到阻礙時，就逐漸要求民主，感到民主改革的必要了。戊戌的維新運動，乃是適應這種客觀的民主要求之第一次的表現。

戊戌維新運動的基本傾向，是企圖將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改變爲君主立憲的國家，並以此從上至下來改革舊有的社會經濟制度，逐步地走向現代的

資本主義。但事實上，滿清的君主專制的官僚機構，絕非光緒皇帝一人所能代表。相反地，光緒不過是寄生在那個龐大而頑固的官僚機構上面而已。雖然年青的皇帝因受了種種外來的刺激（如甲午戰爭的失敗及隨之而來的各帝國主義的種種要索），志願『維新』，切望實行某種民主改良來延續清廷的命運。可是，實際上代表那個官僚機構的西太后及其黨羽們（如榮祿等）却絕對不能容許。而維新派的康梁等又完全沒有羣衆作基礎。因爲在那時真正需要民主改革（土地問題）的乃是廣大的農民羣衆。但這正是康梁諸人所未曾想到，甚至害怕想到的。所以戊戌的維新變法，不到百日就給西太后及其黨羽們打斷了。這裏不但證明了：滿清的君主專制官僚政府，已絕對不容許改造或改良；而且昭示了：離開羣衆行動的上層改良主義，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們，是最先懂得了滿清政府的無法改良（如孫中山曾一度上書李鴻章，請求政府自行改革，但得不到回響），才決心要推翻這個政府，掃除這個阻礙民主改革的障礙物，建立民主共和國，以此來推動國家走上現代的道路。這一點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覺悟，是民主改革運動的一個大進步。但他們當時對於中國的民主任務，既遠未能了解，而對於憑藉何種羣衆力量來解決這一任務，更是認識不清。所以他們提出的『民族主義』只限於『反滿』。殊不知這個以滿族爲代表的政府，早已同漢族的官僚們混爲一體，而變成爲國際帝國主義的工具了。因此，在當時阻礙『民族主義』，即阻礙中國實現民族自主和獨立的主要障礙物，已是國際帝國主義，是國際帝國主義多年來所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不僅僅是其代理工具了。而且滿清政府的實權又早已大部份落在漢族的官僚和軍閥手裏。如果只是單純提反滿，就無異在實際上放鬆了這班漢族的官僚軍閥（如袁世凱所代表的一幫），表示可以同它們妥協。後來的結果正是如此。其次，關於土地問題，辛亥革命的領導者雖已把它提出來了，其公式是『平均地權』。但怎樣才能將『地權』『平均』呢？換句話說，怎樣才能把地主的土地拿來均分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呢？依照『平均地權』的方法，是由國家用款項從地主方面收買過來，然後再分配給農民。於是真正的問題又發生了：像如此大量的款項從何處獲得呢？當然是絕對無法獲得的。所以『平均地權』，對於農民不過是一個『畫餅』而已。往後的全部事實更都證明了這一點。復次，對於國內的弱小民族問題，辛亥革命也曾提出過。如『五族共和』的標語，就是一種表現。但它也僅限於提出這一問題。至於怎樣使這些弱小民族的下層廣

大改革改善其經濟生活，以提高這些民族的文化水準，提高它們的政治地位，確定它們的民族自決權，却不曾具體說到。因此，辛亥革命也就不能得到這些弱小民族的積極擁護，反而容易被反動勢力利用了去。最後，辛亥革命雖是一個羣衆的行動（當然是偏於軍事方面），但這個羣衆的主要成份，既不是城市在業的勞動者，也不是鄉村那個急需解決土地問題的真正農民羣衆，而是那些已經脫離了農業生產的『三合會』、『紅幫』、『青幫』及『新軍』中的士兵等。他們是流氓無產者的一羣，雖然因生活的窮困而具有某種反抗性，但他們是沒有固定的民主目標的，而且是最容易被腐化、被收買、被某些投機份子利用的。一個民主的革命建築在此種羣衆身上，不僅不會有好結果，且是最危險的。從辛亥革命中出來的軍事頭領們，差不多都利用他們的『革命軍』作工具，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新式軍閥，難道是偶然的嗎？

所以辛亥革命的結果，雖推翻了滿清政府，掛出了『中華民國』的招牌，但伏在這個民國招牌後面的，仍然是傳統的官僚專制政治。與以前主要不同之點，就是：由多頭的軍閥代替了寡頭的皇帝，由軍閥的『分權割據』代替了君主的『統一集中』。至於對外的民族獨立問題和對內的土地問題，不但沒有提出議事日程加以任何討論和解決，而革命後的臨時政府，却反而公開對外宣言承認滿清和列強所簽訂的一切條約（即不平等條約）爲有效，並對內向地主聲明保護它們的產權哩！這裏告訴我們：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對於根本妨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民主任務問題，竟採取了如此的妥協態度！這就無異於暗示：解決中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歷史任務，有待於另一個階級來担负了。

『五四』運動，從政治上說來，是一個反帝國主義（日本）侵略和反官僚軍閥（安福系）賣國的運動。但就它的全部歷史意義說，却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啓蒙運動。正因爲是一個思想上的啓蒙運動，所以它沒有能從政治上提出民主任務的問題來，當然更談不到對這一任務的根本態度和行動了。而且『五四』運動從頭至尾沒有任何政黨從中指導和推進，這也就決定了這一運動的政治性之薄弱，決定了這一運動之偏重於思想解放的歷史意義了（關於這一方面，請參閱求真創刊號拙著『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一文）。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這是繼承辛亥革命而來的一個更進一步的真正羣衆的大革命。而這個革命比之辛亥革命更進一步的主要特點，就是

（一）它將『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口號，第一次明白而公開地提了出來，作爲行動的號召。（二）這個革命的基本羣衆，是城市的現代產業工人和鄉村的在業農民，而且其中工人佔了領導的地位。（三）在這個革命中，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工人階級的羣衆的政黨——共產黨；並且這黨在運動中逐步地把廣大的工人和農民羣衆組織了起來，領導它們參加了一切經濟和政治的鬥爭。（四）這個革命與世界各國的革命羣衆和組織第一次發生了直接的聯繫，取得了國際的援助（如各國工人對『五卅』罷工工人的募捐救濟以及蘇聯許多物質上的援助等），因而它是具有非常明顯的國際性的。因爲具有以上幾種主要的進步特點，所以這個革命不僅僅是中國一個真正的大革命，而且可以說是全東方一個破天荒的最進步的大革命。

就這個革命之發動了最廣大的下層羣衆來說，就它之具有現代最進步的政黨來說，就它之獲得了國際各方面的大量援助來說，它是應該走上完全的勝利，澈底解決中國的民主歷史任務問題，將我們整個民族推向一個新的根本改造的歷史時代的。然而結果，它終於是失敗了，而且比之辛亥革命的失敗還要更爲可悲！

但這種可悲的後果，它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其中最主要的是：這次革命，在政綱上雖然明確地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以完成對外民族獨立的民主任務問題。但對於極關重要的土地問題，却始終沒有提出一個正確而具體的綱領來。所以當農民羣衆運動達到高潮時，農民運動的領導者便陷於徬徨、混亂和不知所措的窘境。而農民羣衆本身，則經過相當時期的熱烈追求（土地）和堅苦奮鬥之後，覺到仍然得不着土地時（由於領導者的自動阻止），便已逐漸陷於等待、疲倦和癡痺的狀態中。因此，當反革命獲得準備時間來向農民進攻時，它們更陷於驚慌失措，只得任聽敵人宰割了。另一方面，而且是最主要的，是代表革命羣衆的政黨，由於年青和幼稚；缺乏本國鬥爭經驗的傳統；革命理論和政治水準的太低；對於西方革命運動，尤其是俄國革命運動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全不了解；以及始終落在一種典型的外來的機會主義領導底下。將階級合作代替了階級鬥爭，將妥協談判代替了革命行動，以致不自覺地在思想上變成了階級敵人的俘虜，在政治上作了同一敵人擁護羣衆的工具，因而在緊急關頭遭到昨日的同盟者掉轉槍來向它掃射時，就陷於倉皇失措，不是束手待斃，就只好臨陣脫逃了。於是革命的果實，就成了反革命祭壇上慶祝勝利的犧牲！一個最偉大的革命，竟如

此悲慘而諷刺地結束了自己！所留下來的是一黨專政。在這個專政下，平等條約依舊保存，『平均地權』依舊寫在紙上，勞苦羣衆依舊任人壓榨，軍閥官僚照樣橫行，白色恐怖遍滿全國，……中國的歷史帶着遍體創傷，帶着一副較為新穎的專政面具，又倒退到老遠的過去去了。

革命失敗了，中國新生的希望被打斷了，於是，整個的國家民族又重陷於癱瘓，混亂和聽人擺佈的泥沼裏。內部的軍閥混戰，農民暴動，接連不斷地發生。國外的帝國主義，特別是其自身陷於異常矛盾的日本帝國主義，也就乘機而起，冒險向中國進行前所未有的兇猛侵略，企圖吞併整個中國來解除其矛盾，這便迫使中國整個民族陷進了一個空前未有的『國難』時期。然而這正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邏輯後果。倘使這次革命獲得了完全的勝利，解決了民主的任務，踏上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實行了全般的政治經濟改造，使幾萬萬的人民獲得了自由發揮其創意力與活動力，不但日本帝國主義絕對不敢向中國冒險，而且它的本身，在中國革命勝利的影響之下，在日本民衆響應中國革命而自尋出路之下，將自顧不暇，大有可能被送入墳墓呢！這樣，不但東方的面貌將大爲改觀，就是整個的國際局勢也會受到決定的影響，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了。

如果從我們過去民主改革運動的全部歷史看來，差不多可以說，是一部不斷失敗的歷史。其根因就是我們的資產階級對於自身所需要的民主改革，始則幻想從上至下的改良，繼則採取畏縮妥協的態度，最後則完全走到相反的方面，而決心作了民主改革的敵人。這在西方經過整整的三個世紀，從英國、法國、德國到俄國所反映出來的經驗，而在我們這個落後國家裏，不到三十年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這也就是現代落後國家的歷史，往往將先進國長期發展的歷史壓縮在短期內體現的『綜合律』或不平衡發展律的具體表現之一。這一規律充分證明：我們的民主歷史任務，只有依靠下層的工農羣衆及一切被壓迫人民自己的力量，才能獲得真正的澈底的解決，——這便是今後民主改革運動的指標。

## 怎樣實現民主

民主的歷史任務，即民主主義的真實內容，以及在客觀上妨害解決民主任務的障礙物，我們在前面不但已經具體地解釋過，而且還從歷史發展的經驗上扼要地論證過了。現在擺在前面的問題，就是：究竟要怎樣才能實現民

主，即要怎樣才能解決急待解決的民主任務問題？

民主的內容或任務，既是一種歷史進步的任務，是關係到全體人民大衆，尤其是工農大衆的切身利益的任務，那就只有依靠着人民大衆自己的真實力量才能得到解決。可是，人民大衆又要怎樣才能從意識上覺悟和認識自己的力量，從組織上形成、集合、集中，並發揮自己的力量呢？這首先就必須爭取一般的基本的民主自由權利。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及罷工的自由權等。

因爲只有獲得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人民才有可能表示自己的願望、意志和要求；只有獲得集會的自由，人民才有可能按照需要集合在一起來討論和研究有關於自身生活及一切社會國家的各種問題；只有獲得結社的自由，各種人民才能形成自己的組織（如各種產業或職業團體），集合自己的力量，組織或參加各自所需要的政治團體（政黨在內）；只有獲得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人民才能發表自己的根本主張，闡明自己的任何理想，選擇自己願意相信的任何主義或宗教；只有獲得罷工的自由，工人及一切被僱用的職業者，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不致任聽僱主們的剝削和壓迫而陷於飢餓與奴隸的地位。所以，爭取這些一般的民主自由權利，乃是人民大衆培養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力，形成和加強自己的組織力量之絕對必須的條件。沒有這種條件，人民大衆只是一盤散沙，絕難表現任何自覺的集體的和有組織的力量。正因此，凡是專制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一定首先要剝奪或限制人民的自由，以便輕易達到它們剝削和壓迫人民之目的。反之，凡是要想從統治者的剝削和壓迫下掙脫出來的人們，也一定首先要爭取這些民主自由之實現。

但同時我們必須指出：爭取這些民主的自由權利，並不完全限於向統治階級一方面。凡是在已經組織的民衆團體，如工會、農會、學生會、職業團體，乃至各種政治集團內部，都必須爭取民主化。在任何羣衆組織或政治團體內部，凡是其上層領袖不允許或限制下層羣衆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要求，以及自由討論問題，自由批評領袖們的言論和行動的，都是根本違反了民主的原則的。像這樣內部沒有民主自由的組織或團體，不過是一種『在野的』的官僚機關，而那些『領袖們』也只是些『在野的』或『候補的』官僚而已。但現在的許多羣衆組織及政治集團，正是這種情形。然而這對於發展羣衆的民主精神和組織能力，是異常之有害的；在事實上，這是阻礙真正民主運動的發展，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爲專政的統治階級而服務的。因此，在任何民



衆團體內部爭取民主化，打倒官僚主義，打倒上層少數分子的把持操縱，也是在整個政治上爭取民主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但僅有民衆的意志和組織，還不足以解決民主的任務及其他有關全國性的重大問題的。所以，又必須有一個具有全國性的最高的政治機關，才能把全國各種民衆的意志和力量集合和集中起來。這便是現時人們所公認需要召集的『國民會議』。但這個國民會議必須由普選和不記名投票產生，並且必須具有解決一切有關國家重大問題的全權。因此，我們可以說，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乃是民主主義在政治上之最集中的表現。

所謂『普選』，就是凡滿一定年齡的成年男女，都應毫無限制地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採用『不記名』投票，則爲的是防止對於選舉人的任何干涉或操縱，以便自由行使其意志。所謂『全權』，就是國民會議具有全部權力得以討論，議決和公佈有關於國家的一切重大問題，並選出行政機關來執行。如果行政機關違背決議案或執行不力時，國民會議得隨時重選或改組之。只有這樣的國民會議，才有可能真正代表全國人民大衆的意志、要求和利益，從上至下地實行民主改革，實行改變一黨專政的官僚制度，使整個國家民族走上現代的民主化。也只有這樣的國民會議，才有可能解決國共兩黨間的嚴重糾紛，使它們在全體人民大衆的意志和利益之下受到合理的裁判和處置，以此解決其糾紛。

像現時當權政黨所已經決定召集的國民會議，其代表既完全由於圈定、指派或虛偽的選舉，那只能算是變相的一黨代表(?)會議，或一黨御用的會議，與人民大衆毫無關係。就是這個會議將來經過『協商』，讓『各黨各派』或『無黨無派』派出若干『代表』參加，那至多也只能算是當權黨與在野黨派的『代表會議』，與人民大衆普選的國民會議還是沒有共同之點。當然也就談不上真能代表人民大衆的意志和利益來解決當前各種重要的民主問題了。

至於普選的國民會議之能否召集成功，將以人民大衆能否行使一般的民主自由權(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信仰自由等)爲條件。因爲民衆只有在這種民主自由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自由選舉自己信任的代表。而候選人也只有在這同一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自由地向民衆發表自己的政見，宣傳自己的主張，並批評敵派的政見和主張，以此去爭取選民的信任。否則，國民會議的『選舉』一定是虛偽的，不是被當權政黨把持操縱，就是被各黨派的政客或野心家們賄買和玩弄的。我們已往的一切選舉及現時各種參議會

的選舉，便是鐵一般的事實的事實的教訓。所以，即是爲了實現普選的國民會議，也必得爭取一般的民主自由這一前提。

另一方面，國民會議必須以解決民主的歷史任務(澈底解決土地問題，完成民族的真正自主，確定國內弱小民族自決權，製訂勞工保護法等)爲中心目標，才能把整個民族國家從『停滯，混亂和矛盾的泥沼』裏拖出來，推上歷史進步的軌道，——這才是國民會議應有的歷史意義。如果國民會議不以解決民主任務爲其中心職務，則令召開了，甚至是『普選』的(?)，但一定是空洞的，不能起進步作用的。它只能提供各黨派的某些政客或野心家們一個活動的舞台，從事拉攏勾結，或互相爭鬥，玩弄『議會把戲』，以遂其私圖而已。辛亥革命後某一時期內的所謂國會正是如此。因此，召集國民會議必須與解決民主任務密切地聯繫起來，才具有進步的意義。

至於將來中國究竟能否成功地召開一個真正普選的國民會議來解決民主的任務及其他的國家重大問題，這全靠人民大衆，尤其是在生產上起決定作用的工農大衆的覺醒和奮鬥程度來決定。我們這裏無須事先加以預斷。但就一般民衆(特別是農民)的利益說，就目前的客觀情勢說，儘速地召集一個普選而具有全權的國民會議，是十分迫切地需要的。假設這樣的國民會議能够召集成功，將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大大的進步。即使這樣的國民會議不能實現，但站在歷史的觀點上，在現時還是值得爲實現它而爭鬥的。因爲在爭取實現這樣的國民會議的進程中，民衆的覺悟會逐步生長起來，它們的政治經驗會逐步豐富起來，它們的組織會逐步發展起來，它們對各黨派政治面貌的認識會逐步清楚起來，最後它們對統治階級的了解會逐步深刻起來，——這一個最好的『民衆政治學校』。民衆，尤其是工農羣衆，經過這樣的『政治學校』訓練之後，縱或人們死死地要妨礙這種國民會議的實現，它們也就會自行尋找解決問題的另一道路了。也只有到那時，民衆才會決心和勇氣採取超國民會議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的民主歷史任務的。俄國所經過的歷史事實就是先例。

所以在目前，一切民衆都應該爲實現普選的國民會議而鬥爭，應該要立刻召集普選的國民會議來解決急須解決的民主任務問題以及其他的重大問題(國共的糾紛問題在內)。凡是誠心要求民主，認真爭取民主的人們，都應該到民衆中去提醒它們，組織它們，號召它們起來向這一目標邁進！我們去來歷史的進展，將以這一國民會議運動的進展來衡量。而我們的歷史要走向一個更高的超民主主義的新時代，也將藉着這一運動作橋梁！(五月廿日)

# 維新與革命

唐虞世

革命運動，同維新運動一般，而且比維新運動更加明顯，是中國資產階級底運動。甲午中日戰爭之次年，正當康有為聯合士族子弟在北京「公車上書」時候，孫文已聯合會黨和華僑在廣州舉行一次流產的「革命」了。從這年起直至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時候（從乙未至庚子），此五年間，維新運動扶搖直上。康有為以一應試舉子，短短二三年內，竟傾動京華，受皇帝知遇而舒展其抱負，以至成爲實際上政治領袖，百日新政失敗後他更被人視爲未來新中國底領導者，當時覺醒的士族子弟幾乎全體擁護他，接受他的主張，甚至不惜爲實現他的主張而犧牲生命。此時革命運動怎樣呢？乙未重陽失敗後，領袖孫文亡命國外，留在國內的徒黨情勢窮蹙，庚子戰爭中雖靠日本台灣總督幫助，勉強在惠州舉行第二次「革命」，仍沒有結果。可悲哀的還不在於這兩次「革命」底失敗哩，而在於革命黨人是孤立的，是缺乏人家同情的。這種情形，領袖孫文感覺得最清楚。他在「有志竟成」一文內說起他在香港談革命時，附和的祇有陳，尤，楊三人，連他在內被稱爲「四大寇」。至於「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當時覺醒的士族子弟并不同情革命。華僑比較好些，但也好得有限，華僑當時也是傾向維新的。乙未失敗後，孫文在檀香山華僑中感嘆：「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起義者，惟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他遂丟開了檀香山而到美洲去。「美洲華僑之風氣較寒較積島尤甚，……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埤不過數人或數十人而已。」他從美洲到歐洲，幾乎被倫敦中國大使館秘密押解回國。從歐洲到日本，他也發現日本華僑贊成革命的「不及百分之一。」他感嘆道：「向海外華僑傳播革命主義也，其困難已如此，而欲向內地以傳播，其難更可知矣。」會黨比較華僑更好些。「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爲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然彼衆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藉全無，只能望之爲響應，而不能用爲原動力也。」他根據以上所說做出結論道：「由乙未初敗以至庚子，此五年之間，蓋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子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

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庚子第二次革命，依靠日本政府援助而發動，又爲了日本政府停止援助而失敗。但孫文很正確指出：「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交遊也。唯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以惡致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全國輿論爲甚麼有此轉變呢？這一點，孫文未曾給我們一個滿意的解答。

我們上面說過，無論是維新，是革命，都是中國資產階級底政治運動。但就所用的方法來說，二者之間畢竟是不同的。維新用的是改良的漸進的方法，利用統治勢力，混入統治機構，去擴大影響，以至最後獲得全部的政權；革命用的則是急進的公開反叛的方法，用暴力攫取統治政權本身。這兩種方法，中國歷史常常交替應用着。大抵社會矛盾未發展到飽和點，統治階級還有可能改良其制度以延長其統治的，總是用維新方法，如歷代底政變，甚至禪讓；但矛盾若發展到了飽和點，農民工匠及一般貧民就暴動起來，他們不要改良，祇要革命。所以改良本質上是士族底方法，而革命本質上是農民，工匠及一般非士族的人底方法。這是從過去中國歷史看得出來的。

但是帝國主義侵入以後，中國改觀了，因爲產生了一個新的階級，與地主和農民鼎足而立——資產階級。牠對於士族底政權，既能採取改良的方法，亦能採取革命的方法。不僅中國資產階級如此，世界各國資產階級亦然。

資產階級，連舉行過模範革命的法國資產階級在內，并非一開始就能採取革命方法的。資產階級是現實主義者，牠要的祇是自己的利益，至於手段則首先採取那最便利的，最少麻煩和犧牲的。各國資產階級運動，一開始都是利用舊政權，混入其內，改良之，使之爲自己的利益服務，即一開始都是走維新道路。必須爲競爭避辭所迫，資產階級才肯走上革命道路。中國新



的資產階級尤其如此。牠沒有長時期的城市自治經驗，還不知道怎樣去統治國家，牠還不能從自己羣中推出統治人物，政治家，領袖。牠還認為統治國家乃是士族底專業，祇消這些統治者是爲牠的利益服務的。牠還不信任士族外的人物做牠的政治領袖。如此情形之下，難怪國內資產階級和國外華僑積極擁護康有爲和梁啓超，而視孫文和他的少數信從者爲毒蛇猛獸了，——雖然孫文代表的仍是資產階級底利益。可是鬪爭邏輯發展下去。戊戌和庚子兩年給了資產階級以當頭棒擊，告訴牠那代表士族的舊政權是不能利用，不能混入，不能改良以適合牠的利益，即使勉強能維新，結果也是比革命更加浪費些。戊戌打破中國資產階級底幻想，庚子則使牠覺悟了。代表這覺悟意識的還是那些進步的士族青年，一部份的『康黨』，牠們開始離開了康有爲。由此可見，惠州革命失敗後，舉國輿論所以不如廣州革命失敗後那樣以惡聲相加，反能代爲扼腕嘆息的，并非爲了革命黨人再接再厲的精神，也非爲了八國聯軍佔領北京，而是爲了資產階級終於覺悟維新道路走不通，非試走革命道路不可了。資產階級採用了本質上屬於士族的方法之後，又來採用本質上屬於農民，工匠及一般貧民的方法。於是一部分走過資產階級營業來的士族，便和那些視資產階級爲領導者的農民工匠，在資產階級利益基礎上得到了『對立的統一』。

自此以後，我們開始看見士族青年傾向於革命。以前，革命祇是會黨、華僑子弟、受外國教育的香港澳門學生做的事情，那些候補未來統治人物的士族子弟，那些舉子、秀才、新辦學堂員生等等，并不參加。廣東香山縣翠亨村那個華僑子弟，未曾考得甚麼功名，甚至未曾赴過考，他識字麼，他能與著新學僑經考的康有爲相提並論麼，他配做我們的政治領袖麼？一八八三年，康有爲已經在朱次琦門下卒了業上西樵山去著作大同書了，那時孫文十七歲，雖畢業於檀香山基督教學校回至香港，英文能說能讀能寫，但尙未能閱讀華文書報，正開始從區鳳墀學習漢文。十年後，康有爲在萬木草堂講學，孫文在聖教書樓懸牌行醫，兩人居處相距甚近，孫文要結交康有爲，康有爲則不肯降格同他做朋友，而要他送門生帖子來拜師。三年後，孫文已經行過第一次革命了，吳敬恒還有這個成見。他在戊戌以前，意中『以爲這位姓孫的有甚麼紅眉毛，綠眼睛，是最厲害的公道大王』。『我起初不滿意孫文，就因爲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經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識字。』五年後，孫文來到東京，鈕永建邀吳敬恒去見他，吳敬恒不肯去。鈕永建回來後，吳

敬恒問他：孫文是怎樣的人？他說：『像一個書生，他的氣度溫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見第二人。』吳敬恒說：『真的麼？』於是大吃一驚。三年後，吳敬恒才在倫敦與孫文會面，果然『是美秀而文，真是不愧名文。』以上都是孫文死時吳敬恒寫的『我亦一講孫中山先生』文中的話。同文中，他回答人家問他最佩服孫文那一點時，他說他最佩服的是孫文手不釋卷，是拿買麵包的錢去買書。吳敬恒最可以代表當時覺悟的士族底心理。他起初輕視這個非從士族出身的革命領袖，後來畢竟爲了這位領袖『像一個書生』，又『手不釋卷』，才信服了他。吳敬恒正是庚子以後才從維新走到革命來的。他在『中山先生年系』中說：『今知先生所感痛苦，實如當時之人心何！明明我輩亦皆直梁啓超而笑孫文，必至庚子以後乃覺悟也。』

代表資產階級意識的士族青年之傾向革命，遂轉移了維新和革命兩個運動底運命。各省新派去的大批日本留學生，以及國內新辦學堂的學生教員等，紛紛討論維新和革命優劣問題。梁啓超和孫文這兩個運動底大領袖，當面討論了好多次。梁啓超以他的常帶情感的筆鋒，既寫多篇論文來反駁革命，又寫『新中國未來記』小說，假借兩個青年之口來討論這個問題。可是沒有用，覺悟的青年仍舊是一天多一天離開維新，走向革命。文壇宿將主編的新民叢報，新小說一類刊物，竟爭鬪不過無名青年，如汪兆銘，胡衍鴻，陳天華等人底民報。民報已經是同盟會成立以後的事情，同盟會本身則是士族青年傾向轉移完全成熟以後的結果。同盟會底幹部再不是華僑和會黨，如興中會底幹部鄭士良，陸皓東，尤列，陳少白一流人了；同盟會底幹部乃是一些留學生，其中有許多是科舉出身的秀才，舉人，甚至進士，翰林。他們是黃興，宋教仁，孫毓筠，汪兆銘，胡漢民，蔡元培。總之他們是全國各省（除甘肅外）士族青年底精華。這個傾向轉變，對於革命運動如何重要，孫文比別人更還清楚。當時的比利時留學生賀之才回憶道：

『中山先生自內地失敗後，避居海外，四出鼓吹革命，而聞者多擁耳却走，莫之贊助。無已，惟思聯絡秘密會黨，如三合，三點等會，若輩智識懸殊，不能與共大事，還快然而之英倫。又以旅靈空空，一舉步則舟車之費無所出，靈居愁城，其失意之狀可想矣（此事中山先生親爲余言之）。自至北京，始知智識界中亦有同調，不禁喜出望外。宣誓既竟，則爲極痛快之演說，亦若痛飲黃龍即在目前者，其得意之狀較之就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時實有過之。』

孫文知道智識界中亦有同調，自然不是始於一九〇六年在北京時候，他

一九〇三年在日本已親見留日學生底左傾了，但這三年來歷遊檀香山和美洲各國，所與交接的都是華僑和會黨，如今猝遇士族青年來加盟，難怪有空谷足音之感的。以後發生了叛徒盜竊盟書的事情，孫文自言他惶急之狀為倫敦使館被困以來所未有。他說，他當時害怕三點，第二點就是害怕「因此失去聯絡智識分子之機會。」

士族青年中關於維新和革命的爭論，究竟爭的是那些問題呢？歸納起來不外是：（一）民主共和或君主立憲？（二）排滿或不排滿？——這兩個問題是有相互聯繫的。

主要爭論在於前一問題。中國關於民主共和或君主立憲問題的爭論，其實是以寥寥幾年間復演了西方幾百年間的爭論。『要不要君主？』——這本是西方舊問題。西方與東方不同，歷史上本有共和國理論和傳統，如古代希臘，羅馬，及中古西歐諸城市，但雖如此，在實際政治上預先主張共和的人仍是佔據少數。英國資產階級并非懷抱共和思想去與查理第一鬪爭，牠祇要查理遵守『憲章』規定，行動受議會限制。查理不肯放棄他的專制君權，鬪爭依照邏輯發展下去，資產階級迫不得已才把查理送上斷頭台，而擁戴克林威爾為共和國保護人。克林威爾死後，革命風潮平靜下去，英國資產階級又連忙迎接那斷了頭的國王底兒子回來做立憲君主了。三百年來，英國資產階級并不覺得君主立憲比民主共和更壞些。美國資產階級一開始就主張民主共和，但那是因為美國本無君主。法國資產階級也不比英國底進步。十八世紀哲學家已經有民主共和思想了，美洲又有活的新鮮的共和國榜樣出現在面前，而且十三州獨立英雄之一辣斐葉特還回國來親身參加革命，但法國資產階級仍舊主張君主立憲。不僅費揚黨和季隆黨主張君主立憲，連山獄黨於八月十日事變以前也未會主張民主共和哩。法國民主共和也是為鬪爭邏輯所迫成的。那次模範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在法國本國，在德國，在意大利，以及在中歐諸大國和小國，『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仍舊成為懸而未決的問題，直至我們今日，在東方，則從日本開始變法時候起直至現在投降以後，這個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的。無論各國國情如何不同，雙方論據總是大同小異。我們試檢查中國當時的爭論，就可以發現雙方所提出的論據，並沒有甚麼新的，與他國爭論不同的。若非鬪爭邏輯發展，若非滿清政府過於腐敗，這個爭論恐怕還能延長幾十年！

有人說，『非滿或不排滿』問題，是中國爭論中特殊的論據。其實不然

。統治的君主適屬於外國種族，——這并非中國特有的現象。例如當初統治意大利的，乃是奧大利皇帝。意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在這一點上是最與中國相似的，難怪梁啟超如此喜歡稱道意大利建國。可是滿清皇帝屬於外國種族這一點，確是利於革命黨方面。在沒有共和國傳統的國家主張廢除君主制，是很難得人家接受的；但主張驅逐異族的皇帝，則容易得到人家接受了。於是資產階級走上了排滿道路。

這裏，有那產生於牠自身存在以前的舊傳統，可以供牠利用。半耕半牧的滿洲種族，利用農業的漢族內部激烈的階級鬪爭，士族和農民陷於兩敗俱傷的機會，又接受士族請求，佔領了全中國。從此時起，中國於階級鬪爭之上添加了民族鬪爭。這兩種鬥爭錯綜混合，形成二三百年的歷史。團團領導的農民戰爭，既反對漢族的明朝政府，也反對滿族的清朝政府，因為後者是士族請來鎮壓暴動的農民，而且歸根到底還是代表士族利益的。以後，農民暴動撲滅了，滿族政權穩定了，但二百多年中時常有農民戰爭發生，每次都採取排滿形式。農民，工匠及一般被壓迫者底階級鬥爭，是與民族主義相輔而行的，二者中間沒有甚麼矛盾。士族則大部份是擁護他們請來的滿洲政府的，但小部份認為這個政府過於『浪費』，那些韃靼武士不僅不退回關外，反要驅逐關內的地主，佔據土地，享受種種特權。這少數士族也要排滿，也採取民族主義，但他們不敢同農民聯合來推翻滿洲政權。朱一貴，林清，王三槐，洪秀全，張樂行領導的暴動，士族一般是不參加的。士族底排滿，用的是另外的方法。呂留良底私淑弟子會靜遊說征西將軍岳鍾琪，勸這位岳飛後裔利用他的兵權去驅逐韃虜出關，——就是此方法底標本。這件事情結果，是大家所熟知的。所以農民和工匠底排滿傳統雖經多次失敗仍能保持下來，直至辛亥革命；士族底排滿傳統，則會靜之後可說已經斷絕了。『自乾隆以往尚有呂留良，會靜，齊周華等持正義以震野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見章炳麟底革命軍序）農民和工匠不僅不同士族合作，反而竭力避開士族。孫文說：『然其事必當極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為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為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

孫文上書李鴻章時，用的還是改良方法；到他覺悟非用革命的方法不可時，他就發現舊有的排滿傳統在會黨裏面了。他不屬於『所謂士大夫之類』，所以容易同會黨接近，而利用這個傳統。

章炳麟則接續了士族底排滿傳統。章炳麟受業於俞樾，俞樾及其學統並無排滿思想，我們還不知道章炳麟怎樣接續那個傳統來的。他自少就不參加科舉，以未曾提過考監自誇。在排滿方面說，章炳麟功績不僅不讓孫文，而且過之。他發掘歷史，從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呂留良底學說中找出了『夷夏之辨』，從南明史料中找出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由於他的宣傳，革命遂脫去舶來品的彩色，而好像是自己的國粹，是中國歷史發展不得不然的，是士族自身應盡的責任了。他無需要改造傳統的孔子主義，就能使舊制度底意德沃洛基來替資產階級利益服務。

孫文底革命思想是多方面的，章炳麟則單純得多了。章炳麟明白反對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一類有關於財產所有權的學說；他接受共和國方案，僅僅因為天水，鳳陽，花縣都無遺類；他祇要排滿。他甚至主張用『光復』二字來代替『革命』二字。『抑吾聞之，同族相伐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見革命軍序）有人問他：『若政府已返於漢族，而有癸，辛，桓，靈之君，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諸？』他雖然回答：『是亦革命而已！』但接着，他解釋道：『然其事既非今時所有，安用喋喋多言爲？其事非有，而空設一主義，即等於浮漚。』故漢族之有暴君酷吏非今日所論也。……政治得失，外交善敗，亦姑棄捐弗道。舉一綱而衆目張，惟排滿爲其先務。』（見排滿平議）資產階級排滿，本是爲了滿清政府政治腐化，外交失策的，現在章炳麟則勸人祇要排滿就好，不必去管將來政治得失外交善敗了。這是誇大了民族主義底結果。

本質上是階級鬥爭問題，即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政治權力以保護牠的經濟利益；但這問題呈現爲民族鬥爭形式，彷彿不是地主，市民，農民三方面錯綜混合的鬥爭，而是漢族和滿族之間的鬥爭。如此倒果爲因，遂使這個資產階級運動現出反動的成分。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中說道：

『本來凡是狹義的民族主義的運動總含有一點保守性，往往傾向到頌揚固有文化，抵抗外來文化勢力的一條路上去，這是古今中外的一個通例，國民黨自然不是例外。試看拿破崙以後的德國民族運動，普法戰爭以後的法國民族運動，試讀民族國家主義的創始者非希脫的告德國國民書，便可以明白這個歷史通例。凡受外力壓迫越厲害，則這種擁護舊文化的態度越堅強。例如印度人在英國統治之

下大多數民族主義者都竭力替印度舊宗教舊文化辯護。有時候他們竟故意作違心之論。……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起於戊戌維新運動。戊戌運動的意義是要推翻舊的政制而採用新的政制。後來梁啟超先生辦新民叢報，自稱『中國之新民』，著了許多篇新民說，指出中國舊文化缺乏西方民族的許多美德，如公德，國家思想，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合羣，毅力，尚武等等；他甚至於指出中國人缺乏私德！這樣推崇西方文明而指斥中國固有的文明，確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新紀元。同時吳研人，劉鐵雲，李伯元等人的『譚查小說』竭力攻擊中國政治社會的腐敗情形，也是取同樣的一種態度。但那時國內已起了一種保存國粹的運動。這運動有兩方面。王先謙，葉德輝，毛慶蕃諸人的『存古運動』自然是完全反動的，我們且不論。還有一方面是一班新少年也起來做保存國粹的運動，設立『國學保存會』，辦『國粹學報』，開『神州國光社』，創立『南社』。他們大都是抱着種族革命的志願的，同時又都是國粹保存者。他們極力表彰章宋末明末的遺民，借此鼓吹種族革命；他們也做過一番整理國故的工作，但他們不是爲學問而做學問，只是借學術來鼓吹種族革命并引起民族的愛國心。』

集今文學大成的康有爲發起了這一資產階級運動，到了現在就由做古文學殿軍的章炳麟來繼續下去了。這一方面是進步的，因爲資產階級覺悟改良方法行不通，非走上革命道路不可；但他方面也是退步的，因爲問題縮小了成爲單純的排滿，而梁啟超倡導的西方政制，學術，禮俗，道德等，竟被人藉口保存國粹而拒之門外。辛亥革命結果，滿是排了，民主共和國也勉強成立了，但葉德輝，康有爲，章炳麟三派孔子主義聯合起來拒絕西方資產階級底意德沃洛基。思想革命陷於停頓狀態。須待俄國十月革命刺激才能再行前進。

## 失掉『紳士』風度的舌戰

『英下院激辯埃及撤兵：』貝文說：駐兵他國，不合潮流，與其被趕出，不如自動走。邱吉爾說：此舉毀滅了我人中英利益，切斷了帝國生命線。』（見五月二十六日大公報）歷史的老太婆莊嚴地作一句冗長的判語，說：『這是英帝國主義的一個『進步的』，『社會主義的』奴僕與另一個『保守的』戀戀於過去光榮的奴僕，在大英帝國這隻行將沉沒的破船上，發生了絕望的爭執，這種爭執完全缺乏紳士氣與幽默，而大英帝國的統治者減去這兩種特性，就是死亡的徵兆。』

# 波茨坦會議與德國問題

西 岑

波茨坦會議以後，歐洲大陸歷史的發展，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雖然各國疆界調整問題以及其他許多細節，尚有待於三強間的繼續商討；雖然那次会议所決定的重要計劃尚有待於未來的正式和會完成批准手續，但戰後歐洲的大致輪廓業已確定，此後歐陸歷史必須從一個新的起點開步走，至於走下去是禍是福雖不可知，但此種發展的大勢是已經無可挽的了！

倘若我們拿這次大戰為分水嶺，來看歐洲的形勢，那我們不難馬上看出：這次大戰以前，歐陸原有兩個互相排斥的中心力量（德、法），彼此維持着均衡，對其他國家放射着吸引力，并對世界其他部份放射着光芒。在他們的東西兩端，另外又有兩大星座峙立，各以其不同的強烈光輝放射到那兒去，演為史所未有的光怪陸離之局；這次大戰以後，情形可完全改變了！那原來『如日麗天』的幾世紀來成為多難歐洲之『安定力』的兩大星座，現在卻光輝頓斂，只能讓東西兩端的星座放射着萬丈光芒，而牠們本身只好變為簡單的受光體，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這形勢似乎沒有可能改變，這豈不是近代史上的一大變局？

要深刻認識這一歷史變局的形成，當然應從德法兩國的沒落過程認識起。法國自經十八世紀末的大革命以後，最早變成一個向現代化道路前進的國家，因而使她在歐陸樹立了領導的地位。但這一個多世紀以來，因為萊茵河對岸有一後來居上的國家和她在歐陸爭霸，又使她不能不從跌倒又爬起的状态中，長期消磨去無限的精力。特別是這一次的戰爭使她跌得最重，當她為希特勒的盾牌壓倒以後，她的殖民帝國的皇冠是被壓碎了！她的工業基礎是支離破碎了！一句話，她是從一等國的地位跌下去，不復能成為戰後歐洲重要支配力量之一了！初步結束歐戰的波茨坦會議，大體上說來，是決定歐洲未來命運的會議，而法國卻被摒於會議大門外，這和巴黎和會中法國代表叱咤壇站的情形是何等強烈的歷史對照啊！

絆，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這一中心經濟力量逐漸形成的結果，乃使普魯士在日爾曼各邦中發生一種強烈的向心作用，終至藉兩次戰爭（普奧，普法）完成了她的政治上的統一。故日爾曼帝國的上昇，實以這種政治上經濟上的集中化過程為其契機，沒有後者則前者實無長足進展之根據。第一次大戰以後，儘管凡爾賽和約加給她的束縛是如何的嚴苛，但只要不致搖撼到她的根本，她那龐大的集中化的機構，仍可以發揮出絕倫的威力，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中，重復凝成了一個足以向全世界挑戰的強大帝國。

平心而論，這一民族就其科學文化及其工業技術水平所達到的高度而論，對於人類文明確有其絕大貢獻。倘若這一民族的高度生產力能用來謀人類一般福祉之增進，而不是用來造成人類的大災害，這對於世界史的發展，不知將會產生何等深遠的影響！反之，倘因她曾經鬧過大禍，而將這一民族的歷史成就連根拔去，而人工地將這一民族的經濟生產條件拉着向後退，倒退到一個多世紀以前原出發點去，這實在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幕大悲劇！

誠然，普魯士黷武主義的德國，納粹野蠻主義的德國，向外侵略威脅着弱小國家生存的德國應該讓她永遠沒落，且在她失敗以後，應該試用一切方法以防止她的復活。但去掉這一切以後，一個嶄新的，科學發達工業進步的德國，仍可以其高度生產力為其本國人民乃至全人類文化造福。在納粹德國被打敗，英美蘇三強集議於波茨坦時，竟沒有一個國家肯從這個角度來莊重的考慮問題，這豈不是值得於我們驚訝之餘繼以深思的事麼？如果認為德國之所以為禍於世界，正是因為『科學發達工業進步』之故，非掃除這一切不足以正本清源的話，那麼，我們要問：近代文明曾經替我們帶來過無窮的弊害，我們為着掃除這些弊害，是不是可以將近代文明澈底毀棄呢？由於德國這一實例，使我們覺得：為要拔除萊茵河畔的毒草，非將那兒長着嘉禾的土壤根本犁過一遍使其變成『蕪荒』不可，這表示近代工業文化所派生出來的

之差，而在基本性質上實有其截然相異之點。會議除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普魯士黷武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復活而外，顯然走得更遠，它把整個德國在根本上給改造過了！改造的原則着重以下兩端：第一，在政治上使德國走向地方分權化的過程，亦即是在某種程度內使她返回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的各邦離立的狀態中去；第二，在經濟上通過工業設備的轉讓，產業的改組與管制，以便造成一種「反集中」的趨勢，而其歸趨則在於把她變成一個以農業為主工業為輔的國家，庶幾可與政治上倒退的步調相符合。

這種使德國倒退的政策，不僅不能與德國廣大人民的利益相符合，且亦不能與人類一般的利益相符合。理想的進步的世界，應以舉世各國物質生產條件不斷的進步為基礎，而絕不應以某些國家經濟生活的停滯和倒退為前提。犧牲某一國物質文明的既有成就，摧毀其本可造福於全人類的高度生產力，以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之必要條件，則這種新秩序自始即與所謂「公理」和「正義」的原則不相符合，如何能期望它替戰後的人類帶來「經久的和平」和「普遍的繁榮與安定」呢？

或者有人說，德國民族「好戰成性」，非如此降低其生活水準，使自食其戰爭苦果，不足以為好戰民族戒；或者有人說，德國之所以能够兩次向全世界挑戰，正是因為他們在科學上和工業上擁有高度的成就，所以驕傲與舉世為敵，為正本清源計，非從這兒着眼加以削弱，不足以一勞永逸消滅其戰爭潛力。這兩種見解，經過全世界報章雜誌的普遍宣傳，儼然變成了權威的輿論，實則其論據是既薄弱而又十分可笑的。

說德國民族「好戰成性」，這不啻是將挑動戰爭的責任加在一般德國人民肩上，而輕輕開脫了德國大財閥大地主的罪名。其實一般德國人民何嘗不想安享和平就業的幸福，何嘗不知道戰爭對於他們只會有所失決無所得？但在受着本國統治階級的欺騙愚弄和壓迫以後，儘管他們滿心不情願，依然不能不被編到戰鬥行列中去。通過近代龐大的集中化的國家機構，通過憲兵和警察的組織，通過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訓練，通過形形色色的報章雜誌的鼓吹和各種類型的戲劇式的集會宣傳……統治階級儘可以製造出一串莫須有的理由來騙使該國人民為其狹隘的階級利益而戰，任何一個公民要想反抗他們的罪惡企圖，不是會陷到憲警的羅網裏去，便是會像第一次大戰時法國的若萊士一樣，徒然蒙受賣國賊的罪名被人刺死！德國人正是這樣被騙入作戰的壕壘中。當他們既被置諸死地以後，自然會像野獸一樣發揮着驚人的殘酷性

和破壞性，其結果是將毀滅帶給他國人，也將毀滅帶給了自己。可憐這些德國人既做了本國統治階級「贖罪的羔羊」，到頭來還得替他們分擔受過，這豈不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麼？人們譴責德國人「好戰成性」，不好戰便應該怎樣呢？那自然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本國「好戰」的統治階級，使其罪惡企圖不能憑藉國家政權機關以求其實現。而這一層恰恰正是英法各國當權政黨所最為恐懼的。當年希特勒之所以能一再敲詐英法兩國使其在許多重要問題上讓步，便是因為他手上拿了有兩張牌：一張牌是戰爭，一張牌是德國內部可能發生的革命。這些國家害怕後者較之害怕前者為尤甚，自然不惜採取一切步驟幫助納粹黨人鞏固其國內的政治影響。所謂「綏靖政策」，實質上便是這樣一回事。等到德國內部一切革命的可能性完全被排除之後，面臨着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的德國，自然只剩下唯一的一條出路——這便是戰爭！照這樣講來，此次戰爭之發生，不啻是英法兩國當權「求仁得仁」的結果，如何能把全部責任加到一般德國人民頭上去呢？

德國革命被絞殺，納粹統治被鞏固，這無疑是加速此次戰爭到來的最主要的關鍵。而這一過程之完成，不僅英法兩國當權的綏靖政策有其「貢獻」，當年克里姆宮主人指導德國革命的政策亦有其卓越「貢獻」。原來在希特勒尚未當政之前，社會民主黨本是最有勢力的第一大黨。它在覺悟程度不夠的廣大勞動人民中，乃至廣泛小資產階級羣衆中，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政治影響。和他們合作，推動他們走向堅決的反法西斯的鬥爭，這無疑的會給納粹政黨接近政權的企圖以莫大的打擊！可是當時克里姆主人卻別有會心，他把社會民主黨看得比真正法西斯還要可怕，并且特製一頂「社會法西斯」的帽子送給前者，讓德國人民在需要堅決行動時迷亂了鬥爭的方向。後來故事的結束如所週知——真正的法西斯勢力卻趁着德國一般人民政治上陷於迷惘的時期，得以無阻的將國家機關接收了過去。我們今天之所以將這個故事翻騰出來，倒不是為着追究責任，為的是從這兒獲得教訓：德國當時的革命，倘能在正確政策領導之下，擊敗希特勒走近政權的企圖，以此為起點，德國的歷史乃至歐洲的歷史是否都有可能改變面貌呢？

德國民族為着解消其內在的深刻矛盾所作的這種自費的努力，在客觀上實在是想迂迴一次不可避免的國際戰爭，當這種努力為國內外各種不同的社會勢力所打銷以後，加劇的內在矛盾終於引導着他們盲目的向不可知的深淵——戰爭——中跳了進去。人們正當走投無路的時候，惡魔自然很容易乘

虛而入的來誘惑他們說：「來！我指引你們一條新的出路。在這條路上既沒有經濟恐慌，也沒有失業，有的是興盛和繁榮！有的是勝利和光榮！」你想德國人於革命失敗之餘，還是會聽任他們的社會窒息於內在的深刻矛盾之中呢？還是會聽信惡魔的誘惑而冒險一試呢？這就是德國人民何以能像綿羊一樣聽任本國統治階級把他們牽引到戰爭的「屠場」上去的原故。

至於將戰爭之發生，歸咎於德國科學和工業的過度發展，這尤其是不經之談！其實科學和工業何嘗有負於人類？人類要利用科學和工業來進行相互間的屠殺，這乃是人類的瘋狂和愚蠢，我們絕不能因此將一腔怨氣向科學和工業身上發泄。拿德國的例子來說，德國的毛病並不是在於科學和工業的過度發達，而是在於它的成果未能為德國一般社會成員所享受，卻偏偏被壟斷到極少數的大財閥手裏去，以致釀成了經濟上畸形的充血病——這就是所謂生產過剩。由於生產過剩便不能不提出重分世界市場的要求；由於這要求不能得到滿足，便不能不之以武力搶奪的方式，否則長期的經濟恐慌和嚇人的失業數字，便會搖撼到它整個的社會經濟基礎。德國之所以不在到半個世紀的時間中，發動兩次世界規模的大戰，其原因固可求之於上面公式的簡短敘述中。問題決不在於德國科學和工業的發展——其實就德國人和整個人類的一般利益來講，德國的發展還應該向更高的階段推進；問題是在於社會生產與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使得科學和工業不但不能增進一般德國人的福祉，且反而替他們帶來無窮的禍害！我們如果有勇氣正視問題，應該首先着眼於此；我們如果有勇氣正當的解決問題，更應該針對着這一癥結來尋求解決之道，否則必然會在新的偏見和錯誤中創造出新的歷史悲劇。試想以德國那樣重要的民族，其一般的水準業已達到那樣的高度，簡單用古代羅馬人對待迦泰基人的辦法，不但是行不通，即使行得通，也是人類歷史上可恥的暴行。過去人們曾經一再宣佈過：這次的戰爭是爲着打倒納粹的暴力而戰，決不是爲着打倒一般德國人而戰，但波茨坦決議的基本精神，恰是爲着打倒一般德國人，否則有什麼理由平白地把她由工業國貶抑到農業的地位，使其文化水準伴隨生活水準而一致降低呢？

在波茨坦會議中，英美等國一致贊同這種虛置德國的方案是很可以理解的。因爲她們改造德國的計劃，有一個基本的大前提，那便是維護私有制的神聖。因此，在他們看來，德國任何好的東西都可以犧牲，獨有社會組織的

導因，這樣仍可以保全德國的科學和工業，而不致爲禍於人類。但他們對於這一方案絲毫不感興趣。你說保全了德國社會組織的基本型態，同時又保全了德國的科學和工業，其結果仍然非闖禍不可嗎？好，犧牲牠的科學和工業好了！至於此舉對於一般德國人乃至整個人類的損失究有多大，他們是不遑估計的。

英美等國對德國採取此種死硬派的態度，本來是毫不足怪的。因爲他們絕不願經過德國這個例子向世人證明：資本主義的病態的社會組織，卻是陷人類於兩次戰爭浩劫的根因。只是素以社會主義國家相標榜的蘇聯，何以在這個問題上也和英美等國同一鼻孔出氣呢？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曾以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相號召，以對抗列強的分贓計劃，而此次蘇聯在波茨坦會議中，不僅要索賠款，且以撤取德國一切重要工業設備爲最主要的賠款項目之一。這樣一來，迫使德國歷史向後倒退的運動，不啻是由蘇聯發其端，這將何以自解呢？資本主義國家需要以他國爲犧牲來鞏固其一國的經濟利益，難道社會主義國家也需要以他國爲犧牲來鞏固其一國的社會主義麼？歐洲喪失了一個擁有高度工業文化的德國，喪失了一個擁有大量工業人口的德國，這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開展，將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克里姆宮主人對於此類問題多年以來似已不感興趣，無怪他可以拿德國一般勞動人民的利益作爲犧牲，從容坐下來和其他國家討論消滅德國工業基礎，亦即是根本撲滅德國革命可能性的方案了！

德國在波茨坦決議的支配下，是否真會不折不扣的變成一個歐洲不重要的農業國呢？據他們觀察，問題似不能如此簡單。一則因爲技術文化水準業已達到如彼高度的德國民族，要想一舉而使其社會歷史條件向後倒退到一個多世紀以前的狀態中去，這乃是很少有此可能之事。古代迦泰基人的商業文化，可一舉而壓倒在羅馬人的盾牌之下，歸於漸滅；類似的例子，在近代史上似尙不會見過。固然，國外的壓力可使某一民族的文化進展陷於停滯不前的狀態中，這是近代史上數見不鮮的事；但毀滅某一民族業已達到的較高文化水準，或使其全部歷史發展方向完全向後倒退，這只能作爲一個玄學的命題來設想，近代國際社會生活是如此的血肉相關連，除非能將德國放到真空中去，否則這一類與資本主義世界客觀發展規律完全整枘的企圖，必然是勞而無功的。再就參加波茨坦會議諸國的相互關係來說，他們彼此間的嚴重爭

# 戰後世界經濟特徵

竹雲龍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說，二次大戰爆發的原因，與一次大戰同樣，是高度生產力受了國家界限的束縛而起的一種爆炸行爲。首先發動軍事行動的國家，總是殖民地較少的國家。

戰爭，這一歷史上不斷發生的現象，具有兩種不同的性質；一種戰爭能解放生產力，推動生產力，使人類的經濟生活向上發展。另一種戰爭却只能摧毀生產力，使人類的的生活退後幾十年。我們不談別的，單說二次世界大戰，它除了給人類無比巨大的破壞之外，更創造了原子彈來威脅整個人類的生命財產。它業已指示出『燬滅』是怎麼一回事。其他，我們看不出任何有利於人類的因素。

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不是別的，是人類自相殘殺的行爲，是每一種經濟制度不能向前再發展的象徵，是人類生產力被各個『勢力圈』限制着且操縱着的炸裂或內爭的現象，是經濟關係世界化社會化而政治枷鎖阻止她發展的悲劇。二十世紀的戰爭，大都是爭奪市場原料和廉價勞動力的戰爭。進攻的一方面，總是貧血的急需殖民地的國家；被侵略的防守的國家，除了弱小民族與社會主義蘇聯之外，總是『富有』的甘心維持舊秩序反對『新秩序』的國家。引起一次二次大戰的經濟原因仍舊存在，所以有三次大戰在威脅人類，且準備毀滅人類。

一個瘋子也不會說二次大戰對於人類有利，有理智的人當然更不會這樣說或這樣想。可是，二次大戰究竟給人類以多少損害呢？讓我們試行作一次大胆的估計吧：

(一) 在勞動力方面，自從一九三六年各國以全力擴充軍備起，直至一九四五年大戰告終，全世界所消耗於軍火的『勞動月』——即每一工人每月的勞動量。估計如後。

美國，前後平均三百萬軍火勞動者，九年間消耗『勞動月』三萬萬二千四百萬月。

英國加拿大澳洲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前後平均三百萬軍火勞動者，九年間消耗與美國相等的一『勞動月』。

德國(包括匈、奧)前後平均四百萬軍火勞動者，九年間消耗『勞動月』四萬萬三千二百萬月。

日本(包括台灣朝鮮東北及別的曾經佔領的地區)前後平均三百萬軍火勞動者，九年間消耗『勞動月』三萬萬二千四百萬月。

義國前後平均一百萬軍火勞動者，八年間消耗『勞動月』九千六百萬月。法國前後平均八十萬軍火勞動者(淪陷時期在內)，九年間消耗八千六百四十萬『勞動月』。

歐洲各國(包括比、丹、荷、波、南、羅、保、芬、挪、瑞典、西、葡、希、捷)前後平均一百五十萬軍火勞動者，九年間消耗一萬萬六千二百萬『勞動月』。

亞洲各國(包括中、土、以及近東諸國與遠東各國殖民地)前後平均八十萬軍火勞動者，九年間消耗八千六百四十萬『勞動月』。

蘇聯自一九三三年起即致力於國防工業，十一年間平均軍火勞動者四百萬人，共計消耗『勞動月』五萬萬二千八百萬月。

南美及非洲不計。

以上合計消耗二十三萬萬六千二百八十萬『勞動月』。

以上合計消耗二十三萬萬六千二百八十萬『勞動月』。



流亡等過程中的；五、間接的戰時救濟方面的。

據國際聯盟兌換銀行報告，一九四五年夏季止，世界各國國庫所負擔的二次大戰的經費約達六千八百萬美元。這是兵士及戰爭行為的直接消耗。軍火工人及其他間接消耗無法統計，如果要加以估計，大約在四千萬萬美元左右。這一萬萬萬美元的消耗，如果用在公共事業，世界早已改變了面目！

(三) 戰爭行為所破壞的田園、道路、房屋、工廠、機器、港口、礦洞等等，各國都沒有公佈正確的統計數字。但是，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

二次大戰把百年來努力向外發展的德國工業基礎摧毀了。這是近百年來德國幾百萬工人所生產出來的社會財產。可憐的義大利工業也大部分為二次大戰而犧牲了。日本也損失了相當數量的工業。並且，在戰後，這三個國家有許多工業設備還得受炸毀拆除等等的處分。今後，這三個較弱的先進國家，短期內不能再起什麼世界作用了。二次大戰使這三個國家差不多毀滅了經濟基礎。這幾十年來三國人民所建立起來的社會財產，大部份毀了，這不能以金元計算的。

全歐洲豐美的田園，數年中被德軍蹂躪得一塌糊塗。中國及其他亞洲各國受日軍的破壞也很可怕。困苦的非洲人，經過此次戰爭的影響，益發困苦了。蘇聯的歐洲部分大半支離破碎，敗壞不堪。英國已宣佈了破產，法國的破產則是二次大戰以前的事了！以金元數字來估計二次大戰對全世界社會財產的破壞程度，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這些財產是人類幾千百年的勞動與思想的結晶，這些財產是和平時代歷史的果實。金的希馬拉亞山與這些東西比較起來，值得什麼呢！

(四) 同樣無可估計的，是因戰爭而直接間接死亡的生命。德國人民受轟炸而傷亡的約在二三千萬人之間，戰死的壯丁約在一千萬左右。蘇聯死傷的壯丁約在二千萬左右，法國約三四百萬，英國約二三百萬，義大利約二三百萬，日本約四百萬，中國約六百萬，美國約二百萬，其他歐洲各國約一千萬。軍事蹂躪地區的人民傷亡數，歐洲約四千萬，亞洲約六千萬。不但如此，大戰還降低了人口的繁殖率，殺害了無數應該生存的嬰孩。為二次大戰所犧牲的人民的血，可以匯成一個血海。戰士和受難者的白骨，可以堆成一座無比大的金字塔。這些，是無價之寶的人底生命的無謂犧牲。歷史已第二次記上這筆血賬了！再能來第三次第四次嗎？兩次戰爭，犧牲了參戰國兩整代有用的人力，這更不能以金錢為尺度來估計其損失的！

(五) 全世界工業的生產力，經過二次大戰，都表現出一般的下降或極度的低落趨向。就是中立國及美國，在戰後也表示出生產力不能提高；因為戰爭「生意」沒有了。世界經濟受了二次大戰的打擊，破敗不堪，幾十萬美元善後救濟物資，無補於事。正常的經濟關係，不知何時才能恢復一部份，換言之，生產力尚不知何時能稍微提高。一個又廣又深的經濟恐慌浪潮，剛剛在生產力極度敗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很明顯的，二次大戰以後的經濟復興，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聯軍尚在歐洲駐紮不動，英軍在各殖民地大演鎮壓革命的好戲，英美蘇法中等國不知何日始能辦好復員事項，三次大戰的暗潮且在日益增漲。

總之，二次大戰使人類損失了上萬萬生命，一整代壯丁，近百年建立的大半社會財產，十年間全人類的勞動結晶物，且使全人類陷入痛苦的深淵。

大戰帶給人們以金融紊亂與物價高漲，且在戰後只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紙馬克曾經流遍歐洲，一九四四年的估計為四百九十億馬克，一九四五年當然加速惡性膨脹，現在已是廢紙了。法郎自一九三五年開始跌價直到現在，並沒有好轉的象徵。里拉貶值的速度雖則缺乏數字表現，意大利不能建立國際貿易關係却是事實。盧布的膨脹貶值也是很自然的事，並且，蘇聯軍用票又飛向各個佔領地區，將來的結果也不難想像。日軍的佔領區受蹂躪的程度，並不比德軍蹂躪區輕，各地在「分而治之」的毒政統治之下，發行多種無準備的紙幣，隨着日帝的崩潰而幾乎作為廢紙，且有大部份已經廢紙了。歐洲各國的金融情況，只有小小的瑞士不十分受戰爭的影響。英國的殖民地如印度也在通貨膨脹之中，一九四三年的發行數字已較一九三九年增高一倍以上，現在當然更糟了。中國的金融現狀大家看得很明白，不必多說。日德意三個戰敗國的金融近況，只向壞的方面發展，並無起色。英磅購買力較戰前稍差，美元亦貶值約百分之三十。

資本主義世界的資金，十餘年來，受了戰爭的威脅，不歸逃避到美國去。美國官方公佈「外國在美資產之詳盡統計數字」共為一百二十七萬萬九千九百萬美元。這一二百二十多萬萬美元的「外國在美資產」，大約都是「外國政府或銀行等機關在美國的流動資產，至於外國私人或企業逃避去的資金到底有多少，美國直至今日尚未公佈確切的數字。



流去；造成美國集中全球存金十分之八的歷史奇蹟，也同樣造成各國紙幣膨脹幣值狂跌甚至崩潰的現象。更有興趣的是：各國資本儘可能避向美國，而美國金融資本家却對各國大量放債！

表面上不貶值的美元，與時常在跌價盤中的各國貨幣，相互對照一下，顯出世界經濟的極端矛盾與無出路。財富在美國愈集中愈發達，而其他各國則日益衰落貧乏，降為美國資本的經濟俘虜。跌在經濟恐慌與破產漩渦之中的各國，與保持短期的虛偽繁榮的美國並存在這世界上，尤其覺得世界經濟沒有出路，且陷於矛盾的絕境。

以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為標榜的蘇聯經濟，雖則不直接受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支持，但間接地却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不可分離，且受外圍的影響很重大。尤其因為有不斷的戰爭襲擊的可能，所以，在平時，蘇聯特別重視國防經濟，一遇戰爭，則又將前期經濟建設的成果消耗了，甚至完全破壞了再生產的某一部分基礎。二個半五年計劃的成果，差不多全消耗在二次大戰之中，而三次大戰的影子又在面前搖搖幌幌，迫使她實行新五年計劃，仍以國防為主要目的，換言之，人民生活需要仍被擱於次要地位。且因為歐洲部份受戰爭損害非常嚴重，所以，一方面將新五年計劃建設的目標移至東方，一方面在四週儘其可能搬運『戰利品』，增強蘇聯的國有財產的數量，希望增高新五年計劃的產量，至於質量方面，還是其次的問題。很明顯的，蘇聯本來有樂觀前途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受了世界戰爭的威脅與直接破壞，受了優勢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壓迫，前途就並不可樂觀了，且日益顯示兩種經濟體系——強的資本主義與弱的社會主義之間的不調和，更迫使蘇聯的經濟發展遲緩或停滯，產生蘇聯內部國有財產與私有資本之間的不斷衝突。（雖則蘇聯官方於一九三六年即宣佈蘇聯的階級分歧已消滅了，社會主義已最後地完成了；但事實並不如此，蘇聯沒有大資本家是事實，但小資本家，手工業者，農村富有者，尚有大量勢力存在着，合作社之遍及全國，手工業之並未崩潰，是個很好的證明。最近官方更公佈銀行存款數字激增，這一方面說明虛布膨脹，一方面也說明財富又以金融方式漸漸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裏了）。

金融方面的情形，是經濟發展的寒暑表。通貨膨脹，濫發紙幣，物價狂升，黑市普及全球，物資普遍缺乏，……這些，都是現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和結果。

二次大戰已經把世界金融攪得不像樣子了，可是，二次大戰並未解決世

盾與危機，且只有日趨嚴重的可能。

金融情況是經濟現狀最集中的表現。如果戰爭始終在威脅世界，就是說，如果經濟矛盾所引起的戰爭始終在威脅世界，則世界經濟的矛盾與金融紊亂的情形，只有向壞的方面發展。二次大戰對世界經濟的破壞與打擊，比第一次大戰無比地巨大且無比地深刻。

× × ×

在新的經濟恐慌與革命暴動尚未正式走上歷史舞台之前，人們顯然對已逝的二次大戰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子。英法軍隊不肯各自撤回，蘇聯軍隊的復員計劃只寫在紙上，美國雖遭受兵士的暴動抗議還在拖延復員日期，德國壯丁給勝利者當牛馬似的指揮着在做苦工，幾百萬日兵散處各地不知何年月能完全回國，西班牙和土耳其還想以一點可憐的軍隊抵抗國外的強力壓迫，中國軍隊整編計劃於勝利後半年才訂立起來，且不知何年月開始實施。

無論那些英雄們如何地希望再來一次升官的機會，但二次大戰却不再回顧這批英雄們。戰爭已過去，全世界必須復員，拖延復員一天，等於在二次大戰的戰費賬上多加上一列數字，也等於將未來的失業狂潮延遲一天發生。

各大參戰國尚未大部復員，失業問題尚未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與經濟問題，但這問題終究有一天要發生的，並且事實上人們已經開始談論這個老問題了。二次大戰以戰爭解決了戰前的各國失業問題，這是萬分殘酷的解決辦法，且也並未把問題解決。戰爭一停止，復員一開始，失業問題反而更嚴重起來，因為在戰爭之後，一個經濟恐慌時期必然要發生的，甚至可能是長期的恐慌呢！資本主義制度創造出一羣經常的失業者——產業後備軍，以便應付繁榮期間努力的急需，但一至恐慌時期或生產停滯時期，半失業業者就變成失業業者，原來有職業的人也跌入失業羣了。戰神更從各生產部門調出大批人，到戰場上和軍火工廠中，戰爭一停，這批人也大都『失業』了！怎麼辦？

戰爭雖則殺害了上萬萬的人民，他們到底是死了，完了；但繼續活着的人，却活得比死痛苦萬倍！蘇聯有二千萬人流離失所，波蘭有二百餘萬，佔全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受德軍蹂躪過的歐洲，沒有一處不鬧房屋荒，受炸最慘的倫敦與幾次經過大軍出入的巴黎，屋荒最嚴重。經過聯軍大規模轟炸之後的德奧比荷法等國沿海大城市及鐵路交叉點，大部份房屋毀了，勝利的佔領軍佔據着僅存的好房子，讓那些戰敗國的無辜人民流離失所。在天空有人

利用飛機運輪奢侈品或旅行的時候，地下却有無數人民用赤着的雙足徒步走回老家去，而那個幻想中的老家是否存在，也沒有人能預知。

都市方面的轟炸與巷戰，毀了無數房屋財物與生命，但零星的農村游擊戰更厲害地摧殘可憐的落後鄉村。戰後，有錢的人不敢在鄉村建新屋，窮人則從不幻想這個。在都市方面，人們尙埋頭於整理與修補，還談不上建設。

戰爭迫使生產力集中於軍事工業，與人民生活有關的輕工業都拆除了或改造了，尚存的輕工業又只能接受戰時定貨，造成普遍的民間物資缺乏現象；全球停戰快滿一年了，物資缺乏的現象並未有減輕的徵兆。

農民是戰場上的主力。年壯的農民大部份集中在前線，必然影響農業產量，落後國的農業則更受勞力不足的打擊。戰時的橫徵苛捐，主要以農民為對象，迫得農民處於絕境而無法改善耕種，甚至有農民捨棄土地而流為土匪。工業品過份的上漲又使農民蒙受許多意外損失。最後，戰線的時常移動，又不斷影響農村的下種耕作與收穫等工作；在收穫季，必然發生奪取食糧的大決戰，則更使食糧生產急降。戰時，糧食恐慌已經很嚴重，但戰後，這一問題更形嚴重。產米國如印度的農民沒有米吃而餓死幾百萬；中國農民家中僅存的食糧在戰後還遭受武裝徵糧員的光顧。美國農產部宣布目前世界最大產糧國存糧較去年初減少約百分之二十五。而杜魯門又呼籲各方面支持他的食糧救濟政策，據說，印度日本的產米量較最低消費量尚差百分之十五左右。對於中國的救濟工作，據說也在加緊進行，可是，軍糧存糧問題鬧得全國惶然不安，有些地方米價已漲至每石十萬元！陷於飢餓中的人民何止三十萬！至於歐洲方面的情形，簡直不能以統計數字來說明食糧恐慌的程度，美國記者的實地視察報告，常常描寫出無數悲慘絕頂的情形，例如：一個老嫗在廢墟裏找尋麵包殘餘。倒在路旁的奄奄一息的人伸出骨瘦的手向行人乞食。到處都以一種毫無營養的湯充饑。各處的民衆都瘦弱不堪……因爲歐洲經過歷史上無比殘酷的大戰，歐洲經濟事實上陷於極端混亂與恐慌的情形之中，糧食問題更嚴重得很。今日軍糧消耗還佔食糧消耗額中不大不小的一份，且是優先享受的一份，所以，食糧問題必然日趨嚴重。

在飢餓普遍化的時候，配給制度應時而生，但一切配給制度不能創造奇蹟，不能把飢荒改變成溫飽，只能把飢荒擴充到各處去，且使特權者比平時多吃一點而讓平民的袴帶更抽緊些。一切對食糧的限價與禁止囤積辦法，不

麵包與和平是不可分離的！沒有和平就是人民失去了麵包的意思。除了全部壯丁復員與恢復農村生產之外，無法解決目前全世界的糧食恐慌。而復員問題與恢復農產量問題，在落後國，又取決於如何使農民有土地可耕種的問題；並且，這土地必須是屬於他的私產，他然後才肯好好地耕種，收穫也必須完全屬於他的，他然後才肯努力地耕作。

×

×

×

「國家社會主義者所作暴行之多，足以使人以爲彼……不會在英國發生。……以前許多認爲係德國特有的現象，現時在英美亦已見慣不驚，並且還有許多象徵指示出，我們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譬如對於國家的日益尊崇，對於所謂「必然趨勢」之無考慮的接受，對於任何「組織」即所謂「計劃」之熱烈歡迎等。這危險的性質，以前在德國未爲人所預料，現時在英美更未爲人所了解。……」一位自由主義派經濟學家——海克教授在所著「到農奴制度之路」裏面說出這一段話。不管他的立論點如何，但是，他有一個正確的預感：世界資本主義都趨向於「國家社會主義」，換言之，全世界法西斯政治的經濟基礎，正在日漸擴大。

這一預感或警告，好像是不可能的事。因爲法西斯政治與侵略國剛剛打倒了不過半年，難道法西斯怪物又在活動了嗎？

「今日最使人不安者，即在英美兩國中可以看到同樣的權力集中，同樣的……在「保守的社會主義」口號之下，大多數的作家曾經布置好了國家社會主義成功的空氣。現在在我們中的優勢趨向，正是「保守的社會主義」。」海克教授又說。

國家機關干涉經濟問題，不自近代始，但政府的完全操縱國民經濟，則是近代的事！不管理論上把這種新的大規模的干涉，說成如何有利於國家及人民的事，不管人們把這種資本主義的新傾向說成「計劃經濟」或「集體經濟」或「統制經濟」或「計劃的自由經濟」……，但事實總是事實。

金融寡頭操縱一國政治及經濟政策，如沙赫特之指使希特勒，早已不是二次大戰以後的事了。我們只想一想所謂反法西斯的法國「人民政府」的下場，也可以想像法蘭西銀行對於法國政治的力量了。英格蘭銀行之對於英國政治的關係，則更明顯異常。現在，這兩個銀行已完全變成政府的「中央銀行」了，說得動人些，「收歸國營」了。事實真的是政府在「收銀行獨

銀行歸國有，有兩種方法，一是有代價的收買，一是無代價的沒收。前一種方法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如希特勒之對於沙赫特。後一種方法是共產主義的，如俄國革命黨之對待俄國的金融資本家及貴族。表面上看來，兩種國有都一樣，但實際上完全不同，前者的結果是銀行操縱政府，後者的結果是政府操縱銀行。

一些幼稚的民主幻想家，以為英法波蘭等國銀行國營策是理想中的社會主義的開端，却不知道這就是法西斯政治的經濟基礎！哀哉！

經過一次世界大戰，經過一九二九年以後的經濟恐慌，經過與英國資本在全世界作二十年的投資競爭，經過二次大戰前期的大軍火貿易，美國的托拉斯機構已發展到非常驚人的地步，以摩根為首的美國金融寡頭，經過二次大戰的勝利門，已贏得一個世界了。貝爾納斯聲言『世界不容分割』，弦外之音，不言而喻。

法西斯政治不是別的，就是一國金融寡頭操縱政治向外發展的一種突破現狀的姿態。一切以『國家』為幌子，實行種種有利於本國托拉斯的政策，有時不惜以戰爭來解決經濟問題。希特勒驅逐猶太人，目的是猶太人在德國的財產。高呼反共與爭取德國的解放，實際上不過在謀取德國金融資本主義的集體出路，事後的德蘇協定證明他並非政治上反共，而德蘇戰爭更是經濟原因迫成的（當時歐洲已開始糧慌）。因為德國的托拉斯太貧乏，先天不足，所以要如此窮兇極惡地橫幹。我們可以預言，如果英法兩國遇到嚴重的經濟恐慌時，『國家社會主義』一定抬頭起來；美國也不能例外，或者情勢比較緩和些。在越貧乏的資本主義國內所生出的法西斯主義，也就越殘酷越富於爆炸性。經濟原因決定政治動態。

自由經濟問題，經濟民主問題，以及消滅所謂官僚資本問題，在世界各國日益成為經濟評論的對象與主題，且圍繞着統制經濟爭論，得不出一個好結論。這些事實叫現代經濟學家不要在二十世紀做十八世紀的美夢，統制經濟不可能停止活動，並且，金融寡頭早已經過政府機關來統治一切經濟活動了，這不是法西斯政治的經濟基礎是什麼呢？

統制經濟，戰爭，法西斯及其代用品，有機地互相聯系着，如一套折光鏡中的人影。這個『人』是誰？

經過幾年的苦戰，犧牲了無數的生命財產，終於把一方法西斯魔鏡打碎了；可是，待我們換上一塊新鏡子的時候，且正在我們興高采烈地慶祝自己

的得意傑作的時候，舊的人影又出現在新的鏡子中。

× × ×  
雖然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停止了發展，且如英國那樣表示急劇地衰落；而殖民地經濟經過幾百年不同過程的發展，已達到非獨立建樹經濟體系不可之地步。

× × ×  
舊的帝國主義如英法和日德意，前二者在衰落，後三者已被摔出帝國主義的競技場。一羣半帝國主義半殖民地如加拿大巴西澳洲紐西蘭……在興起；一羣舊的小帝國主義如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土耳其捷克波蘭……在向殖民地方面發展。資本主義體系形成一幅絕妙的圖畫，一方面是美國的繁榮與強盛且企圖獨霸世界，一方面是舊帝國主義的崩潰衰落與新的半殖民地帝國主義的興起。且尚有印度越南東印度菲律賓等等紛紛起步加拿大的後塵。已往幾百年歷史已證明帝國主義霸佔世界經濟是不可能的事，且必然因此發生世界大戰；但只要資本帝國主義經濟制度存在一天，它就一天不肯放棄經濟侵略，不肯放棄對落後國的剝削，此種經濟政策與落後國的完成獨立經濟體系的發展相矛盾，也因此必然引起無窮無盡的經濟衝突與世界戰爭。

× × ×  
在資本主義體系的一旁，又有號稱佔地面六分之一的蘇聯社會主義體系存在着。雖則在技術，地下埋藏量，資本累積，交通網，……各方面比不上資本主義先進國；但已往的三次五年計劃的成績，證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進步，且在一般資本主義生產力停滯不前的近代，蘇聯的生產力還是在向上發展的趨勢中前進，如果沒有世界大戰的威脅與打擊，蘇聯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或許會表現出更多一些經濟優點，不幸蘇聯的週是資本主義體系，更不幸的是蘇聯則宣布一國閉門建設，而又不不能不出而過問世界紛爭，甚至有時成為紛爭的主角。一國閉門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雖仍實行，但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躍為世界第二強國的今天，這扇門不能閉也不會閉，這是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矛盾，也是世界資本主義與一國社會主義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之產物。

× × ×  
世界經濟充滿了各種矛盾，正因為有這許多矛盾，世界經濟才能繼續向前發展，且以消滅不合理的矛盾為其必然的邏輯結果。最主要的戰後世界經濟特徵，就是美蘇之間的經濟不調和；也就是兩種經濟制度的不調和，兩種生產方式的不調和。它迫使人們去思索何種經濟制度是現世界所需要的？

# 戰後蘇聯之經濟

彼得F·戴勒喀著  
劉少嚴譯

譯者按：這篇文章揭載於今年一月份之「哈拔雜誌」中，原名「俄國也處於困境中」。作者是一位經濟學者，現任美國白雲吞大學教授，經常在美國各大雜誌撰文。他在本文中對於蘇聯戰後狀況之觀察確有獨到之處，至少他在盲目的誇揚與盲目的攻擊之間，尚相當保持一種學者精神。當然，他以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資格，對於蘇聯的歷史，對於蘇維埃經濟制度之深刻的歷史意義以及隱伏於此制度中之基本矛盾，是不會有透切的了解的。譬如他對於戰前蘇聯幾個五年計劃的了解就是充滿經驗主義的，他對於蘇聯工業化與集體化之關連，集體化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之偉大作用，就懷着絕大的誤解。他借蘇維埃當局過去在農村中所進行的經濟冒險政策及這種政策所造成的惡果來判斷集體化是農民所反對的，因此牠是蘇維埃全能主義的原因云云。其實不僅僅爲了解放農村中更多的勞動力，最主要的還是爲了提高農村的生產到工業化的水準上，爲了消除鄉村與城市的界限，爲了澈底消滅農村的落後性與富農生長的可能性，農業的集體化却是蘇維埃政制所最迫切要求的。當然農民並不是天生贊成集體化的，他們是小有產者，當政府舉辦的模範集體農場，有效地向他們證明機械化的集體生產，在收穫的質、量上大

大超過他們的小規模的落後生產方法以前，他們是不會瞭解集體化的意義的。因此，爲了保證集體化的實施，必須首先在工業上能生產足夠的農業機械化設備，即，集體化必須與工業化配合節拍。蘇維埃當局在戰前幾個五年計劃中所實施的短期內全部集體化政策，顯然與工業化的步驟脫節，即在沒有準備充分的機械化設備之前，便要把全國農村納入集體化制度中，這除了向農民施行強迫（不是說服），因而引起農民對蘇維埃政制的強烈反感之外，別沒有什麼結果的。但這並不能證明集體化本身的不合理或證明牠是「全能主義之原因」，恰恰相反，牠僅僅證明：一種良好的政策，必須在蘇維埃民主的光照之下，才能進行得準確無誤而已。由於同樣的錯誤，作者又把蘇維埃全能主義之最後的原因歸之於俄國「決心不容許外人之移入（即外國勞動力之吸收——譯者）。」而在另一個地方，則又說外人不能移入之主要障礙，是這一全能主義政制本身，不能給移民以起碼的經濟和政治權利。作者在這裏又一度把結果說成原因，或把這兩者的關係無法加以辯證的了解。這是作者了解蘇聯問題之思想極限，因爲他始終站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來評價這一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全能主義政制，所以他就

沒有能力找出這個政制產生的最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條件，同時也就不能圓滿的解答：何以蘇聯官方早已宣布蘇聯爲一個「完成的」社會主義社會，却不能吸引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力的流入，而迫得要假手於最不合理的強迫勞動？關於這一點，爲篇幅所限，譯者不能在這裏作進一步的評論，因爲這需要一篇專門的文章才能辦到。但雖然具有這一種根本的缺點，戴勒喀這篇文章仍是值得有志於研究「蘇聯問題」者拿來參攷的，牠至少供給我們以蘇聯的最新最有價值的材料，使我們藉此了解蘇聯戰後經濟危機的深度及其可能發展的前途。爲了便利讀者理解起見，譯者於文中將酌量加入若干註解，其責任由譯者自負。

在日本投降的一瞬刻，蘇聯正式宣布：一個新的五年計劃——牠的第四個——行將付之實施。這個計劃的全般細目雖然尚未擬出，但光是就已公布的計劃看來，就可充分證明：這個計劃是列強中任何一個強國造出來的一幅最野心的戰後設計圖。牠對於未來的俄國政策的瞭解，提供一些有價值的線索。

假如戰爭之前，幾個五年計劃的目的是在經濟上把俄國弄強大，足以經得起一次戰爭，那末，這次新的計劃却提議在經濟上把俄國弄強大，足以扮演一個超等強國的角色。目標仍在於把該國加以工業化，並採取一個加速的步驟。主要的着重點，像戰前的計劃一樣，是在於建立重工業品的工業。這些工業之向東方發展的趨勢——這種趨勢始自一九三一年，並由戰爭大大地加速——將來也要繼續下去。雖然俄國消費者目下的生活水準低落，俄國的計劃者却並不把他的需要的滿足放在第一位；他們企圖使他等候他所必需的物品，一直等到他的國家的工業力量已經建立起來爲止。

計劃中之最大優先權顯然給予鋼鐵生產之增加：至一九五〇年每年增至三千五百萬或四千萬噸，這個數目遠遠高出一九四〇——四一年二千萬噸的數字（一九四二——四三之僅僅一千萬噸則更不用說。那時烏克蘭的鋼鐵中心均落入敵人手中）。俄國人稱他們的鋼鐵生產已經回到戰前的水準，

●史大林在二月九日的選舉演辭中，把最後的數字提高到六千萬噸，牠說：「讀者需要三個新的五年計劃。」

一部分是大規模修理的結果，但大部分是因為在戰爭中新的大鋼鐵中心於烏拉爾背後建築起來。縱使這件事是真實的——但另一些俄國的報告却指出這件事是一九四五年的「計劃」，並非一件真實的成果——新的計劃也要求在下一五年當中，真實達到雙倍於戰前的擴展的比率。

重要性僅次於鋼鐵生產的是建立一枝強大的海軍和一些堅強的海軍基地，特別是在遠東方面。原子炸彈也許招致這個計劃的修正，但却不致於招致這個原則的放棄；直接的軍備在全部經濟能力中要占首位。

這個新計劃的另一些重大的目的便是國內國外交通的擴張；建設一枝掛俄國旗的龐大海洋航行的商船隊，實現一個巨大的鐵路建築計劃，建築公路和運河，以及大大地增加鐵路器材與運輸車的生產。在下一五年內還要製造比之德國進攻時所有集體農場上全部曳引車的兩倍那樣多；實施這樣大的增產一方面是代替戰爭中遭破壞的設備，一方面則供給曳引機於西伯利亞的新農場。一種完全嶄新的建築工業將創立起來，建造預定的工廠和預定的家屋（想不到這些家屋並不如戰爭以前一樣，歸於政府代理機關所有，而是準備以極寬大的條件賣給工人們的）。

官方的評論聲稱俄國到了一九五〇年便應該能夠在一種工業文化的基本生產品方面，供給她全部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的需要。不僅如此；俄國還必須能夠供給資本配備於歐、亞蘇維埃勢力圈內的國家。這一點已成了俄國政治討論的反复覆的論題：假如鄰近各國——即使那些處於「友好政府」之下的國家——依賴於非俄國的資源以獲得她們的重工業品的供給，則蘇聯的安全便受到威脅了。據這種理論看來，德國之所以能控制東歐正因為她有一個重工業輸出者的地位；假如俄國與其鄰國之間的政治合作要處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上面，則這種政治合作必須輔以密切的經濟合作，由蘇聯扼着往日德國所佔據的地位。今天，像波蘭與捷克之類重工業化國家對於資本配備的需求，姑置勿論，就像保加利亞與伊期對於資本配備這樣極有限的需求，俄國也不能供給。但據報紙上關於這個新計劃的解釋說來，到了一九五〇年，她將成了從波羅的海至朝鮮海峽的全部邊境地帶的重工業品中心。

與一般人所相信的恰恰相反。一個五年計劃並不是剛性的。牠在經濟發展的光照中不斷修正，而且牠還處於各種政治經濟利益所產生的不斷的壓力之下。實際上，過去每一個五年計劃在實施期間，不僅在細目上，而且在方針上也猛烈地修改過的。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並不就表示是精確的生產

數字；牠們不過是人們所企求的佳境而已。縱使我們把這次新計劃所舉的數字打一個折扣，認定牠只是一種宣傳，其目的是想在思想再改向——在這個國度裏這種事情並不是陌生的——的嚴重時期中，防止俄國生產努力之弛緩；但事實仍是事實：俄國提出於下一五年內，不僅要修補戰爭的大破壞，而且還要使雙倍的努力獲得一種工業能力，這種工業能力，假如戰爭沒有打斷她的經濟擴張的計劃，她也許已經得到了。

## 二

在戰前十幾年的強迫工業化當中，俄國人民的驚人的犧牲往往拿這一項諾言來辯護，即，一旦該國已經弄得十分強大，經得起一次戰爭，他們便可以得到偉大的經濟改善了。但現在這次戰爭已取得勝利，俄國人民分明又要求去作新的經濟犧牲，把他們的國家在經濟上弄得十分強大，以便扮演一個偉大強國的角色；而憑她的人口、幅員和威望，她是够得上一個強國的資格的。新五年計劃與那些舊五年計劃所不同的主要是在於牠含有更大的野心。爲了瞭解牠對於俄國國內外政策所含有的意義，我們因此必須回溯戰前的計劃所成就的意義何在，又牠們是怎樣進行的。

首先我們必須記起，自一九二八年以還，蘇聯已生活於一種極端的戰爭經濟中了。消費品之生產已完全隸屬於重工業品及軍備的生產。在第一個計劃實行的時期——即，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戰爭的準備只是計劃的諸目標之一，這個計劃的目的是在於建立一種現代產業經濟的基礎。但所用之方法及其對於消費者之影響則一，儼然俄國已存心在準備戰爭。一九三四年，一半是因為烏克蘭大飢饉所造成的民衆的不滿，這種壓力便弛鬆下來，有兩個年頭，遲至一九三六年，消費者用品之供給一直在增加。但遠在一九三七年——在這個時期，集體安全的理想在意大利制裁的危機中破了產，英國正在綏靖希特勒和佛朗哥，日本又進攻上海——俄國遽然轉回到一種十足的戰時經濟中去。自一九四〇年以還，除了基本的維持生存的糧食必需品之外，她實際上已沒有生產什麼東西供平民消費者之用了。

自一九二八年以來，俄國將其國家收入投資於重工業品及軍需品的，已經沒有一年低過百分之四十的了。在嚴重的年頭，如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九年，這項數字超過了百分之五十。在戰爭中，牠有時或者已到達百分之七十五了。爲了把這些數目的意義加以充分的瞭解，我們千萬要記着：我們在美國——一個比之俄國無限富有的國度——從來沒有，甚至在戰爭的最高峯幾

年也沒有將我們的國家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派作這樣的用場的。總之，自從奧大林成了當然的主人以來的整個時期當中，俄國的經濟政策已以這種學說為根據；平民經濟所得之數額僅僅以維持人民於合理工作條件中所絕對必需者為限；凡超過這個限度的均歸入重工業投資中。

這個國家所加於其自身的這種制度的嚴峻性，其最好的證明便是：歐歐的貧窮和污穢所給予俄國士兵——所有俄國人中供養最優良的——的印象却是奢侈的富足。在柏林，他們曾經出過最荒唐的價錢去購買德國人從廢墟中救出的最劣等的商品。布加列斯特（即羅馬尼亞首都——譯者），這是大多數俄國士兵生平遇見的第一個外國都市，他們在這裏竟被羅馬尼亞工人所造的『奢侈繁華』生活所驚倒。但布加列斯特的貧民窟恐怕是全歐洲最壞的了。維也納的工人在俄國士兵的印象中簡直是一個『資產階級』——因之工人階級的家屋會遭遇過太大的劫奪。但在納粹的統治之下，維也納——一九一八年以來便成了一個愁慘失業的地方——已經差不多完全沒有消費品過生活了。有了一套衫袴之外還有一條工裝罩袴，有一架收音機，某種瓷器或一隻鏢（這些東西分明是劫奪者所搜索的），這在一個俄國人看來是『奢侈的』，因為他差不多二十年過着沒有消費品的生活了。

因此，在俄國民衆的貨幣收入與他們所能獲得的物品供給之間便有了一條巨大的『通貨膨脹的裂隙』，俄國民衆貨幣收入之半或一半以上總是成了過剩的收入，市場上沒有商品來容納牠。讓這種購買力來競購現成的少數貨品一定會令經濟破產的——而工業化的計劃也一定歸於盡。在這種局勢中，第一步當然是配給。但俄國人雖然這樣廣泛的應用配給制，簡直有時貨幣差不多已變得全無意義而配給部子已成了主要的通貨，但配給制，在這樣一種極端的情勢中仍嫌不夠。消費者的過剩購買力還必需加以吸乾。

這一點，俄國人憑兩種方法來完成。第一是隱藏在所有商品零售價格中之一種普遍的銷貨稅。這筆銷貨稅構成平均零售價格的百分之六十，奪去俄國消費者收入的百分之四十。這樣一種稅不可避免使收入低的集團大大吃虧，他們握有過剩購買力之大半。因之，銷貨稅——官式的俄國名詞叫做『還本稅』（“turnover tax”）——向民衆消費的貨品如糧食和衣着等的徵收額是最高的。比方，戰前的麵包價格隱藏了百分之六十的稅，糖的價格則隱藏了百分之八十的稅。但麵包却是俄國大眾的主要食品，糖則是他們的唯一高能（high-energy）食品，因為俄國麵包含很少肉類，脂肪，或牛奶產品。

財政操縱的另一工具是向農民徵的一種稅，這種稅是隱藏於政府為曳引機之利用而向集體農場徵收的費用中。這筆費用可以徵去農場收入四分之一之多——而俄國人民之半數仍靠農場生活哩。

在一種發達的產業經濟中，這種財政手段本身是足以促進重工業品及軍需生產的擴張的。但俄國却缺乏一種產業經濟的第一個必需條件：產業勞動力。當俄國於一九二八年開始工業化時，她是一個差不多完全農業的國家。在九千萬總工作人口中，僱傭於工業、運輸及公共事業的不到六七百萬。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一年之間，至少有一千兩百萬工人加到產業勞動力方面去——約九百萬工人及三百萬的職員，工程師，會計和行政人員。將從屬的人員計算入去，則移入工業中的人民在一千五百萬與三千五百萬之間。既然俄國不准許外國人移入——移民却是美國在一六八〇年至一九一四年解決同一問題的方法——勞動力便必須取自農場。而且同時，農場還必須供給附加的食糧，養活新的產業工人。

這件事由農場的集體化來完成。傳統的俄國家族農莊太細小了，不能作有效的耕種，而工具和方法又這樣落後，需要太多的勞動力。新的計劃便不得不將細小的農莊結成一個大的單位，用機器來代替手工，並增加每一工人的出產，以便將每畝所需的工人數目裁減，於是將人力解放出來，供產業勞動之用。農場的集體化因而成了俄國工業化計劃的基石，在邏輯上，也就成了第一五年計劃的主要計劃。

據俄國官場的說法，農民們自己需要集體化。這是一種假話；大多數農民是極力反對的，數目頗大的少數是積極反抗的。但假如認為集體化乃出於全能政制想全數支配人民的慾望，這也同樣是虛偽的說法。集體化並非是俄國全能主義的結果而是其原因。在五年之內，竟把俄國農場轉變為集體農場，這是和平時期在一個社會機體上所實行的最兇暴和最急激的社會手術。牠只能藉最無情的方法，經過全般的編排，才能完成。一九二八年，蘇俄無論照民主這個名詞的任何意義看來都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正是集體化把她造成一個警察國家，把秘密警察造成全能，並招致犯罪勞動與集中營的應用，來鎮壓一切反對派，最先則用來對付反對集體化的幾百萬農民。最後分析起來，俄國發展成爲全能國家的原因是她決心不容許外人之移入；一旦有了

● 作者在這裏顯然忘記列入公債一項，這也是吸收人民剩餘購買力的一條巨大漕管。

這個決心，則迅速的工業化只能在一個全能主義的基礎上來完成，因為牠之完成只能通過集體化。（這一點幸而並不是對於過去歷史的一種純學理的論調。因為我們往後便明白，俄國又碰到要在准許自由移民與秘密警察統治之間有所決定了。）

史大林本人有一個長時期反對集體化。他清楚的看到，牠結局會造成一個大的革命，足以破壞這個政制的。他後來之讓步，僅僅因為沒有別的道路以達成工業化。事變證明他的擔心很有理由。●。食糧生產大失敗，一半由於農民的抵抗，一半由於新的曳引機無法及時趕到。三年的飢饉，從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幾乎破壞了俄國的經濟。農民的抵抗幾乎使政府破產；僅僅在幾百萬人已餓死，更多的幾百萬人已運去作強迫勞動之後，這種抵抗才屈服。

但一九三五年，集體化已告成。農場人口已減至二千萬人，而糧食生產總額已接近兩倍。不錯，這樣大量增產之成為可能，僅僅由於普通的從肉類、蔬菜和牛奶產品這一類高度蛋白質食物之生產改向五穀的生產，因為如穀、馬鈴薯和甜菜等均能在機械化的農境上生產；但食糧對城市供給的總額却增加了，足夠維持城市人口由四千萬增至八千萬之數。

得到足夠數額的工人是一件事，把農民改變成功一個產業工人又是另一件事。實際上，從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一年俄國工業生產之增加特別是由於工業效能之一直升高而成功的。這種工業效能之能够提高藉助於全國規模的工人訓練計劃，無情的工作不休方法，以及任何工業國所用的工資引誘的最精密的制度。●。總之，產業效能的提高恐怕是俄國成果中之最動人的了；牠當然是最困難的一種。一九三三年，第一個五年計劃之末年，俄國的產業工廠與同等的美國工廠比較，似乎其平均的效能不及美國廠的五分之一。到了一九四〇年，這個數字已升至百分之三十五或四十，至少那些開了幾年工的工廠是如此。管理的效能，尤其是在監工的標準方面，尙非常之低；但牠畢竟也增加了，雖則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曾舉行過工廠管理人員的肅清。

●關於此段請參閱譯者在篇首之按語。

●這是指史大林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堅主保持個人農場，讓農民自由發展以增加國家資本之積聚而言，他那時是極力反對左派關於工業化與集體化的要求的。本文作者對於此種歷史事實之了解顯然很模糊。

●即指有名之斯達哈諾夫運動所隱藏着的計件工資制。

### 三

即使俄國設法於往後五年中僅僅把她的經濟恢復至戰前的水準，這件工作也是巨大無匹的。但新五年計劃却準備來一個大大的增產——不是消費品方面，而是重工業品方面。這就把工作弄得大而煩難。因為戰爭不僅大大地破壞了她以前的成就，而且已令她遭遇着新的，急迫的難題。她現在迫得要再度通盤的解決她的勞動力問題，而她現在處在這樣的環境中，往日的方方法不是通通生效，便是應用起來困難得多了。

一開始，戰爭已把俄國的勞動力摧毀過半，這些勞動力在以前十五年中這樣辛苦地培養成功。在俄國，產業工人是到達兵役年齡的最大一個集團，他們大多數的年齡是在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他們是在體格上最合格的，訓練最優良的集團。因此，他們構成俄國作戰軍隊的大多數，而在俄國這次幾遭失敗底戰爭的傷亡人數中，他們佔了大部份也就是爲此。加之以納粹把俄國人押送到德國做強迫勞動時，他們特別挑選產業工人和農業機械工人，一半是因為他們的工廠需要訓練的工人，一半則因為他們打算不斷削弱俄國。而且甚至從納粹勞動營的恐怖中死裏逃生的工人們，今後一個長時期在肉體上和精神上也不適於繼續做工業的工作了。據俄國人的估計（這似乎是十分可靠的），在戰前接近兩千萬工人的總數中，目前剩下來可立即供工業、運輸和公共事業僱用的還不到一千兩百萬工人。

這次新五年計劃所需要的工業勞力較之戰前的日子大得多了。將來要完成的大部分工程是建築工程，即使具有最新式的設備——而這種設備却又是俄國所缺乏的——這也是消耗勞力的。雖然大部分的工程是在中部和遠東等區域實行，但在真正的建設能夠開始動工之前，還必須供給這些地方以生活和運輸的便利。爲了補償戰爭的損失及供應新的擴充，恐怕需要新工人要達一千五百萬或兩千萬之多。

但在農場方面已沒有任何過剩的勞動力。恰恰相反，俄國農業之苦於人力短少與俄國工業所苦者正一樣厲害。生命的損失還比不上機械化設備，尤其是曳引機之破壞殆盡那樣嚴重哩，這些曳引機在幾年內是無法補償的。手工將必須代替牠來生產食糧之絕對最低限度量。因此，剛剛歸還的俄國戰俘即使戰前是產業工人，也已送到農場去工作了。我們又知道俄國將她的武裝力量復員的開始，延展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因爲收獲正需要人力。那末，假如俄國將要在工業方面擴充，則非農業的工作所需要的幾千萬新工人又從哪



裏得來呢？

戰爭還大大地破壞了消費品的工業，這些工業是供給戰前人民以生活必需品的。因為這些工業大多數處於俄國西部，尤其是在莫斯科、奧德賽與基輔等沙俄時代的主要產業中心的週圍，牠們曾受過兩次的摧毀——第一次是一九四一年被毀於敗退的俄國人，後來又於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被毀於敗退的德國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損失可以由軍需廠改作和平生產來補救。在金屬工業中，這一點最易辦到，牠們已經開始生產深鍋、平鍋和腳踏車；坦克車工廠也容易辦到這一點，牠們正改而生產非常需要的農業器材。但僅次於糧食，而為民衆所最迫切需要的貨品：衣服、鞋子、建築材料、寢具和傢俱，則現成的工業能力似乎非常之小，不足以充分生產牠們。

把這些工業僅僅恢復到牠們的戰前水準確實不會成一個大問題，也不會需要太多的人力。俄國人這樣大量地從德國東部、匈牙利、捷克與奧國搬走的機器多分是來自消費品的工廠；而明年她又將從德國西部分得生產設備（主要是屬於金屬製造工業和化學工業）作為賠償之一部分，這種生產設備將大大促進復元的過程。不過雖然如此，在美國政府中，凡與俄國有密切接觸的官吏們却估算直至一九四七年春季，俄國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不得不仰賴俘獲的德軍儲藏，仰賴救濟（蘇維埃政府已請求聯合國救濟總署撥價值七萬萬美元的物品供一九四六救濟之用）而且恐怕還要仰賴購買歐洲的美軍過剩儲存。但到一九四七年夏，蘇聯將又能夠供給她的人民以最低限度的消費品了。

但問題——一個大問題——在這裏：俄國人民將以最低限度的生活供給而滿足嗎？抑或他將要求一個更高的生活標準呢？在戰前幾十年內，政府要求人民作了令人難於相信的犧牲，這些犧牲是用這一項諾言來辯解的：一旦俄國已弄得十分強大，經得起一次戰爭時，他們就能得到富足了。現在這次戰爭已付出更大犧牲的代價而勝利了，新的五年計劃又提出把消費要求的滿足從屬於重工業的工業擴張。人民將願意爲了把蘇聯造成一個「超等強國」，而承認政府已經答允過的一種較豐足生活的諾言，再來一次無限期的延緩兌現嗎？

有許多徵兆證明，俄國人不僅不願繼續過一種戰時經濟的生活，而且他們在肉體上和精神上也无法這樣做了。他們在極端緊張的狀況之下已生活了

三十年。過去五年已成了一個噩夢，他們竭盡了所有肉體上與精神上的力量才能生存下來。他們或許知道，在國家沒有復興之前，他們必須生活於一種非常嚴峻的統治之下，但似乎多分他們不能繼續甘於貧困。而且現在，在二十五年中第一次他們有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政府是不能拮据的，他們能夠通過牠提出他們的要求來，這個組織就是：一枝勝利的軍隊。一切報告都一致認為：這枝軍隊第一次與國外的，尤其是與英美士兵的較高生活程度接觸之後，已得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了。

蘇維埃政府最近的公告和行動清晰地反映出民衆要求迅速增加消費品供給的繼續增高的壓力。當復員政策正式宣布時，政府答應軍官和士兵最後回復平民生活時，可以得到大量衣服和住所。甚至在德國最後投降之前，俄國的報紙就開始着重宣傳民衆的消費品要求——而這樣一種宣傳運動通常是官方行動之前奏。但最出色的證明還是最高蘇維埃於去年九月發佈的一道命令，牠禁止各省出產的消費品輸出各該省當地。這顯然沒有解決問題；恰恰相反，在工業已遭破壞的歐俄人民方面，牠把事情弄得更壞。但這道命令却證明：消費品中心地的工人們得不到他們自己生產的東西再也不願意活下去了；關於紗廠及食品製造廠（牠們的出品是指定用船裝運到俄國西部的大城市的）發生騷動的事情，確乎有過一些未證實的報道。

上述的證據雖然不是最後的，但卻確乎指出俄國不能單憑牠自己的資源來實現這個新的五年計劃了。她缺乏人力來生產她所決意大量增產的重工業品（包括軍火）以及她的人民所要求的消費品。她之能否實現這個計劃，全要看她能否從國外獲得大量消費品，或至少獲得製造消費品的原料和裝備；或者看她能否輸入工人來解決她的勞力缺乏的問題。

#### 四

關於如何解決勞動力和消費品供給的問題，在俄國並沒有公開的討論。但解決牠們的方法並沒有許多。真的，對於消費品問題只有一個實際的解決辦法：一大筆美國借款。

在某種程度上，俄國可以從國外獲得消費品而用不着靠還筆借款，她可以用一種她自己出產而於她自己毫無用處的商品來償付，這種商品便是：黃

●我們還應該加入蘇聯最近從朝鮮北部及中國東九省當作戰利品搬去的設備。

●史大林承認這種局勢，他於二月九日的演辭中應允「於最近期間將取消配給制，將特別集中注意大眾消費品之擴大生產，有系統的減少一切生產品之成本而提高工作人民之生活水準。」



金。這一點可以說明蘇維埃的外交何以對拉丁美洲的原料生產國家顯出大大的興趣，同時也說明何以蘇聯前任駐墨西哥大使奧曼斯基先生在整個拉丁亞美利加大陸成立頗大的商業組織。用黃金來購買阿根廷的麥子和肉，烏拉圭的羊毛，巴西的棉花，這不僅是一宗好生意，同時還是一種好政策。因為，德國在戰爭之前已證明過，對那些依靠輸出的原料生產國家，能够發生政治影響的是買者不是賣者。這件事也無意中說明何以俄國經過二十年來對金本位的冷嘲熱罵之後，現在却變成了牠的這樣熱狂的贊揚者，而且自從布萊頓森林會議以來便支持美國的通貨地位。拿黃金來購買原料實際上等於拿美國一張支票來購買牠們，因為在所有重要國家中，唯有美國今天是願意供給貨品來換取黃金的。

但爲了真正解決牠的消費品的難題，俄國恐怕不得不接近美國市場，而且恐怕不得不靠一筆長期的美國借款來作資金。因為牠所需要的與其說是原料品還不如說是完成品或製造貨品的機器；而數量甚大，且能抵得上一筆借款的完成品，只能在美國獲得。俄國已正式宣布：她將要求這樣一筆借款，數達六十萬萬美元。

但俄國是否願意去借這一筆借款，尙難斷定。蘇維埃領導機關內部對於這筆借款會發生不可輕視的反對意見，這是很少可疑的；因為這樣龐大的一筆外國借款足以令他們急劇地脫離俄國經濟與外交政策的原則。

一筆外債等於受外人干涉和支配，這已是共產黨思想的一個公理，史大林會把這種思想大加發揮。這種信念是從沙皇政制的借款的經驗中得來的。但牠也可以以同等的力量運用於今天從美國所獲得的借款上，而且還很有理由。因為雖然蘇俄無疑是一個良好的財政保險者——恐怕在一切可能的政府借債人中還是最好的保險者——但一筆借債給俄國（尤其是她所要求的是一筆大款）多分會成爲一樁政治買賣。最可能的是美國政府會要求拿政治的讓步作酬答，尤其是關於俄國與其勢力圈內各國的關係方面。美國的國會和輿論也確實把這筆借款視爲對蘇聯採取一種最「頑強」態度的最大理由。這不是靠美國的「慷慨」，或才黃一種示好於俄國的誠懇運動所能解決的事情。借六十萬萬美元也就是貧弱和依賴性的一種承認，不管貸方的言語怎樣甜蜜。牠會把俄國拉入美國的經濟勢力圈內，而且造成美國爲一個太上的強國。俄國之接受一筆借款與否一定要看有沒有政治的附帶條件；而蘇維埃政

最近美國僅核准十萬萬美元。

府恐怕多份不可能像英國在金融援助的談判中一樣，甘願忍受美國那種威脅。因此，宣告要求借一筆借款並非絕對證明俄國已下了最後的決心，放棄牠的傳統的財政自足制度。但牠却指出俄國經濟情勢之嚴重性。

即使拿一筆美國借款向美國購買消費品，俄國的勞動力供給問題也是困難的。沒有這筆借款，這個問題還要困難得多。牠一定要使俄國捲入另一個更迫切的外交政策問題中。因為她不得不決定：究竟利用外國的犯罪勞動，還是允准巴爾幹方面自由工人的移入。

我們知道她正想利用一批數目甚大的德國人作爲犯罪工人；實際上現在爲了她的復興工作，她一定正在利用大約五百萬左右的德國戰俘和在德國東部捕獲的納粹份子。從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國歸併於俄國的領土方面拘捕的大批「反俄份子」和「法西斯分子」多分已經派定，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之下，服役於強迫勞動隊裏了。但尙有許多象徵證明，俄國尙要獲得更多的犯罪工人——數目還要更多。

去年春，對波蘭國內軍隊幾個領袖的官冕堂皇的審判，其目的不僅僅是向波蘭流亡政府施行壓力而已。照當時俄國的評論看來，這些領袖犯了反俄和法西斯的罪名，這自然而然的使波蘭地下工作每一個人都有受監禁或做強迫勞動的可能。同樣的理論也由俄國提出來當做審判納粹領袖的根據。去年春天，有一項報道說，俄國要求利用兩千萬德國的強迫工人，以五年爲期，這項報道雖然令人難以很認真的相信——即使這個數目的一半也很難獲得——但這項數字那樣密切地與俄國對於產業工人的要求相吻合，這也許不是純粹的偶合吧。

利用這樣大量的強迫工人羣衆會產生很大的警察上的麻煩的。但像這一類的問題，俄國却有充分的準備來對付，因爲秘密警察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已在辦理強迫勞動營。雖然這種政策施之於俄國民衆是廉價的，平常的。但牠在國外，尤其在保有堅強的工會傳統的英國和西歐方面將遭遇猛烈的反對。牠還會令今後幾世代的東歐人民對俄國發生隔膜，會令他們傾向於產生蘇聯所最害怕的極端反俄聯盟。但無論如何，這個政策將多分還是俄國的第一個選擇。

爲什麼呢？因爲另一個選擇會提出一些更大的問題來之故。這另一個選擇就是巴爾幹方面的自由移民。

初看起來，移民似乎不僅是勞動力問題，而且還是俄國與巴爾幹各國底

關係問題的最好解決辦法。巴爾幹農民會成爲良好的，能變通的產業工人。他們中多數因爲在言語、傳統和宗教上非常接近俄國人，所以很快就會同化。巴爾幹各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南部和匈牙利都是極端人口過剩和絕望地貧窮的。除了匈牙利，都沒有大地產可分配於農民；即使有現成土地也只好解決一種小部分的無土地工人。假如這些國家的人民不能向別處移民的話，牠們的唯一解決辦法就只有工業化。俄國今天却又無法把工業的設備供給牠們。抑尤有甚者，正如俄國的報紙已着重聲明的，她又不願意讓任何西歐的國家來幹這件事，因爲這樣就令巴爾幹重受西歐的影響了。巴爾幹人民既不獲准工業化，又被剝奪了移殖他處的機會，他們差不多一定要陷於恒久的不安靖的。但俄國爲了自己安全的利益，却不得不監視着巴爾幹的大鍋，不讓牠滾沸出來。那末爲什麼不允許巴爾幹移民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困難在這裏：俄國當局一定要把俄國人被剝奪了的一些政治和經濟權利頒給這些移民。除非保證他有宗教自由，答應他有獲得其已小小房產的機會，沒有一個巴爾幹農民肯自願移動的。俄國當局還一定要允准移民們寄錢回家，回家探親，以及保持和「故國」的接觸。他們會傾向於定居在一起，批評這個陌生的國家，不僅把牠和本國的狀況來比較，而且還把牠和巴爾幹移民的麥加<sup>①</sup>，美國的狀況來比較。尤其是，縱使巴爾幹各國一貫受各種不同的獨裁制度統治，這些從來就不是最有效能或最穩定的獨裁制度。因此巴爾幹的農民習慣於較俄國十五年來所知道的更大的討論自由，他們還習慣於程度頗大的政黨政治及真正的——雖然是暴力的和腐敗的——選舉運動。他們一定希望在他們所僑居的國家中，至少能得到同樣的自由。

俄國可以允許他們舉行宗教崇拜——在國家操縱的正教教堂中——和保有房屋所有權，因爲她已把這兩者應允過她自己的人民了。但她能够把其他的權利頒給移民們而又不同時也頒給俄國人嗎？而且，蘇維埃政府願意或能够放棄這樣多的全能主義的基礎嗎？最近從莫斯科方面發出來的一些汎斯拉夫宣傳說得有聲有色，彷彿俄國人正想鼓勵巴爾幹的移民似的。但這恐怕是一個最後的手段——拿來比較一下一筆美國借款，更是如此；一個最低限度的先決步驟便是由俄國完全支配輸出移民的巴爾幹諸國。

●麥加是位於阿拉伯的回教聖地，作者在這裏是拿來譬喻美國的。

## 五

蘇聯於是眼前就要在兩個不相容的前途之間有所決定。她將甘冒危及其經濟擴展之險，維持一個警察國家的絕對閉關自足制度呢？抑或她將以大大依賴於國外資本主義世界爲代價，達到她的工業目的呢？她將選擇那一個出路——抑或折衷於這兩個不相容的前途之間——只有一個蠢才纔敢預斷。這項決定要視該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壓力而定，而且還要視俄國對今後十年間世界和平的機會的估算而定。而那時還有史大林底最後繼承及其繼承者政策的巨大疑問號哩。但雖然如此，俄國經濟政策對於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影響還是一目瞭然的。

首先，對俄國經濟政策的分析堅強地支持這一論調——譬如約翰·非些耳在本誌（指「哈拔雜誌」——譯者）最近一期內便發揮過牠：在今後的時期內，俄國的非凡的利益一定是世界和平之維持。今後幾年將確實是最嚴重的時期——差不多像上一次大戰之後或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年內一樣嚴重。俄國的經濟計劃將把她的資源的每一盎司都吸收了去。她之能否希望達到她的經濟目的，完全看她是是否得到允許，讓她和平地工作而定。而在超等強國的世界中扮演一個侵略的角色不是她的經濟力量所能勝任的。我們這樣解釋大致不會過於牽強：在最近的國際談判中，尤其是一觸犯到她在東歐的勢力地帶時，俄國所採取的不妥協態度以其說反映着經濟強大的自覺，毋寧說反映着上述的經濟的貧弱的自覺。

但同時，此刻新五年計劃的發表以及介紹這個計劃的銓釋却清晰地指出：俄國經濟政策之基本趨勢將仍然不脫閉關自足制度與工業自給的方向，不僅她自己，就是處於她勢力圈內的國家也是如此。將來如果要採取別的方針，則以其說這是基礎方面不斷變化的徵象，還不如說這是對於當時需要的讓步。在今後幾年內，俄國很可能成爲美國貨的一個大主顧；但即令如此，這些購買的長遠目的也是在於使俄國重新擺脫外國的供應。向移民開放國門將是一個最大的讓步，除非俄國對這些移民輸出的區域（即巴爾幹）有絕對的控制權，這個讓步是不大可能的。

簡言之，種種徵兆證明，她將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一方面關心國際和平，另一方面則又堅持獨斷獨行，不假手於他人，獨善其身，且儘可能的屈使她的近鄰就範。

# 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

本誌創刊號，發表了歐伯先生論『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以後，嗣承李季先生惠寄『行不得也哥哥』一文，專為批評歐伯先生關於老、孔思想的見解。編者認為老、孔思想，流傳二千餘年，對於中國『世道人心』，影響極大，亟有公開討論之必要。故特將李先生大作，轉送歐伯先生，並希表示意見。果承慨允。近已收到『回頭是岸』一文。今將兩文一同揭載，務望對此感有興趣的讀者，參與討論和批評。

（編者）

## 一行不得也哥哥

李 季

『鷓鴣曰：「行不得也哥哥。」』雜曰：「呱呱無屋住。」鷓鴣曰：「得過且過。」杜鵑曰：「不如歸去。」鷓鴣曰：「春起也。」鶯曰：「提葫蘆。」

竹鷓曰：「泥滑滑。」布穀曰：「脫卻布袴，家家撒穀。」（鍾離三卷物聲）

我從前讀到上面這段話，不覺要笑，中國人真是世界第一等聰明人，能識鳥音，把伯益以至公治長的絕學發揚無遺！求真開幕，我被邀客串兩場，但預先聲明，以後不再獻醜。不意編輯先生們硬不放過小丑，再三再四要求我在第二幕中還來湊一次熱鬧。『飯飽文章健，』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可憐我們這班臭文人，即使得最高稿費，挖空心思做一千字，也還比不上排字工人機械地排一千字的酬勞。餓得臉黃肌瘦頭昏眼花的我，實在沒有法子寫出健全的文章來。（求真給我的稿費在上海是最高的，我這幾句話並不是向他們示威或敲竹槓，希望將我個人的報酬加多；而是趁着民主高潮，大膽代表窮途末路的文丐同人向一般的文化界提出嚴重的抗議。）健全的文章既然寫不出，而編輯先生又『預留篇幅』，限期交卷，那我只好胡扯一陣，騙騙稿費。

可是這樣像王媽媽的裏脚又臭又長地扯下去，實在對不起讀者，還是開話少提，言歸正傳罷！『正傳』？終不免是一次頑笑。因為我讀了本誌歐伯先生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不能不令我想起『行不得也哥哥』，『脫却布袴，家家撒穀』，一類的妙語。本來不過哥哥，呱呱，嘖嘖，啾啾的鳥音，被譯成意趣深長的語句，或音調鏗鏘的韻文，是何等高明美妙。同樣，

歐伯先生根據五千字的道德經，做了一篇一萬五千字的大文，把老子裝飾得金碧輝煌，一則發揮他的一元論與辯證思想；再則闡揚他的社會思想，說他是一個『表同情於民衆的社會思想家』。關於前者也許還有一點影子，至於後者簡直連一點影子也沒有。歐伯先生說：

『他尖銳地攻擊了當時統治階級的妄作好爲，嗜爭好戰，嚴刑酷罰，橫征暴斂，騎奢淫佚，以及使用種種智巧以欺騙人民等；這樣便應當喚醒人民，號召人民起來反對這樣的統治者，推翻這樣的統治者；但另一方面，他又極力鼓吹『不爭』，退讓或讓下等消極的主張，即主張不抵抗主義，仍然希望有什麼『守道』的侯王或『聖人』（老子理想中的統治人物）來拯救人民。』

歐伯先生以爲這些矛盾『當然不能從老子思想的本身中去尋找解釋，老子思想的矛盾不過是當時社會中許多複雜條件所造成的矛盾，特別是廣大的農民層的地位的矛盾之反映而已。』

其實自我們看來，老子的思想並沒有矛盾，用不着像煞有介事地『從農民大眾的地位中』找『說明』。他是赤條條的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是徹頭徹尾的反動派，雖有猶龍之譽，卻沒有什麼高深不可測度的地方。試聽他說：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這是愚民政策最露骨的表现，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說話的。只要不故意曲解，誰也不能指這爲同情農民的證據！如果認爲這幾句話還欠明顯，或非出

於他的本意，讓我們再洗耳靜聽罷：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皆得執而殺之，孰敢？』這是什麼意思？蘇轍解釋道：『民安於政，故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擊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這又是替統治階級打算盤的說法，並且加一『吾』字，表明確是他的主張。『若使民常畏死，』他是主張用殺戮馴服民衆的，不過不怕死的英雄們或『匪徒們』太多了，這算盤打來打去打不通，只好苦口婆心地向他所代表的階級提出警告道：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明太祖看了這句話，非常感動，遂罷極刑，改用囚役。是老子的垂教雖無補於當時的封建地主，却大有助於後代的統治者。至於代表或同情民衆，從何說起？

當然，我不否認歐伯先生所舉老子尖銳攻擊當時統治階級的種種說話，但把這當作他反對封建地主階級代表農民的證據，未免笑話。因為他的攻擊是由於愛護而不是由於仇視這個階級。他眼見當時那樣無法無天的橫征暴斂，實在不能長久維持統治者的地位，所以大聲疾呼：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試問這是替統治階級打算，還是替農民打算？如今有一種自命為『左派』的報紙，天天罵當局這樣不對，那樣不對，然明眼人一看便明白稱之為『小罵大幫忙』！『小罵大幫忙』正是老子對封建地主階級的秘訣。他的目的是在使民衆蠢蠢無知，叫統治階級聰明透頂。在他的寥寥數千字的遺文中，除掉滿紙天子，萬乘之主，上，王，主，王公，侯王外，有三十一次說到聖人，二次說到君子。聖人和君子是什麼？就是精通治術的人，即帝王之師，甚至於帝王本身。他從四方八面去教育統治者以永久維持統治地位的術法。並苦心孤詣，精思玄妙地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如譯成直率的白話，就是不要去騷擾老百姓，讓他們安安靜靜替你們做奴隸罷。這對於民衆雖也不算壞，但畢竟是從統治階級的觀點和利益出發的。總之，他的種種責難，攻擊和主張無非是叫統治者小心火燭，防患未然，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即治之於未亂』。

我們再看他的理想世界是什麼？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是理想的典型的封建制度，最合於歐洲封建社會所謂『天高皇帝遠』的情狀。他主張不用舟輿，不用文字，固然有些像歐伯先生所說，『他是企圖將當時已經發展到高度的，並且正在衰落的封建社會拉到原始的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去，』但實際並不如如此。貴族出身而又做慣柱下史的老子絕對沒有意思要人類返到自由平等的原始社會去（當然也不可能）。他要維持階級制度的國家組織，所以滿口的小國，鄰國。並不是因為他不懂國家這個名詞的意義，隨便應用。他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可見他不排斥食稅，只指摘食稅之多。稅是什麼？如用中國的老話來說，就是韓愈所謂『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如用西洋的新術語來說，就是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這是『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所沒有的。至於主張不用舟輿，是在防民遠徙，不用文字，是在貫徹他的愚民政策，為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先聲，而且在兩者之間也只有程度上的差異，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像這樣極端的反動派，何苦替他裱金，裝成一個『同情於民衆的社會思想家』呢？

歐伯先生對老子的估計既不正確，拿他和托爾斯泰去對比，自然不倫不類。因為托氏的行動和言論是從民衆的利益出發，而老子恰恰相反。如果真要把他和一個外國人對比的話，那畢士馬克最為適當。不獨畢氏晚年所施行的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相當保障工人的生活，並且宣言『我亦國民』，這比老子更像同情於民衆。可是只要不是白痴，誰也知道這個勞英傑公爵是資產階級最賢明的代表。他的汲汲於替工人謀利益，正是要使資產階級高枕無憂。末了，歐伯先生又將老子和孔子對比，說『孔子是完全站在當時封建貴族的觀點上，企圖用改良主義去挽救正在崩壞中的封建制度，維持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與特權。』這和事實相去太遠。封建貴族的特權無過於世襲，一切大位都由貴族包辦，他人不得染指。但孔子恰恰反對這一點。春秋譏世卿是一證，『千乘之國，……由也為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宗廟同會，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論語先進）這是平民出身的子路，冉求，公西華，要做卿相而為孔子所首肯，又是一證。最重要的是孔子說：『雍也可使南面，』（論語雍也）竟要『犁牛之子』（史記仲尼弟子傳）仲弓父賤人。』的冉仲弓做起國王來！其實這也算不得一回事，還有更甚於此的。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

這是一套什麼把戲？我們且聽朱嘉祥釋罷：

「透之意，蓋以羿皋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透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吾少也賤』（論語子罕）的孔二先生竟想登九五之尊，帝制自為，試問這是『維持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與特權』，還是從根本上傾覆牠的統治與特權？試問老子可會有這樣的主張和企圖？老孔間的差異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和自由地主階級的代表間的差異。歐伯先生不從這些大脈絡着眼，專把『嚴定名分，尊崇禮制，宣揚忠孝，誇說仁的理想』，做孔子擁護封建貴族的證據，實在過於牽強。因為匹夫想做天子，是封建制度所視為大逆不道的，這

## 二 回 頭 是 岸

李季先生的『行不得也哥哥』一文，由求真雜誌編輯部將原稿轉寄給我，說這是李先生專門批駁我所寫的那篇『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載求真雜誌創刊號），希望我能馬上作一回答，在求真雜誌第二期上同時發表。并限我於一定的時間內交卷，回答的字數也不要過多（因為該誌第二期的篇幅已經預定）。在這種限定時間和字數的條件下，原擬不想接應的。但經過一位朋友的一番慫恿之後，也就只好勉強地接應了。

最初看到『行不得也哥哥』的標題，頗有點『莫明其妙』之感！待把李先生的全文閱讀一遍之後，才明白我在『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中論及老子和孔子所反映的階級關係時，曾大大地違反了李先生在『快二十年』前發表過關於老、孔所代表的階級的『主張』。因此，李先生心裏感到不大舒服，便唱起『行不得也哥哥』來了！既然如此，我就接着李先生擲下的『手套』來稍微周旋一下吧。

我在『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裏，完全根據『老子』原書的全部內容，頗為詳細地論證了老子的根本思想，是『同情於農民的』，是『含有反對封建貴族統治的成份，即強烈地反映了廣大的農民階層對於當時的統治階級種種不滿的意識』。為了確證這一見解起見，并將托爾斯泰的思想來同老子的思想加以比較。最後，且將代表封建貴族階級的孔子的根本思想，同老子反對封建貴族的思想，加以對照。我認為這已經够清楚了（請讀者

種人或作這種主張的人是罪大惡極，非殺不可，但孔子偏偏稱『至道』，『子』為『尚德』。這不是要革貴族的命是什麼？孔子的道德學說是根據當時新興的自由地主階級的利益作成的，內中即有一部分仍為封建地主階級所歡迎，也不能牽扯到他擁護這個階級上去。觀於現在的資產階級對於這一套正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就可以恍然大悟了。

現在總說一句：當我寫胡適哲學史大綱批判時（快二十年了），已經說明老子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孔子是自由地主階級的代表，此次讀了歐伯先生的大文，將老子和論語重翻一遍，覺得我在當時的主張，沒有修正的必要。反之，歐伯先生對於老子的描寫，雖天花亂墜，頭頭是道，但我仍然沒有法子使『行不得也哥哥』這一類話，不湧現於腦際而宣洩於筆端。五月十五日

歐伯

參閱求真雜誌創刊號）。但李先生的意見却與此完全相反。他認為『老子是封建階級的代表，孔子是自由地主階級的代表』，據他自己說，當他『寫胡適之哲學史大綱批判時，……已經說明了。』可惜現在一時找不着李先生那部著作，我們無法知道他是怎樣『說明』的。（但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找着來一飽眼福！）不過就現在李先生的『行不得也哥哥』一文中所表露的見解看來，不僅一點看不出他對於老、孔所代表的階級關係的『說明』，反而在他那滿紙虛構，曲解和附會的烟霧中，令人愈加迷糊了。現在讓我將李先生的原文逐步來略加分析一下吧。

李先生首先從『老子』裏引出了『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這幾句話以後，於是得意地作出結論說：『這是愚民政策最露骨的表现，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的。』只要不故意曲解，誰也不能指這為同情農民的證據。可是，李先生這個結論作得太輕率了！這是『只見樹枝而不見樹林』的一種暴露。因為這是將上面所引的幾句話從老子的全部思想割裂開來，并使之完全孤立起來所下的一種謬誤判斷。

只要稍微認真研究過老子一書的人，就應當知道：老子的全部思想，從他的哲學到他的社會思想或人生觀，都是建立在根本反對當時的全部文化（即封建制度的文化），而主張回返於『自然』（所謂歸於朴）和『無為』的狀態之上。但要回返於『自然』，『無為』，便必須從根本上消滅引起

『違反自然』和『有爲』的一切智識。所以老子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因為他認定『智惠出，有大僞』（古字『僞』與『爲』同）。『有大僞』，就不『自然』了，就要弊害百出了。而且『智』是一切『欲』的根源，『欲』又是一切『不知足』的根源。『不知足』，一切禍亂和罪咎就因之發生了（『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如果懂得了老子這一系統的根本思想，則李先生前面所引的一段話，就絕不致於誤解是單純『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的』一種『愚民政策』了。（只有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是真正站在封建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的愚民政策哩。）因為老子所主張的『愚』，絕不限於『民』，就是『統治者』自身也必須『愚』（所謂『絕聖棄智』），而老子自己就以『愚人』自命。例如他說：『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皆有以，而我頑似鄙。』這還不够證明老子所主張的『愚』，是指的一切人都應該『愚』嗎？而且李先生上面所引老子的一段文句，還是割裂過了的。其全文是：『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這顯然不是表示單要『愚民』，即治者本身亦應當『絕聖棄智』，應當『自愚』的。否則，就成爲『國之賊』了。李先生爲了辯護自己的成見，竟不惜『斷章取義』來譏議老子！然而這種『斷章取義』的把戲，還有呢！請看下去吧！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李先生引出了這幾句後，接着便援引蘇轍對這一段的『解釋道』：『民安於政，故衆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因而李先生由此『證明』（？）『這又是替統治階級打算盤的說法。』但可惜李先生在這裏玩弄『斷章取義』的把戲玩得太露骨和太不高明了！讓我們將全文抄出來給大家看看：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這全段文句的意思，只要對古文學稍具根底的人都能看得明白。這意思就是說，用死刑恐嚇人民，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而且『殺人』自有『天道』（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代替『天道』來殺人的，自己也一定要受到傷害的。老子在這裏顯然是表示根本反對用死刑來處罰作壞事的人。這正是天真的好心腸的表同情於人民的觀點。然而我們的李先生却完全不顧前後文

義，即從腰間硬斬一段下來，并借用主張嚴刑酷罰的蘇轍的曲解來武裝自己，來替自己的荒謬主張辯護。這種對於原文如此不忠實的態度對於素常堅持採取科學態度以研究歷史的李先生，未免有點過於諷刺了！

李先生又引證『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的幾句話，認爲是『替統治階級打算』，是『小罵大幫忙』，『是老子對封建地主階級的秘訣』。從『老子』中數出它提到多少次的天子、……王公、侯王、……聖人及君子等，便證明這是『從四方八面去教育統治者以永久維持統治地位的術法』。從『治大國若烹小鮮』，一句話中，便看出了這『是不要去騷擾老百姓，讓他們安安靜靜地替你們做奴隸吧』等等。李先生在這些地方，真不愧爲『別具隻眼』，對老子極盡了『深文周納』之能事！但不幸的是：李先生在這些『深文周納』的『裁判』中，却連最簡單的解釋，最普通的形式邏輯，也不顧及了。例如，李先生在數出老子『遺文』中載有多少天子、侯王、聖人等等之後，毫不加以解釋，即斷定這是『他從四方八面去教育統治者！』。難道一提到統治的頭銜，就是爲的『教育統治者』嗎？其實，老子所提出的『天子』，『侯王』，『聖人』及君子等，全是抽象的，擬想的，理想化的。（老子書中，從未具體提過任何統治者或朝代的名字）他的根本目的在於以這種抽象的、擬想的、理想化的天子、侯王、及聖人等，去對抗當時實際上嗜戰好殺，貪婪腐化及剝削和壓迫人民的一切統治者，并以此作模範去批評它們，暴露它們，攻擊它們，否定它們，甚至希望真有這樣的理想人物去代替它們。毋須說，老子理想中的統治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是幻想的。但以此『作模範』去批評、暴露、攻擊和否定當時實際上的統治者們，却是含有實際的社會政治意義的。這正是農民的樸素觀點。因爲當農民們對現實的統治者，當前的國王感到不滿而不能忍受時，往往希望有一個『眞命天子』出來搭救它們，——這差不多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以前中外歷史的一般規律了。然而自命深通歷史唯物論的李先生，却對此也不願加以理解，似乎也是大可惋惜的！

至於李先生一口咬定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是理想的典型的封建制度，最合於歐洲封建社會所謂『天高皇帝遠』的情狀』。這就更加莫明其妙了！我真不知道李先生指定老子的『小國寡民』『是理想的典型的封建制度，最合於歐洲封建社會所謂『天高皇帝遠』的情狀』，究竟何所據而云然？『歐洲封建社會所謂『天高皇帝遠』的情狀』，我們是知道

點的，那就是：嚴格的等級制，專橫的教會制，封建諸侯間不斷的鬥爭，無情地壓榨農奴或農民，……這與我們春秋時代的封建社會是大同小異的（主要的不同點，僅是春秋時代沒有專橫的教會制），然而這正是老子所極端反對的。如果照李先生的說法，則老子簡直是以同一的『理想的典型的封建制度』去反對『理想的典型的封建制度』了！其實，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與『歐洲封建社會所謂「天高皇帝遠」的情狀』，毫無共同之點。因為在『小國寡民』的簡短描寫中，不僅毫未提到等級，沒有戰爭（因為『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甚至不用『什伯之器』，不用『舟車』，不用文字，並且各個『小國』間還是各自完全孤立的（『老死不相往來』）。像這樣的『小國寡民』，除了用理想化的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來解釋外，實在找不出別的比例。至於老子在這裏也『滿口小國、鄰國』，那只是因為他在那時還找不出別的實當名詞或術語來表達他的理想社會（因為那時還沒有發明『烏托邦』，『新村』或什麼主義的社會呢），所以權且借用『國』來形容它。而且從用『小』和『寡』來形容『國』與『民』看來，顯然已證明老子是有意識地將他的理想社會與當時的封建國家加以區別的。但我們的李先生抓住了老子的一個『國』字，便硬說『他要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這已是過於『唯名主義』了！還有更機械的是：『貴族出身而又做慣柱下史的老子絕對沒有意思要人類回到自由平等的原始社會去』。那末，我試問：何以貴族出身而又做過沙皇軍官的托爾斯泰，也企圖『要人類回到自由平等的原始社會』去呢？（其實，在古代東方社會裏，這種情形是頗為普遍的）至於李先生說老子主張『不用文字，是貫徹他的愚民政策，為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先聲，而且在兩者之間也只有程度上的差異，沒有本質上的不同。』以及『如果真要把他（老子）和外國人對比的話，那畢士馬克最為適當。不獨畢氏晚年所施行的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相當保障工人的生活，並且宣言『我亦國民』，這比老子更像同情於民衆。……』這種奇異的『對比』，可謂極盡『不倫不類』之能事！我因為篇幅所限，在這裏無法予以駁斥，只好暫時回之打聲『哈哈！』吧了。

此外，李先生提到老子『道德經』中的『一元論與辯證思想』時算是『慷慨地承認』了『也許還有一點影子』。但果真只是『有一點影子』嗎？（姑且丟開『也許』）在『道德經』中，『道』、『一』或『無』，像一根金線一樣貫串了老子的全部思想或章節，而辯證思想或矛盾邏輯，則又有如『經

緯』，差不多交織在全部思想的各個部份之中。假如不是帶的特殊的玄學眼鏡，一定不會看不見的。而李先生却只能從『也許』中猜出『一點影子』。光從這一點看來，李先生對老子思想的認識程度，也就够我們玩味了！

我在『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中，比較老子與孔子的思想時，曾說過：『孔子是完全站在當時封建貴族的觀點上，企圖用改良主義去挽救正在崩壞中的封建制度，維持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與特權』。這雖然說得很簡單，但確是我根據有關於孔子思想的全部材料研究出來的總結論，本是無可否認的。而李先生却認為『這和事實相去太遠。』我們且就李先生所舉出來的『事實』來略予檢討吧。

李先生說：『封建貴族的特權，無過於世襲，一切大權都由貴族包辦，他人不得染指。但孔子恰恰反對這一點。春秋世卿是一證』。所謂『春秋世卿』，這一句話究竟是否可靠，及有何種根據？李先生絲毫不加以考察，便貿然用以『證明』孔子『反對』『封建貴族的世襲特權。實際上，孔子不但不會反對封建貴族的世襲特權，而且相反地，他是更有『理論地』，更有『系統地』在維護這一特權。孔子的『正名』主義及『禮』治主義，就是最明顯的表現。不過在孔子看來，世襲特權是與等級制度或『名分』制度緊相聯繫着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這一『名分』制度之具體表現。所謂『春秋』的『微言大義』，亦正在於此。所以孟子說：『世微道衰，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他又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即莊子也承認『春秋以道名分』（見『天下篇』）。因為只有等級嚴，名分定，封建制度才能穩固，封建貴族的世襲特權，也才能有『合理』（即所謂『禮』）的保證而不致受人侵犯。正因此，凡是亂『名』越『禮』的，孔子都加以嚴厲的譴責。例如：『孔子謂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這還不足以證明孔子會嚴密維護着封建的整個制度，保護着封建貴族的特權嗎？

其次，李先生引出『千乘之國，……由也爲之』，『方六七十，……求也爲之』，『宗廟同會，……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等等後，說『這是平民出身的子路，再求，公西華要做卿相而爲孔子所首肯，又是一證』。



此外，李先生又引『雍也可使南面』，認為『竟要「犁牛之子」的冉仲弓做起國王來』。最後，引南宮适與孔子談話的故事後，則根據朱熹的註『解釋』，而遂斷定『「吾公也賤」的孔二先生竟想登九五之尊，帝制自爲』。其總結論是：孔子『要革貴族的命』。如是孔子竟成爲封建貴族社會的革命家了！新奇的思想，偉大的發明！果真如此，我試問李先生：孔子的『正名』是什麼意思？孔子所謂的『禮』，含有什麼意義？孔子『作春秋』，爲了什麼？孔子之譴責『八佾舞於庭』和『三家者以雍徹』等，其含意何在？孔子說『吾從周』，始終尊崇周天子，又是什麼用意？孔子說：『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作何解釋？……李先生即令精於詭辯，恐怕也無法解答他所提出的上敘那些意見與這些問題之間的矛盾吧？但實際上，李先生是上了他自己的當。他把孔子平日與其生徒們閑談時，隨便稱贊他們當中誰有『能力』可以作什麼官，甚或可以作皇帝(?)的閑話，也像煞有介事地引了來，『證明』孔子是想鼓動『平民』起來推倒封建貴族階級了！最妙而又滑稽的是：李先生竟相信朱熹對於南宮适同孔子談話的那一種歪曲的『解釋』，竟然認定孔子是『想登九五之尊，帝制自爲』！李先生斷定孔子的思想及其所代表的階級關係，不從孔子的全部思想體系上及他生平的行動上，反而從孔子平日與其生徒們的閑談中，乃至從朱熹的曲解中，這不僅是『不見樹林』，即連『樹枝』也弄錯了。

如果我們從孔子的全部思想體系來看，即從他『嚴定名分，尊崇禮制，宣揚忠孝，誇說仁的理想』來看；再從孔子在行動上之『一車兩馬，周遊列國』，勸說諸侯，重定名分(如對齊景公)，等等來看；除了我所指出的『孔子是完全站在當時封建貴族的觀點上，企圖用改良主義去挽救正在崩壞中的封建制度……』以外，是無法正確地解釋孔子的思想和行動的。

爲了更簡明一點了解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及其所代表的階級關係起見，我最後再把他們雙方的基本思想，行動及其對於後世的影響來對照一下：

一、在哲學上，老子是一元論者(唯心的)和辯證法家(消極的)；而孔子則是庸俗的經驗論者，折衷主義者。

二、在政治上，老子是站在『自然無爲』的立場上攻擊當時一切封建統治者的胡作亂爲，如根本反對戰爭，反對封建的倫理(如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主張回到『小國寡民』的原始社會去。而孔子

則站在改良主義的觀點上，批評當時封建制度的敗壞，希圖加以挽救，因而主張嚴定名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提倡忠孝，恢復封建的倫理，企圖以此將當時正在崩壞中的封建制度回復到西周初期的封建制度形態上去(如說：『郁都乎文哉，吾從周』——指西周)。

三、在行動上，老子因爲完全不滿於當時封建制度的一切現狀，除兩度任職守藏室史及柱下史的閑官之外，終生過着隱遁生活，專從事著作以攻擊當時的一切社會現象。而孔子則『一車兩馬，周遊列國』(據說在外十三年)，企圖實行改良當時的封建政治，并曾爲魯之司寇。迄至『道不行』，才轉而從事著作，教育門徒，藉此宣傳他封建改良主義的大道。

四、從對於後世的影響說，信奉老子之道(所謂道教)者，多爲下層平民，尤以農民爲甚。中國自東漢末千餘年來許多次的大小農民暴動，多以道教爲其思想上之旗幟(不僅東漢末張角之『太平道』，『五斗米道』，純信奉老子。即後來元末之白蓮教，清末義和團之八卦教等，亦多以道教爲中心)。但崇奉孔子者，則多爲上層階級，尤其是君主(漢武帝後)及官僚貴族(所謂士大夫)。他們甚至把孔子尊爲『大成至聖』，『萬世師表』，而以他的思想爲『天經地義』。至於農民對於孔子平常是冷淡的，到了他們進行暴動的時期則多半是根本反對他的(例如太平暴動中，農民常將孔廟焚燬)。

這裏所舉關於老、孔的幾點『對照』，自然是十分簡單的，解釋得極不充分的。但至少可以證明李季先生對於老、孔所代表的階級的『主張』是歷史事實完全違背，是虛構的，曲解的，附會的。這當中的根本原因，是李先生在方法上已從辯證的唯物論跌進到了經院哲學的懷裏，再加上一種特殊的成見，以致看了我的『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後，還認爲『沒有修改』他『快二十年前』所發表的主張『的必要』。這就證明李先生是走得太遠了！但我還是向李先生打招呼：『回頭是岸』！ 五月廿五日

『本誌主旨，在進一步介紹高度發展的學術思想，并予以發揮。』

『爲要達到上述任務，本誌決採取完全公開討論和民主批評的精神。凡國內各派系的思想或創作，都願容納在本誌內發表，並任其自由討論和相互批評。因爲任何真理，任何有價值的作品，只有經過無限制的討論與批評，才能顯現其真價。』——摘自本誌『創辦宗旨』。



# 論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

冰夷編譯

文藝復興時代的結束已經是西歐戲劇上新時代的開始。向古典主義樣式轉移的過程漸漸在完成之中。在有些經濟力量強大的地主貴族的國家裏，已經有些過渡形式在開始產生和發展。這一類形式的藝術性常常是很高的，它們表現的是階級矛盾的滋長和貴族階級以及與它相勾結的社會階層所尖銳地感覺到的不安定的狀況。在藝術學中，早已有巴洛哥（Barocco）時代之稱的時期是開始了。充滿了矛盾和古代的傾向的藝術是開始發展了。決定藝術創作的是封建僧侶和資產階級世俗化（secularization）這兩種傳統之間的鬥爭、綜合、有時候是調和。

在西歐劇場史和戲劇史上，這一個時期的開始的特點，是從那在有許多國家還保存着的廣場上演出的神秘劇（Mysteria）形式的戲劇藝術轉向文藝戲劇的過渡。這種過渡的形式就是伊麗莎白（Elizabeth 1533—1603）時代的英吉利戲劇和卡爾德龍（P. Calderon de la Barca 1600—1681）、羅普·德·維伽（Lope de Vega 1562—1635）等等的西班牙戲劇。

## 一 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吉利

在英吉利戲劇史上，這一個時期大概開始於十六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之間和結束於十七世紀二十年代。

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是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名字相聯繫在一起的。但是莎士比亞並不孤伶伶地高出在那些比較和他接近的先驅者與同時代人之上，他是在其他優秀劇作家的環境中創造他的作品的；這些劇作家中，有幾個和他同樣的是第一流巨匠。

莎士比亞的時代是戲劇創作極度興盛的時代之一。這種興盛的原因，這種獨特的作風——在自身多樣中求統一——的根源，都應該在當時英吉利社會政治史中去找尋。

和當時英吉利的一般的文化一樣，伊麗莎白時代英吉利戲劇之高度發展的原因，通常也是這樣解釋的：這是國內政治經濟力量的茁長所刺激起來的

民族自覺的高漲的結果。的確，當伊麗莎白之世，在歷朝先王時代所創立的民族國家完全強盛起來了；英吉利戰勝了海上的勁敵——西班牙而成爲世界的強國。商業急速生長，工業飛快發展。英吉利的這種高漲，非但給十六世紀末葉英吉利社會中的有產階級而且也給那所謂「下層」階級開闢了前途和擴大了眼界，確立了團結國家的感覺和意識，促進了英吉利社會階級的分化。這種高漲是和那已經具有世界性的貿易之茁長與貨幣資本之發展有關的。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都尖銳化起來。幾十年之後，在第一次英吉利革命的時候，階級鬥爭達到了頂點。

伊麗莎白時代，英吉利革命已經有了前提。以伊麗莎白朝作結的都鐸爾（Tudor ●）時代（1485—1603）是商業資本向封建主義鬥爭與成立的時期。都鐸爾王朝——這在本質上是布爾喬亞與布爾喬亞化的地主貴族的王朝。它把發展中的資本主義以及那和資本主義有關而向羅馬封建僧侶階級挑戰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等的政策推行到了相當的程度。封建主義農業的英吉利的基礎給破壞了。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 1509—47）時代，由於毛織工業的發達，基本的經濟形式就已經開始由農業轉到收羊業，地主們開始搶掠和「圈收」公共的草地，破壞與徵發農民經濟等等的行情也開始了。由於這一過程，那租賃和收買地主土地的企業家、商業家和工業家的階級抬頭了。在這一以貿易關係爲特點的時代中，地主貴族依賴市場以致於依賴金錢的情形加深了。

當商品經濟正以這樣的速度發展的時候，英國同時也在比較迅速地擯棄那在政治上與之相吻合的絕對專制主義（absolutism）時代。在伊麗莎白朝の後半期，布爾喬亞已經成爲議會中對抗國王政權的反對黨。向上的布爾喬亞

★ 本文前面大部份譯自蘇聯共產主義學院文學、藝術、語言部出版盧那恰爾斯基

著「文藝百科全書」中「戲劇」條第七節第十九章，末了第七節後半部譯自蘇聯柯爾遜著「西歐戲劇史大綱」，第二篇第十九章。

1485—1603年之間英吉利王朝的姓字。這一朝的國王有亨利七世，亨利八世愛德華六世，瑪麗女王和伊麗莎白女王。

努力爭取社會與政治的支配權，這種鬥爭越來越尖銳。布爾喬亞建立了自己的意識形態——清教徒主義（Puritanism）——來對抗地主貴族。清教徒主義——這是在精神上和宗教上把那些正在蓄積與確立之中的有助於贏利目的的道德觀念——禁慾與節儉——加以神聖化。

## 一 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的內容

在英國這些社會性的矛盾中，第一批經常演出的劇場也在英國產生了。

隨着城市的發展，尤其是倫敦的發展，娛樂的傾向也同時增長了。我們祇要看看莎士比亞戲劇與當時各種社會階層的關係，就可以明白，莎士比亞戲劇是處在社會鬥爭的中心。

一五七六年，倫敦建立了第一所劇場。於是就在劇場周圍展開了反映政治局勢的鬥爭。倫敦市議會，憑藉了市政權，禁止在市區內行使建立劇場的特許權。市議會所持的理由是認為劇場是聚集大量人羣的地方，所以恐怕有傷風敗俗的危險，而且有破壞公眾秩序與安寧的可能。因此各劇場祇好不建立在城內（City），而不得不建立在市區之外，泰晤士河（Thames）的東岸。爲了答覆貴族對於劇場的保護，充滿清教徒情緒的布爾喬亞，以市政權出面來殘酷地迫害劇場，認爲劇場是一切罪惡與墮落的淵源，優伶是贗神的東西，劇場祇好拚命爲了自己的生存而鬥爭。因此劇場成爲含有直接意義的階級鬥爭的舞台。它以自己本身的存在，把『耗費』金錢以及與金錢同樣值錢的地主貴族文化去和清教徒的『蓄積』的文化對抗。但是就以它本身活動的性質來說，劇場已經是以貴族的享樂主義去對抗布爾喬亞的禁慾主義，以熱情的詩去對抗義務的宗教，以追求權力與享受之個性的放任去對抗那向宗教與道德的規範低首的傾向，以遊戲與散漫去對抗專心一致的祈禱，以他們那種奢侈的生活，甚至於以崇拜糜費揮霍的傾向去對抗那頑強地集積精神與物質力量的傾向。貴族文化在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中爆發了迴光返照的最後的光華，這一爆發也就使清教徒對貴族的仇恨尖銳化了。而且此外：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非但在一般的文化意味上，而且在它的政治傾向方面，都是深深敵視清教徒主義的。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大多是那些在本質上已經和道學的布爾喬亞相敵對的放浪文人（Bohémien）所寫作。這種放浪文人大多是貴族，其中有不得已要覓取糊口之資而又懷念着過去的好時光的沒落貴族，其中也有叛離階級的階級而投奔他們的人，尤其多的是因國內資本主

義化的過程而破產的手藝人階層的人。所以，這些放浪文人，在清教徒主義的布爾喬亞勝利之際，眼看着自己滅亡而還要竭力否定這種滅亡的趨勢和社會關係的變更——自己一切災厄的原因——，那是毫不奇怪的。社會階級制度的牢固——這就是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的社會哲學。當時那種下層階級從上層的形式也擴張到了自然的法律和神的戒律中去（莎士比亞：『柯里奧蘭』[Coriolanus]、『亨利六世』三部曲，[King Henry VI]之第二部；彭·瓊生[Ben. Jonson 1573?—1637]：『煉丹術士』[The Alchemist]等等）。這見解成爲伊麗莎白時代戲劇所傾向的那一個階級的傳統。這一個階級到那時爲止還是站在統治地位的，它從中世證明它的政權是正當的，它企圖在戲劇中給這已經動搖的傳統以新的光澤與新的力量。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的社會作用就在這裏，貴族的保守的觀念形態與迅速革命化的布爾喬亞的觀念形態對立起來。貴族的觀念形態的宣揚者登台了，祇有他們才容許放進悲劇裏去，而且祇有他們才是有個性的人物。當時所特有的個人主義抬頭的感覺，表現於戲劇裏的貴族與平民的鬥爭之中。這總是有個性的人物與沒有個性的人物的衝突，羣衆生活的意義是在於他們服從那奉爲個性堅強而明朗的人物的貴族。貴族階級是那高貴的聰明人普羅斯貝洛（Prospero），羣衆是那的卡里本（Caliban）。

和羣衆分離的布爾喬亞開始向貴族階級爭取統治權，他們在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裏是難得到寬恕的。所謂詩的正義感主要是靠了布爾喬亞而完成的。沒有特權的布爾喬亞受罰甚兇。階級之間的界限守得很嚴格。譬如，出身門第不相等的人之間的婚姻祇有在國王親自干涉的時候才有可能（莎士比亞的『結局好才是真好』[All's Well That Ends Well]，葛林[R. Greene 1560?—1592]的『威克斐田野看守人』）。遇到困難的時候，常常愛用認出身份這種手法來解決：認出那冒充侍女、小市民等等的貴族女子，原來是出身貴顯的千金小姐（麥山傑的『租借權』）。

貴族階級的意識形態在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中也佔着優勢，但是這時代的戲劇非但是給貴族看的，而且也是給羣衆看的。它很普及。當時有一個劇作家批評伊麗莎白時代的劇場，說得很公允：『渾身烟草氣味的最下等的工人，他在這裏和那灑滿香水的宮廷貴顯有着相同的權利，馬車夫可以像批評

倫敦市內最繁盛的區域。

莎士比亞劇本暴風雨（Tempest）中的人物。

家那樣的發表意見。『放浪文人在自己沒落的過程中認識了羣衆，而且向特衆學習到了許多東西，所以他們之關心羣衆擁護，不下於關心貴族的擁護。』

他們的創作——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是不同於法蘭西古典主義宮廷階級的戲劇的。還有一點也是促進莎士比亞劇場形式趨向民主化的原因：保護劇場的貴族階級企圖利用劇場來做爭取羣衆的宣傳工具，想以羣衆來對抗清教徒的布爾喬亞以及引起舊貴族不滿的伊麗莎白的專制政治（參閱莎士比亞的『理查二世』(The Tragedy of Richard II)：這作品裏表白着那企圖推翻伊麗莎白而沒有成功的愛賽克斯 (Essex) 的貴族反對黨的觀點）。劇作家的貴族的傾向還不能擯絕這些羣衆。英國的小手藝人、學徒、水手等等還沒有抬頭到階級自覺的地步，但是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藝術所充滿的民族自覺、民族主義、愛國精神等引起了他們的同情。假使這裏再加上劇作家非常精擅的適應羣衆口味這一點，——如加用專門爲觀衆而作的場面，廣泛利用羣衆所了解而且也就是羣衆所創作的形式，——那末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在下層觀衆方面的成功是顯而易見的。

### 三 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的形式

在藝術的結構上，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大多是從中世紀的神秘劇和道德劇 (Moralie) 之類的原素中生長出來的民間戲劇。這些原素，比了人工地模擬古代的、主要是羅馬的範本要強。而那在英國也得到發展，但是甚至於在宮廷圈子裏也沒有得到像民間戲劇這樣地位和成功的學院派宮廷戲劇就是建立在這些範本之上的。柯文特里 (Coventry) 地方的有名的神秘劇在十六世紀末葉還是很成功。道德劇之盛行，可以從下列事實得到明證：一六〇一年時，伊麗莎白宮廷裏曾經上演過『節儉與吝嗇之爭』。

這些古老形式的戲劇創作，特別是在英國，是和人民的生活有關的。爲了明白起見，神秘劇中用了許多俗生活的插曲。從聖經中借用來的人物變成爲典型的英國人。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是攝取着這種民族寫實主義的神秘劇性質的。它把別人的一切東西變成爲自己英國的，而且描寫得非常真實（參閱彭·瓊生的劇本『各有各的脾氣 (Every Man in His Humour) 的兩種稿本：改動了劇情發生的地點，佛羅倫薩 [Florence] 改爲倫敦，但是人物祇改動了外表和名字，實際上仍舊和原來的一樣）。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從神秘劇中借用了許許多多接近下層觀衆的手法。莎士比亞戲劇的比較重要

羣點——像喜劇成分和悲劇成分的混合，還有嵌進許多時常會破壞戲劇的完整性的插曲，以致於這些插曲構成平行的劇情等等，這一切也都是從神秘劇來的。不分幕 (act) 而按照時間與地點的不同來分場 (scene)，這也是從神秘劇來的。和神秘劇的作者一樣，莎士比亞時代的劇作家們所注意到的也是那不顧戲劇理論而祇尋求強烈的直接印象的觀衆，像中世紀的觀衆那樣，莎士比亞時代的觀衆所需要的是宏麗火熾，而不是均勻諧和。莎士比亞劇本的劇中人物有時有到四十五人之多，平均每一個劇本有二十四人；而法蘭西古典主義悲劇中，平均每個劇本所有的人物却不到十一人。這種不惜任何代價去爭取效果的傾向也可以說明那種描寫犯罪和受難之粗拙的自然主義 (Naturalism) 的特點，而這種特點也是從神秘劇中帶來的。台上當場出彩地表演暗殺、大流血、斷裂開打或者用火燙挖出眼睛等等。

另外一種古老的樣式——道德劇——之所以易於被利用，那是由於其中寓意成分漸漸脫離出來成爲具體形象的緣故。這種具體化曾經受到宗教改革的有力的推動。道德劇中本來祇以罪惡和美德之抽象的人格化佔優勢，由於宗教改革，其中也出現了像教皇、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英國國王等等的人物。

假使說，神秘劇以聖經的題材限制了作者的創作的想像力，祇容許在細節上有自由，那末道德劇在選擇和處理題材方面對於作者是沒有約束的。當道德劇中開始加入活的人物的時候，其中已經做了性格描寫的初度試驗。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的特點是：和當時的時代性以當時的生活與問題等等保持着聯繫，這種特點也是和道德劇有關係的。

在響應爭取政治和宗教的迫切的利益的時候，宗教改革時代的道德劇也開始處理歷史的材料，因爲可以藉此來確認這種或者那種傾向。例如，貝爾爲了宣傳新教的目的而曾經以無地王約翰 (John Lackland) 和教皇英諾森三世 (Innocent III) 鬥爭的題材寫過道德劇。

所以，道德劇中已經有了伊麗莎白時代俗生活喜劇和歷史劇的萌芽。在俗生活喜劇中，有時候甚至於還保持着像愚蠢、美德之類的寓意人物，莎士比亞的最受歡迎的形象之一——丑角 (clown)——也是從英國道德劇中的『罪惡』那一個角色產生的。

這種由中世紀樣式發展成新時代的俗生活喜劇的過程是那和道德劇有關的插戲 (interludium) 所促成的。這種插戲後來成爲約翰·海伍德 (John Heywood 1467—1580?) 那種以觀察當時生活爲基礎的獨立的樣式。

伊麗莎白時代，有一種所謂羅曼主義的戲劇，即有着不平常的題材，夾雜着默劇 (Pantomime) 和枝節橫生的糾紛的戲劇。這種戲劇發展得很廣，它的來源也是民間傳說、迷信和歷史等等。

但是假使說，民間的和國民的原素的影響，在伊麗莎白時代戲劇中也佔着優勢，那末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形成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的別的原素。復興的古風無疑地對於民間戲劇是有影響的。這是那以古典文化爲基礎的貴族文化的影響。英國人文主義的創作是學院派宮廷戲劇。羅馬的戲劇藝術，還有意大利的戲劇藝術，它們的影響，先及於喜劇 (魯陀爾的『賴爾夫·羅斯特·陀斯特』，算是斯蒂爾 [R. Steele 1672—1729] 作的『祖母霍登的針』，後及於悲劇 [諾登 [Norton] 的『霍鮑杜克』和薩克維爾的『坦克萊德與西格蒙達』)。然而就是在那些參照古典範本所寫的作品中，國民的、民間的原素也很強烈。道德劇的影響如此的強烈，竟至於那在普勞特的『亞姆非特里昂』 (Amphitruon) 影響之下所寫的插戲『騙子傑克』有好多時候是算做這一類樣式的。從學院派圈子裏出來的悲劇『霍鮑杜克』 (1560) 對於古老的英國的戲劇傳統是和對於賽納卡同樣忠實的。其中三一律是給破壞了，裏面加進了默劇的形式，題材也不是借用古代的歷史，而是借用民族的傳說。

古典的和民間的原素之交織，也是更接近於莎士比亞時代的作品特色的。『坎姆比士』 (普萊斯頓著)，『亞比安與薇琴妮亞』 (1675)，這兩個劇本也是從學院派圈子中出來的，它們受惠於古風題材的，但是又充滿着道德劇的成分和英國神祕劇的悲劇效果。所以，十六世紀八十年代，顯然以民國成分佔優勢之英吉利戲劇的古風成分和國民成分之間，已經有了調和的現象。民間戲劇與宮廷學院派戲劇之間，無疑地存在着相互的作用。形成這種相互作用的條件是那不得已而立脚於貴族和羣衆兩者之上的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的二重狀態。民衆劇場的劇作家常常也爲宮廷劇場寫作。譬如，彭·瓊生曾經在這種典型的宮廷樣式中創造許多假面人物，宮廷劇作家李里 (Lyly) 也是著作劇本供給民衆劇場的；假面劇無疑地是和宮廷劇場所愛好的田園劇 (Pastorals) 一樣地對莎士比亞起着影響的 (前者如：『枉費心機』 [Lovers

Labour's Lost)、『溫德爾的快樂的妻子們』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辛巴林』 [Cymbeline]、『暴風雨』 [Tempest]、後者如『冬天的故事』 [The Winter's Tale]、『如君所願』 [As You Like It] 等等。)

宮廷學院派劇場與民衆劇場之間的這種相互影響以及古典成分和國民成分的調和等等的有趣例子是那從古代悲劇中取來的合唱隊的命運。合唱隊的作用轉向於一個人物，有時候它帶着寓意的性質 (『冬天的故事』中的『時光』)。引子 [Prologues] 是由合唱隊誦讀的。合唱隊利用那和劇本有關而放不進去的事件來補充劇本。

上述各種成分之相互的影響，也表現在伊麗莎白時代戲劇中用得頗廣的借用的方法之中。借用的來源有英國的史料，也有古代的作家 (尤其是普盧塔赫 [Plutarch])，新作品的來源則有意大利的小說。

古代和意大利的影響，在伊麗莎白時代作家的語言中也很強烈 (誇飾法 [euphuism])。劇中人物的言辭中常常可以遇見古代神話的形象。宮廷派風格的誇張，賽納卡風的肢節，——當時最大的劇作家都無法避免這種情形，甚至於馬爾洛 (Marlowe) 和莎士比亞也不能例外。

但是，在研究伊麗莎白時代作家的詩歌文字的時候，應該注意，從我們的觀點上看來認爲是誇張和人爲的地方，在他們當時並不是完全感如此的。當時是階級矛盾非常尖銳化和社會變革極度宏麗的時代，是充滿偉大的發現和功業的時代，人們的眼界擴大了，想像力也給刺激起來了。爲了滿足想像力，所以就需要一種與此相當的風格，需要特別緊張的，但在我們看來却是過份緊張的言辭。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證下一事實：在巴洛哥時代，作品中廣泛應用譬喻法 (tropos) 和誇張法 (hyperbole) 已經成爲一種特點。假使說，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的許多修辭法也可以用意大利十四行詩 (sonetto) 對於當時一般文學的影響來解釋，那末這裏對句法 [parallelism] 或者對偶法 [antithesis] 之被採用，大多也是爲了使下層觀衆易於接受的緣故，這是一種具有說服力和感動力的演講術。莎士比亞的戲劇對此也很努力。所以有許多情節有關而想以之來加深情節印象的同一類形象是經常變化着的 (『馬克白』 [Macbeth] 中『血』，『血污』等等字眼聯結着『暗殺』，『兇手』，『刀』，『毒藥』等字眼)。所以動人的戲劇性有着壓倒的趨勢，而且有

着『過重』的模樣。在借用他們自己的題材的時候（差不多總是借用的），伊麗莎白時代的劇作家是不顧到題材之真實性的程度的。他們竭力用富有效果的場面，有時候把幾個機構上互相毫無關係的題材結合在一起（湯麥斯·海伍德 [Thomas Heywood ?—1620] 的『英國旅客』）。發展劇情糾紛的真實性也犧牲了效果。當時的戲劇藝術努力趨向於最高的動人的戲劇性，它並不輕視一般的古代喜劇的手法（認出人物的出身，改裝易服等等），而把它們巧妙地加以變化。

題材、劇情的糾紛、上演性——這在當時一般同戲班子分不開和不能獨立的典型的劇作家們看來，是最要緊的。創造性格並不是他們的基本任務，雖然這也常常會構成他們的力量。推動劇情的方法之不準確，並沒有使他們的藝術家的良心感到不安。

民間戲劇甚至於爲了着重效果而擯棄作品的統一性那樣重要的藝術要求，把性格的真實性和節制性犧牲給情緒的影響，——這一類的戲劇當然能夠毫無困難地從韻文詩轉到無韻詩。在情緒沸騰和充滿一刻不停的行動的劇場裏，戲劇中像韻文詩這種人爲的形式是不適於劇場的基本任務的。隨着無韻詩的採用，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更能自由地表現內心的情感和發展劇情的糾紛了。

韻文詩祇是留作特定的目的之用。韻文的運用，那是爲了分出劇中幾個補充的或者額外的要素（moment），例如，引子和尾聲，插入的曲子等等（參閱：『仲夏夜之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哈姆雷德』 [Hamlet] 中『演戲』那一場，『暴風雨』等等）。也有用散文來作這種分出和對立的目的之用的，不過它的意義比較廣泛。韻文詩和散文的結合，在詩歌語言的領域裏反映出了伊麗莎白時代戲劇所特有的悲劇性和喜劇性的結合（參閱：『亨利四世』 [King Henry IV]）。有時候強烈的悲劇效果是以這種交替互用的方法來達到的（安東尼 [Antony] 和勃魯德 [Brutus] 的言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構成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的一致的風格的成分是多麼繁複多樣。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傾向上，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是貴族階級的，但是它不得不同時也要依賴羣衆，在形式方面以絕對多數的重量給予那些接近羣衆的成分，竭力設法以貴族階級的成分去適應那些接近羣衆的成分。

## 四 莎士比亞的先驅者

伊麗莎白時代作家們在戲劇裏轉借和引用的種種，在幾十年中得到了光芒萬丈的發展。當時每一個傑出的劇作家對於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史都有着自已的貢獻。

約翰·李里 (John Lyly 1554?—1606) 在宮廷貴族階級形式方面所表現的影響最完全。他是長篇小說『歐甫愛斯及其英國』 (Euphues and his England 1579) 的作者，這小說給貴族階級企圖以之去和羣衆對立的沙龍 (Salon) 式的作風題了個名字<sup>①</sup>。在日常語言方面，李里已經以小說家 (Bellettrist) 的地位把八十年代英吉利戲劇的語言加以『歐甫愛斯』(誇飾)化了。英吉利戲劇曾經和誇飾法的成分進行過長久的鬥爭。這種鬥爭一直到它把這些成分像把其他幾種別的成分那樣的混合溶化之後才止。

宮廷劇作家李里是當時所特有的民間戲劇和宮廷戲劇互相調和的例子。他以古典的追憶 (reminiscence) 來充滿他的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一八八四年發表的喜劇『亞歷山大與康派斯』 [Alexander and Campaspe] 及其他等等)，他抨擊古典主義詩歌的規律，他破壞三一律和以插戲來切斷劇情。李里在這些插戲裏所作的對話活潑而典雅，他在喜劇中採用散文。在他之前，喜劇是完全以韻文詩寫的。所以，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的重要形式特徵之一是和李里的創導有關係的。

有一部沒有流傳下來的所謂『哈姆雷特之祖』的作者湯麥斯·基德 (Thomas Kyd, 1568—1594)，在他的『西班牙悲劇』 (The Spanish Tragedy) 中也顯示了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的幾個主題（悲劇主人公裝瘋，演戲的場面）。他的創作的特點是悲劇的感奮情緒和緊張的劇情。

然而伊麗莎白時代的真正的悲劇作家是克里斯多福·馬爾洛 (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他是放浪文藝戲劇家的典型的代表，優伶兼作家。馬爾洛是一個鞋匠的兒子，後來才加入到貴族階級的文化中去（他是劍橋大學 [Cambridge University] 的 magister artium [文學博士]）。在他第一部悲劇『塔美朗』 (1586) 中，馬爾洛就已經以改革家的姿態

<sup>①</sup> 均爲莎士比亞劇本猶里·凱撒 (Julius Caesar) 中的人物。

<sup>②</sup> 上面『誇飾法』 (euphuism) 一字就是由此而來。

出場了。他相當順利地試用那在他之前英吉利戲劇中所缺乏的劇情的一致性，他以中心的主題，以控制一切部份的完整的思想來克服英吉利戲劇的插話性。在主人公身上擬人化的偉大的熱情就是馬爾洛這種結合一切的中心（『塔美朗』中的權勢慾）。這一方面，馬爾洛克服和改造了道德劇的遺產及其寓意法（allegorism），因為他還沒有創造出個人的或者典型的性格，而是在把熱情擬人化。馬爾洛利用道德劇的遺產——擬人化——來創造戲劇作品的結構和劇情的心理表現。在『塔美朗』中，馬爾洛是帶了一種也是頗為重要的新方法而出場的，這種新方法在戲劇技術方面引起了一次革命。他採用那構成爲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的重要特點的無韻詩，他採用五音節的無韻的詩格。馬爾洛使它自由而多樣地表現出詩意來。在他的第二個悲劇『浮士德博士的悲劇』（The Tragic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 1588）中，馬爾洛是哥德（Goethe）的先驅者，他在這一個悲劇中加進哲學的主題，表現出文藝復興努力爭取克服自然界的權力的那種趨勢。他的『馬爾泰的猶太人』（The Jew of Malta, 1589）豫示了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的面貌，這一個劇本是瑕瑜互見的，它的特點是：誇張，不真實，缺乏節奏。在他的『愛德華二世』（Edward II）中，馬爾洛又踏上英吉利戲劇改革家的高峯。他用歷史劇的題材，用無定形地堆積插話場面的方法創作出這部劇情合理的歷史劇。沒有馬爾洛的『愛德華二世』，也就不可能有莎士比亞的歷史劇。

馬爾洛是頑強堅強的個性和『超人』的歌者，他的貴族的個人主義，他的羅曼主義，是可以把另外一個莎士比亞的出色的先驅者——羅勃·葛林（Robert Greene 1560—1592）的民主主義和寫實主義來與之對立的。葛林非但是劇作家，而且也是傑出的小說家，他在自己的劇本中採用他自己小說作品中的主題和手法：曲折的糾紛，農村生活的詩意的描寫和插話的多樣化。葛林頗善於運用細膩的寫作方法來結合這一個內容。在『修道士培根與修道士彭蓋』（Friar Bacon and Friar Bungay）中，他克服了伊麗莎白時代戲劇藝術中最重要的缺點之一——常用破壞劇情一致性的兩個平行的糾紛，——他巧妙地把這兩個糾紛聯繫起來。同時，葛林劇本中的喜劇的穿插並不脫離基本的劇情。在他的『威克斐田野看守人』中，他在伊麗莎白時代貴族階級的戲劇中加進了一個平民出身的主人公，劇情都集中在他的四周。

莎士比亞的先驅者們的情形就是如此。

## 五 莎士比亞的同時代者

和他同時代的作家中，最出色的是彭·瓊生（1574—1633）。他是反對葛林與馬爾洛所創立和莎士比亞所表現得最有力的得勢的羅曼主義傾向的。彭·瓊生爲了保持真實性而擁護古典主義的原則。不過作爲伊麗莎白時代的真正代表作家的他，在這方面是不顧到教條的。他把古代的詩的規律來適應當時的需要，他支持古典主義的三一律，並不是爲了抽象的理論，而是爲了具體的詩的實踐。一晝夜的時間，古典主義作家認爲是劇情的限度，但是這一條規律常常被彭·瓊生所破壞。地點的一致，這也是以非常廣大的意義來了解的：它和英國的領域相一致，如果劇情發生在英國的話。彭·瓊生在努力做到真實性的時候，也是傾向於說教的。這是確定他的樣式的要素。他是『正確的風俗喜劇』的巨匠，他的『喜劇』對於現實的生活觀察得很充分。彭·瓊生的人物性格建立在誇大的『過分的怪異性』之上，同時他的人物性格也就是這種『過分的怪異性』的擬人化。在這一方面，也由於他常常採用寓意成分的緣故，所以彭·瓊生在他的俗生活喜劇中是道德劇的承繼者，在悲劇中，他也是如此（『賽揚的陷落』（Sejanus）），其中也結合着賽納卡的影響。

彭·瓊生和他的古典主義是莎士比亞的敵人，但是走他的路的劇作家是很多的。像約翰·福特（John Ford 1586—1649），他擷取他那深邃的心理來推動劇情的方法（歷史劇『貝金·華別克』），約翰·惠勃斯特（John Webster 1580?—1625?）在他那些陰沉沉的悲劇中，踏着莎士比亞的足跡，深入到犯罪心理中去。這些悲劇中，已經感覺到清教徒的偏執性（『馬爾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維多利亞·柯則博那』）。越接近清教徒的勝利，像麥生傑（184—1641）作品中那樣的道學氣息就越重。人物個性描寫和個性化語言的大師麥生傑是英吉利戲劇中第一部社會悲劇『奴隸』的作者。

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抒情成分和幻想成分，對於皮愈蒙特（F. Beaumont 1584—1116）與法萊契（J. Fletcher 1579—1925）這兩個和他同時代的作家的影響特別大。這兩個作家在當時頗爲風行，他們是共同合作的。他們的作品，在許多地方看來，已經是退步的東西。他們喪失了戲劇結構與主題發

展的藝術。伊麗莎白時代戲劇的特點：效果和情節的着重發展到了極頂，真實性完全不顧了（『馬爾泰武士』，『忠義者』和『華倫廷尼安』等等）。

## 六 莎士比亞

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在莎士比亞的創作中達到了它的最高點。莎士比亞這一個人物至今還是個謎。近年來，有一些算做是這一位生長在愛封河上的斯特拉福(Staford on Avon)城<sup>①</sup>的人所著的名作，有許多研究家認為是萊特倫伯爵(Earl Releud)所作。弗里契(B. M. Friche 1870-1928)<sup>②</sup>是接受這一個假定的，他在這偉大劇作家的創作中巧妙地發現了沒落貴族階級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貴族階級在凱旋的資產階級壓迫之下甚至於不得不沒落了。『莎士比亞就是萊特倫』，這一個非常有趣的假定是否能得到證實，這種分析的結論還是很有力量，所以莎士比亞是伊麗莎白時代戲劇最特出的代表作家。同時，他的先驅者和同時代者們的意義祇局限於英國境內，而莎士比亞從十八世紀起就成爲全世界的偉大詩人，對於全世界的文學起了巨大的影響。

伊麗莎白時代劇作家們的創作通常是有自己獨特的文藝的意義的，他們的創作完全不過是看劇場和觀眾的需要而定。但是莎士比亞一面納貢需要——而且非常豐富，同時他却又不是劇團的團員，非但是劇場機構的一部份，而且是自己立有特種藝術課題的詩人。他的課題之一是同時創造適合於題材和劇情的個別的性格和典型的性格。他常常改動原來的情節（例如『李爾王』(King Lear)），使它適應於他的人物性格的構思。正因為如此，所以這種構思是『自由而廣泛的』，是超出人物性格的處境和主導的情慾的界限的。莎士比亞的人物性格描寫得非常完整，不過這並不是由於戲劇的境遇(Situation)和形成這種境遇的性格的特點所需要而如此。莎士比亞的形象可以成爲『永久的形象』，他們可以脫離原來的情節而獨立存在，而且可以存在於各種不同的境遇中。莎士比亞的人物性格是完整的、具體的、而且是辯證的。他們是矛盾的統一。這種統一並不是固定的、靜止的，他們是在活的機構之中，是在馬克白、安東尼、哈姆雷特等人的發展的矛盾之中顯露出來的。而且不單是人物性格如此，而且莎士比亞的全部戲劇技術完全是傾向於描寫生活的辯證法則的：從文體的細節起——其中像『方法的愚魯』之類的對偶的辭句常常可以見到——還有這一類特點，像沒有交談瑣事的人

，以便創造他們大家所能把握的現實的印象，以至於像空間和時間這一類的戲劇的範疇——這在莎士比亞看來是相對的，是由劇情與體驗的強度所測定的。在他的劇本中，現在和過去不斷聯繫，現在彷彿是把過去引入劇情中去似的（例如，坦·勃林克曾經很細膩地指出，哈姆雷特的獨白[*To be or not to be*]是繼續它前面的思想的）。這構成一個連接不斷的水流似的劇情，構成一個不斷滋長的雪崩，迅速地向結局（catastrophe）衝去。

在理解喜劇性方面，莎士比亞也是忠於這一個觀點的，看了劇情的發展，使我們得到一個印象，莎士比亞所了解的喜劇性是依賴於那非常複雜與甚至於危險的境遇之上的。

完整地把握生活當作矛盾的統一來理解，同時從他這種見解之中產生了從悲劇性轉移向喜劇性，又由喜劇性回過來轉移向悲劇性的轉移過程，而並不是像他的先驅者們或者同時代者們那樣的把悲劇性和喜劇性加以混合或者機械地加以結合而已。悲劇性本身就是主人公性格的內在矛盾，而這種矛盾却是從這性格中產生而又把這性格破壞的（馬克白的野心）。

× × ×

在結束伊麗莎白時代戲劇概觀時，應該指出，假使說，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在它那富於民主主義性和通俗性的藝術形式中，也有着宮廷貴族藝術的成分，那末在它那富於貴族性的內容中，也是含着布爾喬亞的成分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傾向主要是表現在喜劇之中。彭·瓊生是嘲笑貴族的。梅森傑描寫的是宮廷貴族的否定方面。像我們所見，葛林在他的『威克斐田野看守人』中所推崇的是那拒絕接受騎士勳號的平常人。但是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也有所謂『俗生活的』（或者『家庭的』）悲劇（其德的劇本『非浮興來的阿爾登』[1592]，有不少時候算做是莎士比亞所作的『約克悲劇』[1608]）。這種樣式後來由湯麥斯·海和德(Thomas Heywood, 1570—1648) 福特(John Ford 1586—1639) 和德格爾(Thomas Dekker, 1570—1641) 等人繼續下去，——尤其是他們的劇本『勃里斯多商人』。這一種樣式是同情地描寫布爾喬亞生活的，已經預示着十八世紀英吉利『小市民戲劇』的出世了。

① 莎士比亞誕生和安葬的地方。

② 蘇聯藝術批評家。



## 七 莎士比亞時代的劇場形式

起初由流浪喜劇優伶的戲班子在旅店院子裏舉行的演出方法，無疑地是相應於莎士比亞時代的戲劇的。這種旅店院子的建築普通是如此：沿第二層樓一周，圍繞着露天的陽台，沿陽台一帶就是羅列着房間和房門口所在。流浪戲班子進了這樣的院子，就在院子裏的方牆的一面佈置舞台；觀眾則分佈在院子裏和陽台上。舞台用臺板擱在撐腳上搭成，臺板的一部份朝着露天的院子，另外後面一部份藏在陽台底下。陽台上掛下一個幕帷。這樣就構成了三個臺：前部的臺——在陽台之前，後部的臺——在陽台底下幕帷之後，上部的臺——舞臺頂上的陽台。這也就是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初葉英吉利劇場的過渡形式的基礎。

第一所固定的公共劇場是一五七六年梨園世家白貝琪家在倫敦設立的（準確些說，在倫敦市外，因為市內是禁止設立劇場的）。白貝琪劇場，——我們且稱它爲莎士比亞劇場或者伊麗莎白劇場——，還不知道有觀眾廳，而祇知道，有觀眾院子（yard），這是受了旅店院子的影響。這種沒有頂的露天的觀眾院子，圍繞着一層或者兩層樓座（gallery）。舞台是有頂的，而且也有着旅店院子舞台那樣的三個臺。

前部的舞台嵌入觀眾院子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觀眾院子稱爲『站立的正廳』（parterre），這一個名稱符其實地傳達出了這字的原意（parterre）——在地上。充滿在正廳中的民主主義部份的觀眾也密密層層地把戲台圍成一圈。比較有特權的貴族觀眾則分佈在戲台的邊沿上，有的躺着，有的坐在椅子上。這一個時期的劇場史所記載的總是這兩羣觀眾之間的仇恨和爭吵，有時候甚至於變成戰鬥。手藝人和工人觀眾對於貴族階級所懷抱的階級仇恨在這裏表現得相當熱鬧。我們現在觀眾廳裏所有的那種肅靜氣象，莎士比亞時代的劇場中是完全沒有的。

觀眾清楚地分成兩個不平等的部份。院子裏是圍住在舞台前部的羣衆。這是價錢便宜的座位，是沒有地方可坐的。這非但是劇場，而且也是俱樂部，大家在這裏議論當天發生的事情和政治新聞，而且在這裏吃東西和打紙牌。院子沒有頂，但是觀眾對於戲劇表演的興趣非常濃厚，天氣無論怎麼變化，也不能把觀眾驅散；有些人隨身帶午餐來，他們就在這裏喝酒、相罵、毆

鬥。舞台兩側沿牆一帶，蜿蜒着樓座，普通有三級，有可以坐的座位，這是給比較有錢的觀眾坐的。舞台旁邊有幾個給貴婦人坐的包廂。她們多蒙着面幕出現，因為院子裏的觀眾是放蕩不羈的，婦女們的害羞心會受到很大的試煉。有一部份『高貴』的觀眾爬到戲台上去，這裏有許多執椅子弟坐在椅子上，抽着烟，嬉謔取鬧着。貴婦人們和她們的男伴們的華麗的裝束和院子裏的骯髒的羣衆形成了激烈的對照。階級的仇恨表現得非常明顯。貴族們和院子裏吵嘴相罵。戲台上和院子裏的觀眾之間形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雙方面大家口出惡言，飛手杖，投擲吃過的骨頭，甚至於石頭。優伶差不多處身在觀眾中間。英吉利的劇場不知道像我們現代劇場中似乎是兩國世界那樣把劇場分成優伶和看客兩個部份。也許，劇場證明它所表現的社會階層的情況恐怕從來沒有像在文藝復興時代英吉利這樣的清晰吧了。

後部的舞台是用一個可以拉開的幕帷分隔開的。那地方通常表演親暱的場面（例如黛斯德蒙娜（Desdemona）的寢室），如果要立刻把劇情轉移到另外一處地方去，表示劇中人物到了新的環境中，也是在這地方表演的（例如：馬爾洛劇本『塔美朗』中有一段註出：『幕啓，席諾克拉姐躺在床上，塔美朗坐在她身邊。』，或者像莎士比亞『冬天的故事』中：『寶琳娜拉開幕帷，展露那像雕像似的站着的海米昂。』）。

前部的舞台是主要部份，用來表演當時戲劇中常常喜歡用到的行列、儀仗以及當時頗爲流行的擊劍場面（『哈姆雷特』最後一幕中的場面）。在正戲各場之間娛樂觀眾的小丑（clown）<sup>⊕</sup>，流浪歌手（jongleur），賣藝者（acrobat）等等也是在這地方表演的（莎士比亞時代的劇場中沒有幕間的休息（anticlax））。後來，莎士比亞時代的戲劇，經過文藝的修正改進之後，這些穿插在幕與幕之間的滑稽戲和打趣的對白，一部份也包括到印好的脚本中去。每一次演出必以傑克舞（Jack）作結，——這是由小丑表演的——一種輕快急速載歌載舞的舞蹈。哈姆雷特中兩個掘墓人所演的那一場戲，在莎士比亞時代本來是場滑稽戲，悲愴的成分是後來才添加進去的。莎士比亞

⊕ 莎士比亞悲劇『奧賽洛』中的主人公奧賽洛之妻。

⊕ 這裏所謂小丑，與我們中國舊戲中的丑角不同，他們祇以滑稽的言行取悅觀眾，常常與正戲毫無關係。





過的戲劇的題材的。譬如，『哈姆雷特』，『李爾王』等等。觀眾也不需要劇作者的名字。因此以致於弄到這種情形，寫好的劇本不過是演出的『基礎』而已，作者的原文可以在排演時隨意更改。丑角的台辭，作者常常用『丑白』的註釋來表示，丑角出場的內容委之於劇場去處理，或者由丑自己臨時措擬。作者把稿本賣給劇場之後，也不再對此提出任何要求和權利。由幾個作者共同迅速合作一個劇本的方法也非常流行。例如：由幾個人去創作悲劇的糾紛，幾個人去處理喜劇的部份，丑角的噱頭，由幾個人去描寫當時很風行的各種『恐怖』效果等等。十七世紀，到了這一個時代的末了，文學劇已經開始竄登舞台。『學院派』的作家，世俗的『業餘作家』和職業劇作家之間的隔離愈來愈小。文學作家們（像彭·瓊生）開始為劇場工作，劇場的劇作者們所出版的出品也逐漸逐漸多起來。

（上接廿八頁）

盾，亦遠不足以保證該項決議絲毫不折扣的見諸實施。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矛盾因素和時間因素相乘之積，將在該決議之前劃下一個不等號。

從上面的分析看來，德國民族雖然不致經歷歷史倒退的命運，但相當長期的停滯現象似乎是無可避免的。經濟上的停滯狀態與德國人所保留的意識上文化生活上的前進形態不相符合，其結果必然會在不久的將來喚起其鬥爭熱情。當德國人恢復了政治鬥爭的勇氣時，下面的幾種因素可能決定他們鬥爭的主要方向：第一，德國的經濟基礎被削弱，而其基本社會關係并未改變，這規定着她的未來政權必將曲折的走向西方列強政治附庸地位前進的道路（第一次大戰後斯特萊斯曼所採取的獨立政策，因另有其基礎，不能相提並論）；其次，堅決執行此項經濟削弱政策者為蘇聯，這便德國一般勞動人民參加鬥爭時，容易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而墜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獨斷宣傳中，其結果不啻是替類似於皮爾蘇斯基式的運動開闢道路。自然，除這兩項因素而外，未來國際局勢的發展也可能影響德國歷史的行程。總之，德國問題在歐洲的重要性今後無疑的會日益增長，耐心的爭取德國，應該是未來國際鬥爭的極關重要的關鍵之一。

一九四六年，五月。

昌言

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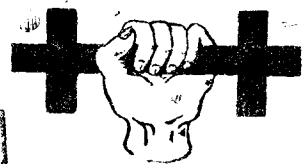
- 新戰爭在美國 非昔
- 當前我國的民主教育問題 傅彬然
- 周末幾個社會主義者的 反戰論 馬敘倫
- 論宗法 任銘善
- 人類身心後期之發展 秉志
- 喜劇的大無畏精神 李健吾
- 變 郭源新

第二期（六月出版）

行發社誌雜言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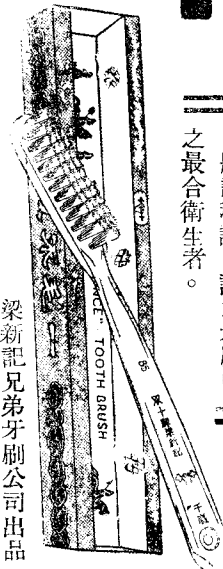
館書印祥永處：售經總

牌十雙



千歲牙刷

此刷牙堅硬。一毛不拔。並經熱度在五百度的新式蒸汽機消毒。常用刷牙。齒健壽長。歷蒙社會人士。題詞稱讚。許為牙刷中之最合衛生者。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各店均有代售

#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

英·C·考特威爾著  
朱維基譯

## 二 工業革命時期

### (一)

資產階級的幻覺現在達到了另一個階段，『工業革命』的階段，資本主義的『爆炸的』階段。現在資本主義的成長把一切田園式的，族長式的關係——包括詩人和那他替牠說出其企望的那個階級的關係在內——轉變為『硬結的』現金。

當然這並不使詩人把自己視為一個店主，把自己的詩視為乳酪。這麼想時，就忽視了幻覺和現實之間的關係的那種有酬報的和力學的性質。在事實上，牠所產生的却是相反的效果。牠的效果却使詩人逐漸把自己視為一個和社會脫離的人，視為一個只是實現自己的本能而對於社會的要求並不負責的個人主義者——這種要求不論是在一個市民的義務上，一個畏懼上帝者或是一個崇拜財神者。

這是資產階級矛盾的最後的爆炸運動。資產階級的幻覺已經搖蕩不定於對立物和對立物之間，但是由於這最後的終極運動之故，牠只能像一塊從爆炸的飛輪上拋出來的旋轉的五金一樣，完全從資產階級的思想範疇中走出。

由於十八世紀的讓步的結果，資產階級的經濟在作為手工業時代的特性的重重的保障和衛護底下，發展到一個階段，在這階段中因使用機器，蒸汽引擎和機械織機之故，資產階級的經濟獲得了一種自我擴展的巨大的力量。同時，『手工業工場』脫離了自己作為牠的附屬物的農場，而以一個更強大的反對力量的姿態向牠挑戰。

在另一方面，工廠裏面的有組織的勞動逐漸增加，在另一方面外在市場的個人式的無政府狀態也在增長。在一方面是一種逐漸增長的公共形式的生產，在另一方面則是一種逐漸增長的私人形式的佔奪。在一端是一個逐漸增長

的沒有土地和沒有工具的無產階級，在另一端是一個逐漸增長的有錢的資產階級。這個存在於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自我矛盾變成了『工業革命』的可怖的推動力。

資產階級發見了自己的革命的清教徒的自由的理想『趨於極端』，而回到了那似乎是永久的理性的商人式的良好趣味的讓步上去之後，牠現在又發見自己的心是對的，理性是錯的。

這首先表現於昔日有土地的貴族階級和工業的資產階級之間的一種裂痕上，這裂痕表示了工廠的崛起支配農場。有土地的貴族階級，以及牠為自己的成長所要求的限制，現在却遭遇到了工業資本及其要求。資本在機械和原料的外面的源泉中發見了一種取之不盡的自行擴展的力量。以前的形式不要說對牠有價值，却變為這麼許多的牽制。勞動力的費用可以安全地跌到真正的價值，因為機器用其競爭創造了要為牠盡力的無產階級。勞動力的真正價值轉而倚賴於麥的真正價值，麥的真正價值在殖民地和美國是低於英國，因為在那些地方牠包含較少的社會地必需的勞動。保障農業資本家的『五穀法令』故而是妨礙工業家的。他們在工資勞動短少的時期中讓了步的利益，現在受到了反對。一切反對這工業資產階級的自由擴展的形式和束縛一定要被粉碎。要做到這粉碎，資產階級就像在『清教徒革命』時代那樣，把一切其他的階級召集到自己的旗幟底下。牠宣稱替人民說話，以反抗壓迫者。牠要求『改良』和『五穀法令』的『廢止』。牠不是作為清教徒（美以美教徒）就是作為公然的懷疑者，來攻擊教會。牠攻擊一切的法律是限制平等的。牠提出了人本來是善的，生下來自由却到處受到束縛的這種概念，這種對於法律，繩墨，形式和傳統的既存系統的反叛，往往顯出一種心對於理性的反叛，一種情感和情操對於過去時代的頑固的形式主義和專制的反叛。瑪洛甫，雪萊，勞倫斯和達里在這里有相似點；他們各以一種切合於其時代的樣式來表現這種反叛。

我們不能瞭解詩歌的這個終極運動，除非我們瞭解資產階級在其變革自

己的基礎時，才每一步是革命的。但是他變革自己的基礎只是要使他成爲一貫地更爲資產階級式的。同樣地，每個重要的資產階級的詩人是革命的，可是他所表現出來的却正是使那矛盾更尖銳地顯出的那種運動，而他的革命的詩歌却正是對於這種矛盾的一個抗議。他們是『鏡中革命家』。他們企圖要在一面鏡子中達到一個目標，結果只是從那真正的對象離得更遠。而這個對象除了是作爲生產者和詩人的共同對象——即『自由』——之外，還有什麼呢？他們的悲劇和悲觀主義的力量就因這欲望的對象在他們上前去握住時却永遠退去而衰退。『沒有仁慈心的少女』把他們都奴役了起來。他們在冰冷的山脚邊醒來。

## (二)

勃萊克，拜倫，華茨華斯和雪萊各以不同的樣式，把這觀念的革命表現爲一種『浪漫主義的革命』。

拜倫是一個貴族——但是他是一個意識到作爲一個力量的他的階級的瓦解，以及走到資產階級那邊去的必要的貴族。因此就產生了他那種犬儒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混合。

這些背叛者在革命的時候是往往有用的也往往危險的聯盟者。他們的背叛自己的階級以及他們的歸附另一個階級，常常並不是怎樣一個的『對於整個歷史運動的理解』，却是一個對於由他們自己的階級的崩潰加在他們上面的妨害自由的環境的反叛，並且他們在一種自我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中奪取其階級的企圖，作爲他們私人戰鬥中的一種武器。他們往往是帶着強烈的裝姿態的成分的個人主義的，浪漫主義的人物。他們所要的是他們自己的階級的毀滅而不是另一個階級的興起，而這種興起變得顯明而且要求他們把他們對於將死的階級的僅僅破壞的仇恨變爲對於新興階級的一種建設的忠誠時，把他們在行動上假使不在言語上投回到敵人的懷抱中去。他們變爲反革命者。拜倫的死於密索則奇在任何這種完全的運動之前發生的，但是他準備在希臘却不在英國爲自由作戰，這是有重大意義的。在他裏面，心對於理性的反叛顯出爲英雄對於環境，對於道德，對於一切的『渺小』和因襲的反叛。這個『拜倫主義』是十分具有徵象的，而且在拜倫裏面牠包含着『一種完全的自私以及對於他人的感覺的完全的忽視，這也是具有徵象的。彌爾敦的撒但戴上了一種新的態度，一種要不高貴得多的，甚至於易怒的態度。』

拜倫作爲一個嘲笑者——作爲一個堂·詰阿德——最爲成功。在一方面做得犬儒主義風的，來嘲笑人類生存的滑稽劇，在另一方面做得傷感主義風的，來怨訴既存社會怎樣磨折了一個人的偉大的能力——這乃是『拜倫主義』的精髓。牠代表了貴族階級中的腐化也代表了一種對於貴族階級的反叛。這些人因此往往充滿着死亡思想；在最後的壕溝中作戰的法西斯主義的死亡思想，雅各派教徒的死亡思想；以一種英勇的死的光榮來辯護更可懷疑的一生。這些貴族會顯出同樣的秘密的死亡思想來，假使他們變爲革命的，做出轟轟烈烈的個人主義的英勇事蹟來——有時是不必要的，有時是有用的，但往往是浪漫主義的而且是隻手獨行的。他們超不過拼死的革命英雄的那種概念。

可是，雪萊顯出一種要真實得多的動力。他替在這歷史階段感到自己是社會的動力，故而不僅爲自己而且爲整個受苦的人類提出要求來的資產階級說話。在他們看來，只要他們能夠實現他們自己，那就是說，替他們自己的自由產生必要的條件，那末這就會自行保證大家的自由。雪萊相信他替一切的人，替一切的受苦者說話，叫他們去到一個更光明的將來。爲商業資本時代的鑄所束縛着的資產階級乃是竊火者普洛米修士，管理機器的資本家的適切的象徵。使他自由，世界就自由了。哥德文主義者的雪萊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使他墮落的乃是制度。雪萊是這個時代的資產階級的詩人中最革命的一個，因爲被釋放的普洛米修司並不是向過去的一個旅程，却是一個爲現在的革命綱領。牠和雪萊自己密切的參加他當時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相吻合。

雖然雪萊是一個無神論者，他並不是一個唯物論者。他是一個唯心論者。他的語彙是第一次有意識地唯心論的——那就是說，充滿着像『光明』，『真理』，『美』，『靈魂』，『太空』，『翅膀』，『昏暈』，『喘息』，『眞理』，『美』，『靈魂』，『太空』，『翅膀』，『昏暈』，『喘息』。這樣的引起全部不明的情緒的字眼。這樣的情意綜 (Complex) 由於牠們無數的情緒上的聯想，似乎使世界變成一個判然分明的具體的整體，雖然在事實上這樣的整體是不存在的，但是每個字眼代表不同的概念的一種。

這種理想主義反映了那種資產階級的信仰，就是一等到那妨礙一個人的既存的社會關係被粉碎了的時候，『自然的人就會實現出來』——他的情感，他的情緒，他的企望全會立刻體現爲物質的現實。雪萊看不到這些被粉碎的社會關係只能讓位給力能粉碎牠們的那個階級的社會關係，而且在任何

合上，這些情感，企望和情緒只是他存在於裏面的那些社會關係的產物，若要實現出牠們來，一種社會的行動是必要的，而這個行動要轉而影響一個人的情感，企望和情緒。

資產階級的幻覺在詩歌的範圍中，是一個反叛。在華茨華斯裏面，這反叛所取的形式是回返到自然的人，正好像雪萊所做的一樣。華茨華斯像雪萊那樣為法國的盧騷主義所深深地影響，追求『自然』中的自由，美——一切因其社會關係人所沒有的東西。法國大革命現在發生了。資產階級的要求自由現在帶上一種倒退的色彩。牠不再用反叛，却用回返到自然的人，去瞻望自由。

華茨華斯的『自然』當然是由於無窮年期的人類的工作而沒有野獸和危險的一種『自然』，詩人在裏面享受着舒適的進款，甚至於在他享受不為工業主義所『破壞』的自然風景時，也依工業主義的產物而生的一種『自然』。工業資本主義和農業資本主義的分裂現在把鄉間和城鎮分開了。工業主義中的分工制度使足夠的剩餘產物的存在成為可能，以維持一個詩人生活在克姆勃蘭的謹嚴的閑暇中。但是要看到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要看到文化，語言的天才和有閑乃是經濟活動的產物——要看到這點會戳破資產階級的幻覺而且暴露出『自然』詩歌的人工性。這種詩歌只有在人用了工業主義主宰了『自然』，而並不主宰了自己的那個時候，才可能發生。

故而華茨華斯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和雪萊不同，他倒退地反叛——但是仍舊用資產階級的方法——就是向社會的關係，即工業主義的特殊的社會關係要求自由，同時却保有着只有這些關係使其成為可能的產物，自由。

因此就有這樣的一種理論，就是『自然的』，就是說談話式的語言是較好的，故而比『人工的』，就是說文學的語言更為詩的。他却沒有看到這兩種語言是均等地人工的——那就是說，為了一個社會的目的——而且是均等地自然的，那就是說，是人和『自然』競爭的產物。牠們僅僅代表這個競爭的不同的範圍和階段，而且好壞不在牠們自身中，而在和這個競爭的關係中。華茨華斯的最壞的詩就在這理論的影響底下寫的。

華茨華斯的資產階級幻覺的形式和彌爾敦的，有一些近似的。他們兩人都把自然的人崇高化起來，彌爾敦使他成為清教徒的『精靈』的形式，華茨華斯使他成為無神論的『自然』的更詭辯的形式。一個把原始的亞當，另一個把原始的孩子當作人是天生無罪的證據。在一方面原來的罪惡，在另

一方面社會的關係說明了從神恩的墮落。所以他們兩人在有意識地高貴和超脫的時候，顯出他們最好的才力。可是，彌爾敦雖然反抗原始積累及其把帝王的天真的欲望和意志奉為神明，却並不像華茨華斯那樣地尊崇人裏面的，即自然的原本人裏面的曠野的本質。因此他避免了一種助成詩歌『降落』的技巧上的理論。

克茨是第一個大詩人感到詩人在這個資產階級幻覺的階段中作為自由市場的生產者的地位的緊張。華茨華斯有的是很少的進款；雪萊縱然往往在拮据之中，他是一個富家子，他的拮据完全是由於輕率，寬宏和不切實際，這往往是某種氣質對於一個富有的家庭的反動。但是克茨的出身却是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而且總是為錢的問題所煩惱，他的詩的出售對於他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所以在克茨，自由並不像華茨華斯那樣地在一種回返『自然』之中；他的回返『自然』總是伴隨着那種不舒服的憂慮，錢從那裏來呢？自由不能像雪萊那樣地在這個世界的關係的擺脫之中，因為僅僅形式上的自由依然要使那個人遇到謀生活的問題。所以克茨對於資產階級現實的較廣博的知識，使他達到這樣的一種地位，這地位決定了將來的資產階級詩歌的方針；作為一種逃避現實的『革命』。克茨是『浪漫復活運動』的執旗者。詩人現在張起『詩歌的迅速』翅膀『逃到一個傳奇的世界中去，逃到和那日常生活可憐，粗魯，現實的世界隔開的美和感官生活中去。感官生活使日常生活變得甘蜜，而用自己的美麗無聲地斥責牠。』

這個世界是拉彌亞替她的愛人或是『月亮』替安特芒建造的陰影的妖魔的世界。牠是海壁朗的有着金門的上界，是夜鶯，希臘古瓶，倍亞島的用字描繪的境界。這個另外的世界公然和現實的世對立起來。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這是在人間所知道的一切，也是你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而這世界往往為冷酷的現實所恫嚇，這現實以聖哲，敵對權力或日常生活的下賤力量的形態出現。依薩倍拉的愛的世界為兩個愛錢的兄弟所粉碎。甚至於聖安尼的前夜的狂野的美麗僅僅是暴風雨和暴風雨之間的一個插曲，一個從冰冷和黑暗的心中搶來的彩色的幻夢——最後的幾節宣示了腐朽的凱旋。『沒有仁慈心的少女』只是給她的騎士在醒來之前的一個短促的歡樂。盛放的羅勒花從依薩倍拉的愛人的腐爛的頭上發芽，而且為她的淚水所灌

濼。

幻想不能欺騙得那麼好

像她則名的那樣，感人的妖精！

這是一個幻象還是一個白晝的夢？

那音樂消逝了——我是醒着還是睡着？

像考且茲那樣，克茨迷惑地凝望詩歌的『新的世界』，却濛濛的黃金國土，創造出來以矯正舊的世界的平衡的，但是不論在裏面作多次的旅行，牠依然不過是一個幻想的世界。

一種新的語彙隨着克茨出現，將來的詩歌的左右一切的語彙。不是華茨華斯的語彙——因為牠並不乞靈於鄉間的沒有被破壞的純樸。不是雪萊的語彙——因為牠不乞靈於飄浮在現實的物質生活的面上而且能够像泡沫一樣地被撇去的『觀念』。鄉間是現實的物質世界的一部分，而這些玄學世界的泡沫是太不實質的，故而往往是產生牠的現實世界的提醒者。一定要造出這樣的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正因為更不現實是更現實的，而且有着足夠的內在的堅強帶着一種有效的妖法的自信力，來面對現實的世界。

不像華茨華斯和雪萊那樣地拿取被視為現實世界的最自然，最精靈或最美麗的部分，一個新的世界好像由一個鑲嵌的藝術家從字眼裏建造出來，所以這些字眼一定要有堅固性和現實性。克茨式的語彙是充滿着有一種像鑲嵌物那樣的堅硬的物質機構的字眼，但是一種『人工的』機構——全是紅色的，芬芳的，陳舊的，僵硬的寶石般的而且是反時代的。牠是像彌撒書的繪畫那樣生動。這個世界是逐漸地安置在封建制度的世界中，但牠不是一個封建的世界。牠是一個資產階級的世界——愛特式的建築以及在過去的封建制度下的資產階級的一切成長的生命和活力的世界。在這裏，詩的革命也有一種強烈的退化性質，正好像華茨華斯所有的那樣，但是為那最真正革命的詩人雪萊所沒有的。

資產階級在每次要求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社會關係的去除和更多的平等時，只是產生了更大的組織，更複雜的社會關係，更高級的托辣斯化和組合化，更多的不平等。可是這些矛盾運動的每一種却變革了他的基礎而產生了新的生產力。同樣地，在雪萊，華茨華斯和克茨的詩歌中所表現的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在牠的運動上是矛盾的，可是替詩歌產生了新的技巧而且變革了藝術的全部的工具。

這基本運動在許多方面是和那產生依里薩白時代的詩歌的原始積疊運動相符。因此在這時代的詩人中間有着對於莎士比亞和依里薩白時代詩人的一個興趣的復活。在依里薩白時代的詩歌裏所表現的原始個性的革命的爆發，有一種具體的姿態，因為牠是集中於那個具體的人物，君主上面的。在浪漫主義的詩歌裏，牠有着一種較為人工的態度，作為個人的人物，即『獨立的』資產階級者的情操和情緒的表現。詩歌和諸事分開，心和理知分開，個人和社會分開；一切是更人工，更分化和更複雜了。

詩人現在開始顯出商品生產的標徵了。在較後的日子，牠定為詩歌的方針時，我們還要進一步分析這個。在現在，最重要的徵象是克茨的話，就是他能够永遠寫詩，以後把他的詩燒去。詩已經變成了一個自身的目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去注意，從現在起悲劇的氣氛籠罩着一切值得稱為『偉大的』資產階級的詩歌。詩歌變成了悲觀主義的和自我尋苦惱的。拜倫，克茨和雪萊死得年輕。雖然普通以他們沒有寫出最好的作品而死去為遺憾，華茨華斯，史文朋和但尼生的例子十分清楚地顯出這並不是這樣，他們的死的個人的悲劇（在雪萊和拜倫的場合至少好像是自己去找來的）防止了資產階級幻覺的悲劇非個人地在他們的詩歌中表現出來。因為那保障資本主義運動的矛盾現在這麼迅速地展開出來，所以這矛盾把自己表現在一個詩人的一生命中而且往往是同樣的。詩人年青時代的熱烈的希望，企望，信仰都溶解了，不然就帶着一種僵硬性和頑固性在一個更變的現實前面重現出來，這種僵硬性和頑固性暴露了信仰的缺乏而且使他們成為他們年青時代的誠懇態度的一幅嘲笑的滑稽畫。固然，一切的人都變老而且失去他們年青時代的希望——但不是像這樣的。一個中年的索福克羅斯能够以深廣的成熟來說他的生命的悲劇，而且在八十歲時他寫了一篇反映智慧的變老的孩子張開眼睛的安詳。但是成熟的資產階級詩人是不能有悲劇或隱退的，只能有年青時代的信心的一種慘淡的重復——或者沉默。歷史的運動顯出了那矛盾的本相，可是迫使資產階級去依賴牠。從這時候起，那謊語走進了他的靈魂，使他的眼睛閉起來看不到必然性的意識，他就把自己的靈魂成爲奴隸。

在法國大革命時代，資產階級以自由，平等和四海皆兄弟之名，反抗了陳舊的社會關係。他們像雪萊那樣地宣稱爲全人類說話；於是資產階級要求自由，平等和四海皆兄弟的主張起先模糊地，後來有着不斷增長的明晰地起來了。且是巴這些其頁合與照筆皆及意思是度上那些呆章竟能皆改內存在以

及無產階級的剝削的條件。因此起初廣大天地用類的呼聲說出來的這要求自由的運動，往往停頓在這樣的一個階段上，在這階段中，資產階級不得不暴露出牠在詩歌中表現出的理想的結構，忘却牠爲人道說話而主張，而且打倒那個階級，這階級同樣的要求是和牠自己的存在不能相容的。一等到牠失去了大眾的支助時，革命的資產階級往往爲反動的力量擊回一個階段。雖然，這些力量得到了『一頓重重的教訓』，並不太過分地反對那顯出了他們的力量值的資產階級。他們聯合起來反對無產階級。接着是一種平衡，當資產階級背叛了他們的自由的議論，而且對於他們的理想的結構表示讓步，只有他們自己把他們鬥爭的理想的果實的一部分失落在更反動的力量手掌之中——假使這是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那末失落在封建的力量手掌之中，假使這是農業和工業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那末失落在擁有土地和大的財政力量的手掌之中。

那由於法國大革命的结果疾掃全歐洲的從羅俾斯比爾到『五執政內閣』以及反雅各教派的運動，就是這麼的一種運動。整個十九世紀是這同樣的背叛的記載，這在詩人的生活中把自己表現爲年青時代的理想主義的背叛。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以及一八七一年是使一切的資產階級詩人現在走華茨華斯的那條路的日子，他的革命的火由於法國大革命的最後階段的那種無產階級的內容，是突然變冷了，而且讓位給常識，身份，和虔誠。

是克茨寫了下面的詩行：  
 『沒有人能僭佔這高位』，那陰影回答，  
 『除了這入世的悲慘對於他們確是悲慘  
 而且決不讓他們休息的那些人們』。

資產階級詩人在這時代中的劫運，正是人世的悲慘，包括他們特殊的悲慘，不讓他們休息，可是時代的性質逼迫他們去支助那產生這悲慘來的階級。無產階級的革命還沒有進步到這樣的一個階段，在這階段中，『一些資產階級的觀念論者理解了整個歷史運動』，能够和牠聯盟起來，而且真正爲受苦的人類，爲一個現在是大多數，將來是全人類的階級說話。他們只是爲這樣的一個階級說話，這個階級是在不由自主地造成一個將來的世界，而且走一步就要退一步，牠又背叛自己的出於本能的企望，因爲牠有意識地知道這個牠在創造的將來的世界不能把自己包括在裏面。

# 本誌創刊號目錄

## 創辦宗旨

本社同人

撲朔迷離之東北問題  
 英內閣訪印團與印度問題  
 評 伊朗問題在安理會上的喜劇

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

△關於民主問題的意見▽

中國如何民主化

現階段的民主主義

怎樣實現民主政治

民主與特權

民主意見

印度尼西亞的命運

聯合國憲章與殖民地人民

古史辨的解毒劑

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

論古代希臘羅馬的戲劇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

論社會思想

中西文化不同的基礎

戰後世界婦女的動態及其前途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悲憤的歡笑(小說)

補

白

佛拉提米爾論中國的民主主義 一封表示憤懣不平的歷史信件  
 母系氏族怎樣移轉爲父系氏族 伊里奇論托爾斯泰思想的矛盾  
 眞與僞 社會的祕密 論實驗科學之生父

編輯室談話

編者

康君 孟元 鶴臯 陳人白

郭紹虞 李季 林漢達 胡山源 索非 竹雲龍 康君譯 李季 歐伯

盧靈著·冰夷譯 童止齋

唐虞世 碧雲 李毓鏞 謝少翁



#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續)

李毓鏞

## 二 電子的利用(電視與雷達等的說明)

一切電氣的現象，都是由於電子的活動而發生的。而在一切因電子活動而發生的現象之中，尤其以電子通過真空或空氣而發生的現象，更值得我們的注意。溯自工業時代的初期，一切包含電子通過空間的現象，除了弧光燈的弧光以外，不論是絕緣的擊穿，閃絡或是電暈等等，沒有不被人認為惱人而不可思議的事實。到了一八八三年，愛迪生因為研究燈泡發黑的理由，曾經把一段粗短的金屬絲，密封在一隻真空的燈泡內。這短絲和燈泡並不接觸，但是當兩絲和電池相接時，在二者之間，却有電流通過，可以用靈敏的電流計，而測量出來，這就是有名的愛迪生效應。愛迪生效應的原理，起初沒有人能夠解釋，一直到湯姆生爵士發見了電子以後，大家方纔知道，這就是因為電子在空間通過而發生的。一九〇四年，夫列明(J. A. Fleming)利用這一原理，設計了一種兩極管(diode)，可以有分別電流的功用。三年後，福累斯特(Lee de Forest)在兩極管的兩極之外，又加上一個柵極，以控制電子的行動。這一種發明，就奠定了現代電子學(electronics)的基礎。

我們根據原子構造的理論，知道電子在原子的周圍，被原子核的引力所束縛，是沒有足夠的動能，可以越出原子的界限的。但是在金屬的晶體中，因為原子和原子互相密接，所以有一部分電子，可以在原子的中間活動。不過在平常的狀態之下，這一種電子的活動，只限於物質的表面以內，假如要使其脫離表面，必須供給以相當的動能。把能供給於電子的方法，一共有三種，第一是增加物質的溫度，使電子發生熱發射。第二是用光照射物質，使電子發生光發射。第三是用加速的游子或電子，轟擊物質的表面，使電子發生二次發射。

利用電子通過空間，而替人類工作的裝置，目前一共有三大類。第一類是電子管，第二類是愛克斯光管。第三類是電子顯微鏡。

電子管就是在玻璃或金屬的管子中，密封兩個或兩個以上彼此絕緣的電

極，利用電子的活動，以完成某一種特殊工作的儀器。電子管的樣式很多，我們可以因為配置方式的不同，而分為許多種類。假使以陰極的性質來分，大部分的電子管，都是用熱發射的燈絲做陰極的，所以稱為熱游離(thermionic)管。只有極少數是用光發射陰極發射電子的光(photo)管。假使以管的虛實為標準，電子管又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管中的氣體，曾經抽氣機除去，直到所剩的空氣分子，不足以影響管內化學或電學的反應為止的，稱為高度真空管。反之如把管中的空氣抽去以後，重新實以指定的物質的，那就稱為充氣管。此外，我們也可以因為電極的多寡而稱為兩極管、三極管、四極管以及五極管的。現在市場上出售的電子管，不下數十種。最著名的商品名稱有空管(kenotron)、磁電管(magnetron)、整流管(rectron)、門管(thyatron)、新管(pilotron)、點火管(ignitron)等。

最簡單的熱游離高度真空管，就是俗稱為空管的兩極管。這一種兩極管，以燈絲為陰極，以板為陽極，利用愛迪生的原理而引導電流。假使用交流電供給於兩極管的時候，兩極管的板極忽正忽負。但僅當板極變正的一半情形之下，能夠發生電流，所以兩極管能夠轉變交流電為開歇的直流電。三極管在絲和板極之外，還有一個螺旋狀金屬絲所成的柵極，把絲極完全圍住。柵極的用處，就是控制電子。因為當柵極對絲極為負時，能夠排斥電子而阻止電子通過。反之若柵極對絲極為正時，却能加速電子的通過。所以在柵極的電路之中，只須加以極小的電能，就能控制大量的板流，這就是三極管所以能作為放大器的理由。四極管在控制用的柵極以外，還有一個屏極，以阻止板極上電壓的變化而影響到柵極電壓的變化。五極管在屏極之外，更多一個壓縮柵極，以便吸收過多的電子，還歸絲極，以免其轟擊板極，使板極發生二次電子發射。

真空管只能夠控制極小的電流。假使要控制大量的電流，必須應用充氣管。充氣管中充滿有氫、氫、氫、氫或汞的蒸汽，以便減低陰極的蒸發，使陰極忍受較高的溫度。至於管中的空氣，因為含有氧和水汽，足以影響陰極



的發射，所以在充氣之先必須除去。兩極的充氣管，又稱整流管，所根據的原理，和真空的兩極管相同。充氣的三極管叫門管。門管的柵極，是一種穿孔的金屬管而成。其和真空管的柵極所不同，就在於只能發動板極的電流，而不能控制電流。所以門管只能作為替續壓器，而不能作為放大器。引導電流能力最大的是汞池電子管。這一種電子管，由玻璃或鋼鐵製造而成，下端有一個充滿汞質的池。一面以供給電子，一面以供給蒸汽。汞池電子管以汞池為陰極，在汞池的反對方向裝置陽極，在陽極之外，又有一種發動陽極，用以燃點汞池，使汞池的表面，發生閃光的陰極點，而發射大量的電子。此外又有用特殊的點火器來發動陰極的，這就稱為點火管。

光管中最重要的就是光電管。光電管是一種兩極管。其中的陰極，係由金屬的表面鍍以感光的物質而成，能夠因為光的照射而發射電子。如果供給以適當的電壓，光電管就能因為光的照射而發生電流。但是這樣發生的電流，力量極為微弱，必須和三極管或門管連接，方纔可以控制較大的機件。

電子管在現代的工業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並且在未來的科學及工業上，還有未可限量的發展。電子管所以有這樣廣大的用途，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能完成一般機械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例如機械的測微計，至多只能測量到萬分之一吋。在顯微鏡下方纔可以看得見的顆粒是沒有一種機械的測微計，可以測量得出的。但是電子管卻能測量到百分之十。又如在電子計時器未發明以前，機械的能夠計算到萬分之一秒。但是電子計時器則可以測量到百萬分之一秒。再如在旋轉式的發電機中，旋轉的回數是必須隨頻率而增加而增加的。假使要用一隻十極的發電機來產生無線電機中所用最低頻率的交流電，每分鐘必須旋轉一二〇、〇〇〇次，要產生三百萬周率的交流電，必須旋轉三十六萬次。一隻旋轉式的發電機，假使真以這樣的速率而旋轉，結果一定至於碎裂而飛散。但是電子管中的振蕩器，却可以產生三百萬萬周以上的電波。電子管除了能完成一般機械不能完成的工作以外，並且反應迅速，久用不壞，而且只用極小的能，就可以控制大形的機械，都是遠非一般機件所能及的。

電子管在工業方面的用途，大略可以分為四方面來說。第一是計數和測量。例如在某一點通過的物體，可以用光電管來計數。顯微鏡下方纔看得見的顆粒的大小，工廠烟的厚薄，以及液體中維他命A的含量等等，都可以用光電管來測量。第二是檢別。例如光電管可以分別兩百萬種的顏色，又可以

檢別破碎的紙張。有一種電子管，可以使灰塵和除塵器帶不同的電荷，或者使漆和塗漆的表面帶不同的電荷，因而互相吸引。如此外，在煉礦場中，也可以用一種電子管使礦物和礦滓分離。第三是調整。例如許多化學反應中，反應的爐內，必須保持一定的溫度，這種溫度，就可以用新管來調整。又如在多數機器同時工作的工場中，還可以用門管控制，以便使運轉慢的機器加速而運轉快的機器減慢，而全體的機件，以一律的速率運行不息。此外，兩極管可以轉變交流電為直流電，門管及點火管可以焊接金屬，在工業上，更占有重要的位置。

電子管還有一種重要的用途就是傳導無線電。無線電的原理，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就已經發明，但是一直到電子管發明而經過改良以後，無線電的交通常業，方纔有長足的進步。無線電的機件，不外乎發送電臺和接收電臺的兩個部分。發送電臺包括一具發電兼調波的發送機和一具產生電磁輻射的天線。接收電臺，則由一具接收天線和一具接收機而成。接收天線是在發送天線磁場內的天線，而接收機則為把信號檢別，放大和還原的機件。在這兩種電臺之中，不論是發電、調波、放大、檢別和整流的工作，都由電子管來擔任，可見電子管在無線電技術上的重要性。最近在無線電方面最重要的進步，一共有三點，就是一、調頻 (frequency modulation, FM) 制的採用。

二、電視 (television) 的普及和改良。三、雷達 (radar, 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 的發明。

在無線電臺中所發的電波，每一秒鐘之間，振動在數十萬次以上，決不是我們的感覺器官所能辨別的。所以要用無線電波來傳送消息，必須把傳達的信號，附加在電波上面傳送。最簡單的傳送法，是藉鍵的作用，使電波發生或停止，而波本身却沒有改變的。但是要傳導聲音，必須有一種複雜的機件，把聲音的特性附加在電波之上，使電波發生變化。這一種改變電波的方法，就稱為調波 (modulation)。調波的方法，因為改變電波的那一種特質而分別為數種。在現在一般無線電臺，警務及海空軍所用的發送機中，調波的方法，係用微音器使電波的振幅，即高度改變，而頻率則保持固定的，這就稱為調幅制 (amplitude modulation, AM) 制。反之如改變電波的頻率而不改變電波的振幅，就稱為調頻制。

調頻制的發送機，和調幅制的發送機一樣，也有一個微音器。但是這一隻微音器要連接在振蕩電路的一個三極管上，以便因為聲音的大小，而改變

振蕩電路的電容。因為振蕩器發生的電磁振蕩，是因為電容的大小而改變其頻率的，所以頻率的大小，可以間接由於聲音的大小來決定。由這一種發送機所發的電波中，聲音的高低，就以頻率的大小，超過一個固定的大小或不及於一個固定的大小來表示。至在接收機中，一共有兩隻兩極管。一隻兩極管的電壓，能因頻率的增大而增加，而另一隻兩極管的電壓，則能隨頻率的減低而增加。電波中頻率的正負變化，經過這一番轉變以後，就可以振動微音器的鼓膜而使其發生原來的聲音。

調頻制最大的優點，是在於能去除了大電擾亂 (static) 的影響。擾亂的現象是天空中發生所謂天電擾亂，就是因為天空中發生電閃或北極光，或是我們應用愛克斯光、電氣剃刀、真空除塵器或是高壓的電線和樹枝接觸時所發生的電磁波。在一個調幅制的接收機中，這一種電波因為沒有一定的頻率，所以能干涉各個電臺的電波，並且因其常有很大的振幅，可以能發生巨大的噪聲。但是在調頻制的接收機中，當電波進入檢波器以前，先要經過一種限制器 (limiter)，或限制電路，一切振幅過大的波，都被裁去，所以不致發生噪聲，調頻制還有一個優點，是鄰近各電臺的干涉範圍很小。據工程師的計算，採用調頻制而可以接到清晰信號的面積，可以達到採用調幅制的相當面積的三十三倍。此外調頻制的發送機，能夠傳達不同的音色。低如屋博及大提琴的音，高如三角器和鑼鈸的音。都可以由於調頻制媒介，而傳達於聽眾。調頻制唯一的缺點，就是每一個電臺都需要很多的頻率，不像在調幅制中，每一個電臺只須占據一種頻率和鄰近數種頻率就夠。所以在現在一切電臺可以取用不竭的範圍，就是五〇〇到一六五〇仟周中間的各種頻率，在調頻制中，只够供數個電臺的應用，所以調頻制一旦通行之後，我們不得不開發高頻率的電波。

調頻制因為有不受干涉的特點，所以美國的警務和軍事當局，早已加以採用。並且美國的聯邦交通司 FCC 也曾規定電視中的傳音部分一律要改用此制。在這一次大戰結束以後，調頻法的應用一定要漸漸普遍，甚至可以代替今日的調幅制。

在人眼的網膜中，有無數的視神經纖維分布着。在同一的時間之內，可以傳達多數的信號，所以外界的景物，可以同时收入腦部的視覺中樞。但是在電路的發送和接收兩端，只有一條線路相連絡，所以在每一個單位的時間之內，只能夠傳達一個信號。假使要用電路來傳達全部的景物，必須依據一

定的次序，把物像分割為無數細小的單位，一一傳達到對方，再在對方把這些物像的單位，依據原來的次序，集合為原像。電視就是利用這一種原理來傳遞物像的裝置。不過為求物像的明晰起見，必須把全像分割為極多的單位。為使眼睛不覺得各像的隔斷起見，每秒鐘之內，至少要傳達十六個全像，這就是電視技術上最大的困難。在現代的電視中，每一個物像大約要分割為二萬單位，每秒鐘之內，要傳達三十個全像，就是在每秒鐘之內，一共要傳達六十萬單位。所以要完成這一種迅速的傳達，也非應用電子管不可。

用電路而傳達物像的理想，實在是在碩的光電性發見以後纔有的。碩的光電性，為一八七三年英國電報員邁 (Rae) 氏所發見，兩年以後，就有不少科學家發表各種電視的設計。不過在初期的各種設計中，都是用許多線路同時傳導一個物像的。自從一八八〇年，列布蘭克 (Maurice Leblanc) 提出分像的原理以後，始有科學家提議各種分像的方法。在各種分像的方法中，最簡單的是一八八四年尼卜口 (Paul Nipkow) 所提議的圓盤法。圓盤法中所用的器具，就是一個金屬的圓盤，上面穿一系列細孔，排列作螺旋狀。當圓盤在物像前面轉動時，從每一個孔中，各能透出一行的物像，直到全像劃分為多數線條為止。尼卜口的方法，流行的年代很久，一直到一九三〇年，還不失為一種通用的方法。至於合像的技術，起初也用圓盤法，直到一九〇七年，羅新 (Boris Rosins) 開始應用陰極線管來合像。次年美國的康貝爾斯文頓 (A. A. Campbell-Swinton) 主張在發送和接收的兩端都應採用電子管，這就是現代電視的雛型。不久歐洲發生戰事，電視的研究停頓，但是在大戰的期內，真空管放大器的改良，有一日千里的進步，所以到戰事結束，電視的研究，就更加發達了。一九一九年倍尼得 (J. L. Baird) 和近金 (C. F. Jenkins) 二人先後完成動像傳遞的試驗。一九二八年，歐美各國已經設立電臺，從事於電視的廣播。起初這些電臺僅能用機械的方法分像。後來在一九二九年，之伏利金 (V. K. Zworykin) 發明描像鏡 (iconoscope)，大家鑒於機械的分像法有許多缺點，就一律改用電子管的方法。

電視的收像器，好像一隻攝影機，用前方的透鏡，把物像集中在底片上。不過這一種底片，並不是尋常的底片，而是密封在描像鏡真空管中的一片金屬板。金屬板的前面，貼着一層雲母片，而在雲母片的前面，又散布有無數氧化鉍的顆粒。每一個顆粒各和鄰近的顆粒絕緣，所以每一個顆粒各和金屬板，造成一個電容器。當物像落在金屬板上的時候，每一個顆粒，就

因為受光強弱不同，而發生大小不一的電荷，於是原來的光像就在此時轉變為電像了。在電視的攝影機中，物像雖然是同時收到的，但必須經過分像的手續，再一點一點的發出來。分像的器具是描像鏡頸部的原子槍。原子槍就是一種熱發射的陰極，能夠發射一注尖銳的電子流，而達到金屬板。原子流的方向，由描像鏡頸外的兩對電磁石所支配，依照我們閱讀西書的次序，自左至右，自上至下，在板上的一行一行的掃描 (scan)。金屬板上的顆粒，當被原子槍掃到的時候，就把電荷放出，變成一道電流。這種電流經過數萬倍的放大，就由電波的攜帶而發散於空間內。電流的強弱，因為顆粒受光的強弱而決定。

這一種電波假使和接收天線相接觸，就由天線而進入接收機。接收機先把電波放大數千倍，然後再把電視的信號和聲音的信號分離，分離以後的電視信號再經過一二十倍的放大，然後通入陰極線管。陰極線管就是一個瓶狀的三極管，以管口處的陰極，發生一注電子流，直達瓶底的熒光屏上。因為陰極線的柵極，係受上述的電流所控制，所以電子流的強弱，就隨信號電流的強弱而變化。同時電子流的方向，受頸部兩對電磁石所左右，所以電子流在熒光屏上掃描的次序，完全和描像器中相符合。屏內面所塗的熒光性物質，能夠因為電子的轟擊而發光，光的強弱則隨電子流的強弱而決定，換句話說，就是依照原像上相當各點的光度而決定，所以熒光屏上，就發生和原像相同的像。這種像在每秒鐘之內，變換三十次，但一方面因為發光的物質，當刺激除去以後，還有繼續發光的特性，一方面因為人眼有留像的作用，所以在我們看來，絕沒有間斷的現象。

上面所說的電視，自然只以黑白兩色的為限，在五彩電影發明以後，電視也漸有向五彩方面發展的趨勢。五彩的電視，在一九二九年倍厄得和美國貝而電話實驗室的科學家，早已着手試驗。他們的方法，係用三隻分別的發送機，各各傳送一種原色，而在接收機中則用一組鏡子把三種色像再行集合，所以全部的機件，確是十二分的繁雜。最近亞列山大生 (Alexander) 和哥耳得馬刻 (Peter C. Goldmark) 所發明的方法，係在發送機中裝置一具急速旋轉的濾色盤，交互的把三種原色濾出，各各分別傳導。在接收機中也裝置着同樣的構造，以每一種濾色鏡傳達一種原色。三種原色的交互像，再由人眼的留像作用，使合而為一。

雷達原是用無線電來偵察測距的意思。我們用一種波動來偵察或測距，

由來已很久遠。例如軍事上常用的探海燈，就是利用光源發射一道光波，投射到空間之內，使空間內的物體，因為反射光波而被偵察者的肉眼所覺察的裝置。又如海底的深度是可以由海底反射的聲波來測量的，因為聲波在水中前進，有一定的速率，所以由聲音出發到回來的時間，可以計算出聲源和海底的距離。雷達所以能夠偵察和測距，其原理和上面所說的相同，不過不用光波和聲波，而用無線電波罷了。

最早注意到無線電的反射現象，可以有偵察用處的人，是美國海軍實驗室的退勤 (Alfred Hoyt Taylor) 和水 (Lea C. Young)。當他們在某河的兩岸傳送信號時，首先發見在河中經過的木船有擾亂電波的迹象。三年後，他們又發見物體的表面，能夠反射電波。同年英國亞普列頓 (Ed. V. Appleton) 爵士，因為探測電離層的高度，也發見同樣的現象。於是英美兩國，就在秘密之下，進行電波偵察器的研究，在雷達的研究過程中，最重要的發明要算是屋立分特 (Oliphant) 的空腔磁電管。因為這一種磁電管發明以後，雷達方纔能用微波來偵察，而雷達的靈敏度遂大為增加。

雷達的形式，可說是千變萬化，但是其基本的結構，總不外乎發送機和接收機的兩部。在雷達的發送機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共有三種機件，這就是磁電管、調制器 (modulator) 和導波器 (wave guide)。磁電管是一種真空的電子管，由一個中軸的陰極和一個圓筒狀的陽極中間，按輻射的方式，排列許多振蕩電路而成。由陰極發生的電子，在管作急速的旋轉，而發生高頻率的無線電波。調制器的功用是按一定的時間而開閉磁電管，使磁電管所發的波成為間歇的電脈衝。雷達中所用的微波，是不能用電線或共軸纜來傳導的，為減少消耗起見，必須用一種金屬管，就是導波器。導波器的原理，為四十年前類列 (Rayleigh) 男爵所發明。現在由於一種精妙的技術可以製成緩急不同的彎曲，使電波在轉灣抹角的地方，能夠作正確的反射。導波器的末端作喇叭狀，以便將波發散於空中。雷達的收發，既然是對着同一的目標，所以往往只備一具天綽，交互作發送和接收之用。天綽的形式，或作連串狀，或作拋物線鏡狀，因為雷達的種類而不同。

接收機中除了一般接收機中所必備的檢波放大各種器具以外，還有一具振蕩器，其功用為改變高頻率的電波為頻率較低的波。雷達和電視一樣，所得的消息，都是用陰極管來表示的。最進步的指示器，稱為平面地位指示器 (Plan position indicator, PPI)。平面指示器的熒光屏作圓形，以圓心代

表雷達的地位，在雷達周圍的物體，則由於離開雷達的距離不同，表現在圓心四周的各處地位上。假使爲便利視察或軍事上的籌劃起見，這種像又可以利用光學的方法放大，而讓在一個水平的玻璃板上。這一種裝置，就稱爲寫影器 (Kriation)。至於在上述的指示器中，只能夠顯示空間有沒有目標的存在，假使要辨別這一種目標是屬於友軍或敵軍，必須另有友敵鑑別器 (Identification Friend or foe, IFF)。友敵鑑別器的疑問器能夠發動友機或友艦上的通訊發送機，使通訊發送機自動發送一種特定的信號，通知雷達，而在雷達的另一個屏上表示化來。

至於雷達的原理，可以用美國海軍的二七一號機爲例。在這一種雷達中，用一種門管在每秒鐘之內發動調制器五百次，調制器受到門管的撥動，就發送一個負的平頂電脈衝，歷時兩微秒，由電線通到磁電管。磁電管在調制器開放的時間內，能發送三百萬周的電脈衝，由導波器導入天線，再由天線收集成一道光線，而發送到空中。當光線在空中進行的時候，假使和一種障礙物如飛機或兵艦相遇，就被障礙物反射回去。在反射的電波之中，有一部分重新達到雷達，被雷達的天線接收，於是天線進入接收器。反射的電波經過振蕩器改成六十萬周的波，再經過放大和整流的手續，就進入接收器的陰極線管，所帶的消息，在熒光屏上表現出來。

早期的雷達，不論是英國的鏈家 (Chain home, CH) 電臺或是美國信號兵隊的 SCR-170 號機，其功用都僅以偵察敵機的接近爲限。在一九四〇到四一年之間，英國爲抵抗德國的轟炸，又發明兩種空戰的雷達，就是地面攔擊式 (ground control interception, GCI) 的雷達和空攔擊式 (airborne interception, AI) 的雷達。在地面攔擊式的雷達中，工作人員用地面的雷達來偵察敵機和自方戰鬥機的行動，以便隨時把必要的信息，報告給自方的戰鬥機知道，直到戰鬥員看見敵機，開始加以攔擊爲止。空攔擊式的雷達，是一種輕便的裝置，可以安置在飛機上，以便戰鬥員自己加以使用。在軍事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雷達中，還有瞄準的雷達。在一種進步的瞄準雷達中，指導員用雷達得到位置，高度距離的報告，把這種報告一併供給於計算器。計算器參以風速、彈道、本艦速率等數據，最後決定了大砲傾斜度及信管的定時。不過在平常的砲彈中，都是用定時信管來引炸的，每發一彈，必須先計算從砲口到目標的距離。計算的時間大約要二到八秒，所以普通把信管先行定

因此爆炸。在這一種情形之下，因可信管往往不準時爆發，即使雷達能供給準確的報告，也不能夠收到百發百中的效果。美國爲補救這一種缺點起見，乃有變時 (Variable time, VT) 信管的發明。變時信管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信管頭部一架微小的無線電收發機。收發機得到電流的供給，就向四面發送電脈衝。假使電脈衝在空中遇見一種障礙物，就由障礙物反射而回，和所發的電脈衝，交織成一種錯雜的脈衝。假使障礙物和砲彈的距離在七〇呎以內，這錯雜的脈衝，就十分強大，經過接收機的放大，就可以發動一隻門管，而引起炸藥的爆炸。至於發電機中所用的電最初是用乾電池來供給的，但因乾電池的壽命很短，以致信管也不能夠長久保存，所以必須改用臨時配合的蓄電池。蓄電池的本體在一個圓筒的外面，砲彈出口時，信管中有一個玻璃的小瓶震裂，瓶子中所容的電解質就因爲砲彈旋轉的離心力，經過一重環狀的薄片而進入圓筒的外部，因此造成蓄電池。雷達除了在軍事上有上述各種主要的用途以外，在戰爭結束以後，還可以幫助研究天體、探測氣象、測量山高、探險荒地、測繪地圖、指示航行、保護船舶及飛機、及代替光電管。

一切的電子管，都以熱或光的輻射使電子發生運動，然後利用電子的運動而完成某項工作。但是在愛克斯光管中，是用極高的電壓使電子向陽極猛擊，因而發生輻射。情形却剛巧相反，早期的愛克斯光管，是一種不完全的真空管，所用的電子，係由剩餘氣體的游子，打擊冷的陰極而發生的。不過因剩餘氣體的份量不容易正確測定，所以愛克斯光也就難於控制。一九一三年，柯立治 (Wm. D. Coolidge) 發明一種高度真空的愛克斯光管。由加熱的燈絲發生電子，這就是現在所通用的愛克斯光管。在這一種愛克斯光管中，要得這強烈的愛克斯光，必須增高電壓，不過在電壓增高到八萬伏以上之後，就能使金屬發生二次發射，因而破壞儀器。據後來柯立治等的研究，這一種缺點，可以利用逐步加高電壓的方法來補救的。他們會根據這一種原理，設計了一種巨大的愛克斯光機，高達十數呎，占屋兩層多，可以發生電壓一百四十萬伏。一九四〇年寇斯特 (Kerst) 發明電子加速器 (Betatron) 把直線式的連續加壓改爲圓周式的連續加壓，設備的形體，就大爲縮小。電子加速器，共分磁石和真空管二部。磁石爲多數葉狀的砂鋼所製成，磁的極面在中間一個長方形的孔中。真空管作環狀，就安置於磁石的孔內，

流來加速電子，如以每秒得至七十億而論，其電壓可達三十萬伏，即可得到二百萬伏的電壓。

愛克斯光的應用，大略是根據下列三種原理：第一種是物質對於波長不同的波，有不同吸收係數。例如紅色的玻璃只能容許紅色的長波通過，而不能容許藍色的波通過。平常的玻璃，只能容許可見的光波通過，而不能容許紫外線通過，愛克斯光因為能通過一切柔軟的物質而不能穿過堅硬的物質，所以適合於檢查隱藏的缺點，如醫學上的診斷和工業上檢查鑄造物或焊接物的罅隙等。第二種是輻射能被重複排列的構造所分散的。不過排列的疏密，和波長有關。例如我們肉眼所見的光，可以用每吋一萬分格的格子來分散，但是愛克斯光必須要用更少小數千倍的格子來分散。這一種格子固然是人工可以繪得出來的，但是自然界的結晶，就是由分子整齊的排列而成的，能够分散愛克斯光。愛克斯光經結晶分散以後的花樣因為結晶的種類而不同，所以愛克斯光又可以做研究物質結構的工具。第三，一種波動所帶的量子，因為波長的大小不同，波長越小，所帶量子的能越大。能量大的量子，可以促進化學變化。醫學上用愛克斯光消除癌腫以及生物學上用愛克斯光促進突發就是利用這一種性質的例子。

最後還有一種電子的儀器，就是電子顯微鏡。在電子未發見以前，科學家已經知道陰極線可以由電場或磁場所偏轉，好像光線由三稜鏡所偏轉一樣，一個三稜鏡可以磨成集中光線的透鏡，電場和磁場，何以不能夠改變成能集中電子流集的器具呢？電子透鏡的理論，發源於一九二六年本許(Bunch)所發表的電子透鏡的理想。一九三四年德國諾耳(Knowl)和路斯加(E. Ruska)，首先完成電子顯微鏡的試驗。後來的電子顯微鏡又經過之伏利金的改良，方纔達到圓滿的成功。

電子顯微鏡的本體，是一個銅質的真空管，以頂端一個加熱的燈絲來供給電子，而以六萬伏的電壓，使電子加速下行。標本的厚度，不過十萬分之一吋，至少有一部分電子可以在標本中通過。鏡管中一共有三個線卷，第一個位在標本之上，以便把電子流集中於標本。第二個在標本之下，以集中標本通過的電子，而造成一個放大的像。最後一個線卷的功用，為集中這個像而造成一個放大的像，直徑比原來放大到二萬倍。最後的像映在熒光幕上，把電子係轉變為光像，或者映於底片，而把物像永久紀錄於底片上。

參考文獻：

- (7) Gaverly, D. P., A Primer of Electronics, McGraw-Hill, 1943.
- (8) Hudson, P. G. An Introduction to Electronics, MacMillan, 1945.
- (9) Gullikson, E. H., & Vedder, F. H., Industrial Electronics, Wiley, 1935.
- (10) Engineers, MIT, Applied Electronics, Wiley, 1943.
- (11) Jordan, & etc., Fundamentals of Radio, Prentice-Hall, 1944.
- (12) Robert H. W., Aviation Radio, Wm. Morrow, 1945.
- (13) Porterfield, J. & etc., We present Television, W. W. Norton, 1940.
- (14) Lohr, L. R.,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McGraw-Hill, 1940.
- (15) Funk, D. G., Radar Warfare, Elect., Oct., 1945.
- (16) Brookfield, S. J., Science in the Naval War., Disc., VI: 12pp. 363-73, 1945.

前期勘誤：

頁	欄	行	誤	正
六八	下	一八	於原子核	於中子
七〇	上	二一	子是	子又是
七〇	下	三	低的	低中子的
七二	上	二九	三年	三八年
七二	下	一六	數十	數千
七三	下	一〇	A Asset	A Human Asset
			5—	140—51

徵求各地通訊

關於各地人民生活情形及社會、政治、經濟狀態，本誌亟盼各地讀者忠實報告與確實暴露。來稿請寄南京路六六號本社編輯部。

# 大時代的小船

謝少翁

初秋的驟雨，從烏雲中向大地傾瀉，雨水帶着泥土，由河的兩岸注入。河面上，幾千萬雨滴所激起的小小的水圈，把原有的波浪遮蓋了。

兩岸，河面，空中，飄蕩着雨烟，十丈以外的景物，完全隱在雨烟的幕帳裏。

一葉小船，在雨烟中急駛向前。船頭上，小鴨子蹲着，留神探望前面有什麼東西，不時用全身的力量提高嗓子叫着：『噯！……』如果前面有船，就會得到一下相同的回聲，如果前面有座石橋，那麼經驗告訴他，自己的喊聲不完全同四野散開，總有一些留在前面，他們已經航到一座石橋附近了。

『噯！……』他一聲接着一聲喊着，忘記這是第幾十聲，也忘了已經穿過幾座橋，更不知道在驟雨中航了幾里。

雨太大了，風太猛了，小船在順流順風中急駛。大鴨子在把着舵，聽得弟弟的喊聲逐漸低弱，就用雄壯的聲調叫一聲：『喂！後面來！……』

弟弟先把身子往船肚裏一縮，然後把蓑衣笠帽放在船頭上，爬過船艙，接換哥哥的職司。

『噯！……』大鴨子的叫喊，又寬宏又嘹亮，他的經驗比弟弟豐富得多，聽覺視覺也十分優越，所以，小鴨子坐在後船上把舵，不費一些注意力，連後面的叫喊聲也不用留心了，因為哥哥的聽覺強過他幾倍。並且，哥哥還知道在什麼地方要轉灣，某處到某處一共幾里，過了幾座大石橋有一座小木橋……

鴨子媽媽在艙裏悶睡着，睡不着，也得躺着，緊閉上眼，傾聽着單調的風雨聲，船頭上的喊聲，船上的轉舵聲，船底的流水聲。鴨子媽媽有這麼兩個兒子，她十分地心滿意足。她守寡十五年，吃苦十五年，現在，大兒子二十五歲，小兒子十九歲，他們都能做工，肯聽話，不倔強，她真的以為自己在『享福』了，因為莊家橋鎮那個有名的王瞎子，總是這麼說：『喔！鴨子媽媽！你放心，你放心，你有二十年老來福好享！二十年！唔，二十年老

她現在已經相信自已確實是在『享福』了。她不再搖櫓，把舵，拉牽，只管些家常事，省力不少。她享福了，全鎮上的熟人，每一隻大船小船上的熟人，都知道她不像從前那樣苦了。

『大鴨子！過馬家橋沒有？』她在計算應該到那一個鎮上那一家店舖裏去買些晚飯米。

『過了三里多啦！』

『媽媽，今天在那兒靠岸過夜？』小的問。

『還是莊家橋熟識些。』

莊家橋鎮離馬家橋鎮七里半，順流順風的小船，不上半個鐘頭就到了。靠岸不久，雨停了，傍晚的虹彩，照得渾濁的河水有些紅紅的。大鴨子兄弟倆，脫下淋濕的上衣，絞了幾下，晾在蘆篷上，用水桶汲上些水，擦一擦身上的汗。紫黑色的臉，脖子，膀，背，胸膛，在虹彩的照耀下，反射出他們值得驕傲的壯健的光彩。

鴨子媽媽上岸買米，順便買些菜，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大家都知道，她在莊家橋鎮上已經五年多不欠任何店賬了。

今天他們剛從城裏回來，所以拉住她說閒話的人比往常多些。

『鴨子媽媽，今天城裏的杉木價錢怎麼啦？』她剛走過小木行，那木行老板趕出來問她。莊家橋鎮上的人都知道，她每次上城，總得問一問木價，這是她九年以來的習慣，尤其是近來，木價漲起一成多，急得她幾夜沒有好睡，因為木料一漲價，她離開造大船的日子又遠了。

『又漲了一成！』她在欺騙他，裝出一幅鬼臉。

『不會的吧？到底跌了沒有呢？』

『哈哈！還是跟前十天一樣。』她見到小木行老板哭中帶笑的臉，在哀求她，於是給他一個正確的回答。

九年了，她在小船中做了九年的大船夢。有了大船，她就得討媳婦，她

近了。

城裏那家大木行，在九年內，只見她問價錢，不見她買木頭，也習以為常。大老板對她，因此生出一種同情心，一種欽佩她毅力的尊敬心，他答應她，如果將來她要買木料造船，一定照市價打個八折。

九年的苦心積慮，換得一個八折優待的權利，睡大船艙的日子又近了十分之二。

可是，前幾個月，城裏謠傳着一個驚天動地的謠言，各種貨價因此漲價一成多。大家都說銀洋錢要給官廳收去了，以後祇許用鈔票；這一個謠言，如晴空的響雷，震撼她整個的生命。她的積蓄，都是鈔票，一旦鈔票不能換得銀洋錢，鈔票還算是鈔票嗎？還能買木料造大船嗎？還能討媳婦嗎？從那時起，她把全部鈔票陸續換了現洋錢，一場虛驚像已逝的東北風，它沒有帶來什麼災禍。祇是木價還沒有回跌。不過，木行老板曾經給她吃了第二顆定心丸，他說：『老婆婆，你以後不必來問價錢，我總是照前兩個月沒有漲價的價錢賣給你好了，另外再打個八折！』木行大老板真是個好心腸老板，她逢人便申述她九年『苦功』的收穫，和大老板的仁厚。

其實，今天的木價，確實漲了一成，她走過大木行時，是如此問價錢的：『今天跌價沒有？』

『沒有！』一位帳房先生回答的。

她今天有一件更大的『樂事』。城裏人說，從明天起，市面上祇准用鈔票了，銀洋錢要交給官廳去換鈔票。嚇！他們真以為鄉下人是木頭做的，連雪白的洋錢比花紙頭值錢也不懂嗎？蠢豬才白白把洋錢送上去換花紙頭呢！她慶幸自己的先見之明，為自己的命運欣喜；同時，在驕傲之中，包含着些幸災樂禍的成份。

在薄暮中，在天空與河面已變成灰黃色的當兒，母子三人吃飽了晚飯，聚在船身的前半部，指東劃西地閒談着。

水波上的天倫之樂，與陸上的人們是一樣的。

今天上城，把昨晚在蘆葦叢中捕得的黃雀，全部賣了，換到二塊半錢，她們都很高興。

別的船上點燈的時候，他們已經入睡了。

打短工，當大船的夥計，在碼頭上做搬夫，到榨油廠裏做扛夫，……。

他們的生活，可算是水陸兩棲的生活。他們倚賴水波的負托，自由自在地到處漂泊，他們的家在水波上，但他們的生活却大部份在陸地上。他們不懂詩意的生活或生活的詩意，但他們確實在富有詩意的大自然之一角。

他們是『船上人』。自由的人，水波上的鴨子。

那隻小船是二十年前造的，大鴨子的祖父拆產時，小鴨子還沒有出世，父子三人從大船移居到小船上。從那時起，夫妻倆就克勤克儉，一心一意要建造一隻大船，一則爭口氣，一則準備將來生兒育女，討媳婦養孫子。十五年前，老鴨子去世了，鴨子媽媽扶養十歲及四歲兩個兒子，每天在飢餓線上掙扎，每天在債堆裏爬行，常常母子三人對着空鍋子發怔。淚的洗禮，餓神的作難，命運之神的嘲弄，債主的迫榨，培養出母子三人善良的生活習慣與樸實耐苦奮發的性格。他們是真正的好人，自由的好人，水波上的好鴨子。

五年來，他們鑽出了債堆，那些狼狗似的債主，不再用吃人的眼光盯住他們，不再以拍賣小船——她們唯一的財產作威脅，不再用最無恥的言語向他們拋擲，不再像惡狗退逐乞丐一般每天在她們的後面追迫。現在，他們是真正的自由人了，昔日的狼狗，在取得最後一文利息以後，就變成怪客氣挺惹人愛的哈叭狗了。

現在，他們是真正自由的水波上的鴨子。

他兄弟倆不但名字叫鴨子，在河裏游泳，也像隻鴨子。夏天和初秋的當兒，如果他倆白天休息，總得到河裏玩上一二次，看見有漂亮的娘兒在航船的艙上把舵，說不定跟她們開玩笑，拉着舵，隨着航船向前浮游，抬頭從舵柱的空隙中瞅住她們，說說俏皮話，阻礙舵的轉動。有時，他們獲得善意的一笑；有時，她們把頭抬向天，臉頰通紅，不敢朝下看；有時，她們逃進船艙；有時，她們也作弄他們，倒一桶污水之類的東西下來，於是他們立刻鑽入水底，再浮上水面時，那娘兒在遠處得意地笑了；有時，船上的男人或老年人，發覺他們在調戲自己的妻女，用櫓尾及篙頭去打他們，鴨子們從沒有給打到，但總免不了給他們毒罵幾句，這可不算什麼，討些娘兒們的便宜，給人家罵幾句，總是合算的。可是，有時冤家狹路相逢，他們在航行的當兒給他們再發見了，艙艙船少不了吃上幾篙。

兄弟倆和別的『船上人』一樣，會罵人，會吵架，會擺狠架子，可是，



他倆很難得跟別人打架。

他們確實需要一個老婆，可是，沒有大船，就沒法討老婆，他們焦急着，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造大船呢？尤其是大鴨子，他時常問媽媽：『媽！還差多少可以造大船了呢？』

『差得遠呢！還差三百塊！』她也很焦急。

『造得小一點好啦！』大鴨子想早些結婚。

『不能！你爸爸說，我們一定得爭口氣，造一隻大船，同伯伯他們比個高低！我們的船要造得比他們的高大，要多一枝櫓，船頭要包鐵板的，桅杆要高過他們的五尺，我們的船艙要隔成三個房間，……』她又在喃喃地描畫着未來的大船。

這樣的談話，不知談過多少次，她的主張，絲毫沒有更改。兩個兒子，除了更努力工作及節約以外，沒有旁的辦法。

這時，鴨子媽媽有二百五十多塊銀洋儲蓄着，再有四五年的功夫，就能造大船了，娶媳婦了！歡愉的幻影，天天在腦海裏浮沉。

九年來，大船的幻影，在三個人的腦袋裏生下根，而舊的狹小的繡船，在不知不覺中老朽了，陳腐了。雖則離水修理過三四次，塗油，嵌油灰，換木料，重下水時也像一隻新船，可是，它的骨子老了，舊了，陳腐了，隔了不久，又現出破舊的樣子。

× × × × ×

月色由皎潔轉變為黯淡的時候，鴨子兄弟倆輕輕地把小船搖到湖邊。燃起一盞回光燈；穿一件又大又厚的夾襖；拿着兜捕黃雀的網斗，那網斗，是裝在一丈左右的竹竿上的；厚底草鞋紮得緊緊的，腰裏還掛着一雙草鞋，蘆根往往直刺進厚厚的草鞋，傷了他們的腳底；頭上戴着自己改造過的草帽，眼鼻前面有三個窟窿，其餘別的部份都包在草帽裏面，鋒利的蘆葉，有時還割破了眼皮和鼻尖；雙手的衣袖紮得很緊，套着特製的只有大姆指是分開的布手套；褲脚也綁得很牢，布襪子很厚，這樣就不怕毒蛇和吸血蟲的侵害。

兩個全副『武裝』的青年，抱着在生存線上決鬥的雄心，衝入繁密的蘆叢。彎着腰，在蘆叢中竄着，微弱的燈光，引來無數飛舞的小蟲，他倆不管這些小生命的行動，祇是一個人提着燈在蘆叢中開路，一個人拿着網斗在後躡行，有時，他們不得不爬，鑽，有時又可以站起來伸伸腰。

爬着，鑽着，行着，踏過新生的蘆芽，涉過高低不平的水潭，到處沒有路，到處都是新的等待開關的路。

拉長了聽覺在探測，何處有啾啾聲，張大了瞳孔在巡視，那兒有黃雀的影子。

爬着，走着，聽着，巡視着。湖水沒膝蓋了，再不敢向前走，祇好向左右兩方面繼續無窮的跋涉。

『嘩啦！』蘆叢中突然發出一種不平常的響聲。他們立刻把燈光熄滅，恐怕有傷人的野豬等等從穴中剛出來找食糧，恐怕有『打悶棍』的歹徒在蘆叢中等候着劫奪別人的衣箱和捕雀兒的工具，於是他們從胸口拉出兩柄匕首，等着，等着，等着。每一次，總是沒有什麼危險事情，但是，『船上人』的祖傳習慣，已把他們的神經練成富於防禦性的了。他們每逢有什麼特殊的聲音，以及特別的氣味，總十分小心，立刻準備抵抗。

隔了很久很久，他們又點亮回光燈，再鑽爬着。黃雀成羣地睡在蘆枝上，雙腳緊扣住蘆枝，不管風吹雨打，它們總是如此。

他倆從不交談，總是以手的動作傳達本人的意義，有時也從鼻子裏流出一聲『唔』。

今晚，他倆兜了好幾個圈子，找不到一隻黃雀，心裏焦急萬分，大鴨子不時從鼻子裏呼出憤氣，像一匹烈馬。

『啾啾啾……』一陣清風送來幾聲雀兒的夢中呻吟。直覺神經立刻叫他倆向左面東方竄去。

慢慢地爬，輕輕地鑽，緩緩地站起身，依稀的月光下，他倆像大貓兒似的在偷雀兒。起先，他們伸手捉着雀兒往大夾襖的胸部塞進去，以後，雀兒的慘鳴，喚醒了睡着的同伴，於是它們在空中亂飛，但總是在回光燈的光線所達到的範圍內飛旋着，兄弟倆立刻舉起網斗在空中兜捕。

一隻，二隻，三隻……

胸襟裏塞得飽飽的了，兩脚在水裏浸得冰冷，腰背開始痠痛，膀子，膀子，再也不能作強烈的動作，雙眼發昏，東方的天色，也有些灰白了。兄弟倆像打了勝仗的疲卒，從戰場上一蹶一拐地走回去。

鴨子媽媽站在船頭上等候，看見他倆從蘆叢中鑽出來，帶着笑問道：



『差不多！』兄弟倆同時回答。

『好了！你們睡一會兒吧，我把船撐至老地方去。』她像老看護婦一樣在安慰兒子。

二小時以後，太陽還沒有脫盡初升時的紅暈，小艙艙船又向城裏航駛了，他們得把黃昏時捕得的黃雀，在上午賣完，下午在船上瞌睡一會兒，再用力駛回去。

這幾天的黃雀不大肥嫩，賣不起錢，兩毛錢買五六隻，還說太貴。城裏人真沒有良心，別人拼了性命去捉來的黃雀，他們不過化一些小錢，就吃得滿口香香的，還說鄉下人狡猾，會討虛價。

這一天賣到三塊一毛錢，都是鈔票，再也換不到現洋錢了。鴨子媽媽四處打聽一下，洋錢用給他們可以的，他們付出來却不肯。嚇！城裏人真以為鄉下土老兒不懂事！她肚子裏在譏笑這些城裏人：『你們太聰明了！祇進不出，好手段！可惜騙不了我。』

走去問問木價：『今天跌了沒有？』

『沒有！』

『漲了沒有？』

『沒有！』

其實，昨天漲的一成，她不知道了。

欣然地在陽光的炫耀下，又回到老地方。

X X X X X

早稻登場了！四處在僱短工，捕黃雀太費力，又費時，兄弟倆又活躍在農場上了。

暮秋正午的陽光，雖沒有夏天的炎熱，還發揮出無限的熱力。白的路，黃的田，田野就是一塊鑲銀條的金地氈，碌碌奔跑的農夫，像金氈子上的螞蟻。

『噯呵！杭育！』

『噯呵！杭育！』

高昂的雄壯的樸實可愛的呼聲，從每一個負穀者的口中，帶着無限偉大的活力，散發出來，合成一支誘人的交響曲。

富家的曠場上，總有十幾個女工在打稻，她們和男工們的分別，僅僅是服裝方面的。那粗厚的手，闊大的腳，鋼鳴一般的語聲，健壯的姿態，有力

的動作，敏捷的舉止，……這一切，是樸素的農場上最樸素而美麗的羣像。

割稻是一件緩慢而費力的工作。男男女女，排着隊，彎下腰，右手的鐮刀，在稻根上掠過，發出『唱唱唱』的聲音，左手忙着把禾桿集成一束一束地，放它們在田裏。能力較差的人，跟着他們的背後照顧着，整理着。負禾的壯丁，是田野與打穀場之間的運輸者，鄉間沒有大路，沒有大的載重車。

在負禾隊裏，有些少年和壯婦，他們和她們，担子裝低些，步子也跨得小些，小鴨子就是其中之一。

『小鴨子！別給壓死了！』人們打趣着。

『哼！』他把鼻子一翹：『誰不是練出來的？你看我哥哥多有勁！過幾年我不也一樣嗎？』

真的，現在人人喜歡僱用鴨子兄弟倆，因他們的確能幹，迅速，不偷懶，有長力。

收穫期和耕種期一樣，他倆每天不愁沒有工作。一切農事，他倆全能幹：插秧，割稻麥，磨穀，堆草，上米，……。可是，他們是『船上人』，是外鄉人，在陸地上得不到一方土地可供居住，沒有祠堂可進，終年在水波上住宿着。他們已沒有家了，家就是河，河就是家。環境逼得他們每天在漂泊，不能在大地的任何一角，佔得一方小土地，定居下來，雖則他們是很好的農人，但他們不能是農人，祇能是『船上人』。

王瞎子的話是可怕的，他說：『你們命裏註定了，要生在水上，死在水上，發在水上，敗在水上。你們最好是做『船上人』，不要轉旁的念頭。』

王瞎子是先知，是當地獨一無二的『鐵嘴』，雖然有人罵他『噁死人』，可是，鴨子媽媽很相信他。

今年是豐年，鄉下財主的現洋錢也不肯付工錢了，穀價比去年反而賤些，城裏的東西却漲價，打短工的工錢，跟去年一樣，財主們早就在茶館裏商議好了，不加，做得起勁的有賞錢。這一套，是一個上海人想的法子。

今年別的東西都漲了，工錢不漲，祇好特別賣氣力，賺幾個賞錢貼補一下。鴨子兄弟倆因為工作過度，晚上常常發痲，有幾次脚筋抽得厲害，小鴨子哭了，媽媽見他如此可憐，讓他休息了兩天，大鴨子却從沒有停工。

多做一天工，多賺幾毛錢，離開造大船的日子又近了一些。

每天，豆大的汗珠，流着流着。食糧是耕者的血汗培養起來的，也是農人的血汗收穫起來的。

起早，摸夜，牛一樣負重，馬一般奔跑，老虎似的呼喊，家犬般的馴服。他倆埋頭工作，臉上終日掛着青春的活潑的微笑，從不說一句怨話，因為命運給他們『八個字』早已排定了生命應過的歷程。

稻田還原成灰白色的無邊的大地，金黃色的稻草，堆成房屋那麼高大的草堆，白白的米粒，從黃糠的保護中碾出來，壟積在財主的倉廩裏。

兄弟倆算一算，一共收到八十幾塊工錢，二十幾塊賞錢。托老爺爺的福，他倆沒有病倒，賣了幾十天氣力，換到一筆不小的錢，內心够快慰的了。冬季，他們有好多天閒着，三四個月的休養，把三四十天的勞損補好了。大鴨子常常說笑話：『他們秋收冬藏，我們秋瘦冬胖！哈哈。』露着板門大牙，引得他媽媽也笑呵呵地。除了打些輕微的短工，在冬天，他們在船上製造蘆花蒲鞋，有時也釣些魚，或則在晚上用『開弓』去捕黃鼠狼，那『開弓』，完全是竹料做成的，像一個竹弓，加裝一些活動竹片，有根粗繩操縱一塊開片。

他們的生活是自由的，活潑的，同時也是刻板的，艱苦的。一切都照常進行。今年的冬天，比去冬溫暖些，河中心從未結過冰，河邊上的冰也很薄，不傷船，更不會傷人。

『天照應我們呢！』大兒子對媽媽說。

『是的，我們祇有天老爺照顧！過年的時候，多叩幾個頭，多點一對大蠟燭。』她早就打算怎麼過年了。

一切都照常進行，但她們時常擔心遭遇什麼意外。一切都平平安安地艱苦地過去。

× × × × ×

過了年的春天，他們過得很平安，也很忙碌。

到夏天，有一陣驚天動地的謠言，從城裏傳下來，說要調查戶口了！住在陸上的不用說，住在船上的也得調查。這是什麼用意？抽壯丁當兵嗎？捐人頭稅嗎？莊家橋鎮的人惶惶不安，茶館裏面每天擠滿了人在談論着，不喝茶的人在門口看着，聽着。每一張臉是緊張的，鄉下老公公活了七八十年，也沒有碰到這麼嚴重的問題。那些平時專門喝茶打牌管人家閒事的『大先生』，在低聲地交談着，每天拿着鎮上僅有的幾份報紙，在研究着。在從前，拉夫是有的，是家常便飯，可是，這是『私的』。從前也會經謠傳過要調查

人口，可是，傳了幾天，大家就忘了這件事。今年不同了！報上登着大大的黑字，告訴大眾，官廳要調查人口了。謠言如暴雨之前的低氣壓，越來越使人覺得心坎裏塞着一塊石頭，鄉下的農民，似熱鍋上的螞蟻，無目的地四處嚷着聽着焦急着，祇有那些『大先生』們，默默無言，不慌不忙，有時上城裏去一趟，有時看看報，有時在茶館裏低聲交談着。

『大先生，真的要查查人口呢？會不會三丁抽一呢？有兩個兒子是不是要抽去一個呢？』鴨子媽媽有一天特地拜訪一位閩東先生，她從前在他家裏當過僕人，小鴨子在那裏也放過牛，論資主之誼，是很不錯的。

『嘿嘿！』皮笑肉不笑，『老奶奶，這是國家大事，你管他幹什麼呢！要抽大家抽，不抽大家不抽，你不用心慌。』

可是，她不相信這些話，她想：『你決不會抽你自己的兒子去當兵送死！人總是怕死的！』鄉下無權無勢的人們，在好多天的囂嚷中，大家『肚裏有數』，直覺指示他們：『調查人口的，就是那些在茶館裏低聲交談着的『吃過墨水的』人，他們是將來閩皇殿裏的判官。』她是可憐的『船上人』，更應該這樣地想着。

這天到大先生那裏探不出消息，心裏萬分慌張，母子三人在協議避免的辦法：開碼頭，送錢給『大先生』，苦苦哀求，少報一個，多報二十歲……。

人們天天在交頭接耳，在討論怎麼虛報，怎麼樣逃避，可是，一點也沒有用！大家世世代代在這鄉鎮的週圍活着的，他們有些人也去過上海，但有好多人從沒有到過五十里以外的地方，要逃也無從逃避。逃避的目的是求活，如果逃到別處倒反活不了，誰敢輕易滑腳？

那些敦厚的農民，他們很明白，如果由『大先生』們來調查人口，誰也不能虛報，因為『大先生』非但知道各人家裏有幾個人，還知道他們家裏有幾畝田，幾間屋子，幾隻豬，甚至他們家裏有多少放款或欠款……。「大先生」知道得太多了，如果他們到城裏縣官那裏一報告，誰也沒有辦法。

人人怕這一下子辣手，人人猜想他們要吃這一下辣手的虧，人人沒有辦法可想，等着，等着，像死囚等待最終的宣判。

二十多天在紛擾中溜過，人人所準備的那一天來了！

莊家橋鎮唯一的集會處所，是橋右不到百步的大茶館，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那裏解決的：大至人命案件，小至爭風吃醋，口角毆打。兩造或其他有關係的人，一走進大茶館，在文錫錫的『大先生』門面前，大家低聲和氣地

評着，又聚着「大先生」們的評判，你服了就能，不服也得服。天大的事走進大茶館都變成小事。「大先生」們慈悲為懷，方便為門，雖未曾受戒入教，但很懂道德，總是吃自己的飯，管人家的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

相反的說，如果大茶館裏拿些什麼事情出來，那就兩樣了，無事化小事，小事化大事。

幾十年來，那大茶館就像一個善變的魔宮，小的變大，大的變小，有的變無，無的變有，好的變壞，壞的變好。

昨天早晨，一羣「大先生」結着伴兒上城去，晚上回來，大家滿面春風。

「大先生，上城買東西的嗎？」快船老人在探消息。

「喔不！好玩的，好玩的！」回答是那樣捉摸不定。

有人猜想他們上城爲了那一家房產的事情去打官司，有人猜想他們在城裏合股開店（這天是大吉日），有人以爲他們買金條回來的，議論紛紛。

今天，「大先生」們一大早就集合在茶館裏，個個衣冠端正，穿着「出客」衣衫。

「大先生，又上城裏去嗎？」茶館老板向來是傳播消息最快的一個。

「喔不！」

一個多大的謎！可是他不敢多嘴追問。

中午，烈日當空，「大先生」們不回家吃飯。

「今天有大事了！」茶館老板是個晴雨表，他向別人發出這一聲警報。於是全鎮的人，不斷地故意在茶館門口來往着，探聽着。

「喂！阿福，告訴永義館劉三大，叫他做兩桌頂好頂好的酒席！」其中有一位年齡最長的對茶館老板說。

阿福把劉三大叫來，開菜單，報價錢，趕快奔回去親自動手。

正在那個時候，從貫通城裏的大道上，馳來十多個騎馬荷槍的兵，中間夾着一位不帶槍的文官。馬蹄鐵在街鎮的石路上嗒嗒作聲，引得滿街都是人頭。自從十年前北伐軍把騎馬的「敢兵」趕走以後，這街上就沒有鐵馬蹄響過。今天一定有大事了！

騎馬的人們，沿街問着：「大茶館在那兒？」

「在這面，我領你去！」好事之徒和頑童們奔向大茶館，他們以引路爲理由，可以走在馬隊前面。

看熱鬧的擠滿了街道，黑不到才幾隻的人影子，望一望城裏的馬也是好的。茶館裏在嚷着，茶館外在嚷着，街頭在嚷着，家家戶戶在嚷着。整個莊家橋鎮像隻沸騰的水壺，每一個水的原子在激烈運動着。

看熱鬧的祇見他們在大吃大喝，談笑風生，每一張臉給酒精燒得通紅。「城裏人到鄉下來吃東西，怪事！城裏儘有好的不吃，趕到這死鄉鎮來吃喝，你們說怪不怪？」一個看得不耐煩了。

「人家在談着要緊事情呢！你看那一疊疊的紙頭！」另一個插嘴。

看着，猜着，爭辯着，他們忘了肚子是空的，家裏還有事情要做。十幾個騎馬的兵和一位文官，到莊家橋鎮破舊的大茶館裏來大吃大喝，一羣「大先生」個個衣冠端整陪着，……這是一場太好看太有趣太值得記憶的人間戲劇，並且，這一場戲還沒有完結，好戲總在後面，誰肯放棄千載難逢的時機？不肯！

茶館老板阿福和兩個伙計，忙得滿頭大汗，發不出一點消息，並且他委實不知道今天他們談些什麼事情。

他們差不多吃完的時候，三個兵士拿着槍走出來，門外的人們以爲有「雞大腿」吃了，拼命四散開去，頓時紊亂得可怕，站在後面的人，見前面的人急急地倒退，以爲有亂子出了，馬上急忙地逃走，口裏嚷着：「拉夫了！拉夫了！快跑快跑！」

這純粹是一個誤會。但幾十年來，人民看見有武裝的兵士下鄉，好像魔鬼自天而降，總帶些災難給他們。人們習常地出奇地胆小。

那三個兵士，從腰眼的皮包裏拿出四五張大大的黃紙頭，站在馬背上用漿糊把黃紙貼在牆上。人民知道不是拉夫而是「貼皇榜」的時候，立刻又從到處集合攏來，識幾個字的在慢慢地唸着，解釋着，目不識丁的在一旁聽着。

「爲佈告，事案，奉，最高當局，命令，各縣，調查戶口，組織保甲，……」

「似道非通地讀着，立刻接着解釋：『這個意思就是說，要查人口了！』

「喂！皇榜上說要幾丁抽一？」

「慢！等我下去。」鄉下的識字人總有些「架子」，……茲，委派

，莊天生，爲德政鄉，鄉長，馬良寶，爲，副鄉長，莊福泰，莊仁根，劉元海，王榮慶，馬家駒，……等爲保長，限於十五日內，將全鄉戶口，清查完畢，希，該鄉居民，一體遵令，實報，毋違。切切，此令！」

「皇榜」好像一個大炸彈，薄薄的幾張紙，它的威力却不可估計。「要



一個月過去了，沒有什麼事，不過按戶抽了一點『救國捐』，納了一些『自衛捐』，別的什麼事也沒有。

不久，一個新的謠言又來了：『要打仗了！』

鄉下人很明白，打仗不是別的，祇是：拉夫，搶船，『借餉』，要花花娘，有時幾個人玩玩，讓荷槍的哈哈大笑一陣子，再不然就在晚上燒幾間房子玩玩，半個天通紅，花姑娘赤身露體地從烟火中逃入老爺們的懷抱中，有時打死幾條狗，練練槍法和眼光，有時隨手殺一隻鷄拿一瓶高粱喝。他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打仗』不過如此。至於誰打誰，誰勝，誰敗，他們從來不關心這些事。

隔了一個多月，聽說北京在打仗，不由得大家笑起來了。北京離開江蘇省的W縣，不知有幾千里，那兒打仗，跟莊家橋鎮的鄉下人毫無關係，大家這才放下心。

又隔了一個多月，聽說上海在打仗了，鄉下人有點驚慌，可是『大先生』們在茶館裏說：『不要緊，我保險不會打到我們莊家橋！五年前上海也打過一次，一個多月就講和了！』

一個多月過去了，講和的消息還是沒有。頭頂上飛機來往的次數每天在增加，城裏驚慌得一團糟。有一天，小豬的快班船上城，靠岸不一會兒，有幾隻飛機丟下十幾粒黑色的小小的東西，頓時聽得震耳的爆炸聲，烏黑的濃烟從城裏直往天空冒，這可壞了！兵隊沒有到，炸彈先來，這可壞了！鄉下人當天晚上知道這一件有關打仗的新花樣，帶着恐懼和好奇的口吻，談着關於炸彈的近乎神話的能力。有人說，一個炸彈的火力，有一畝田那麼大，有人說還不止，因為他親耳聽見小豬親口說的，十幾粒小小的炸彈，已經炸燬了半個城，人死了幾萬，……。

打仗的時候，整個世界就是個謠言的世界。鄉下人在謠言的大沙漠中，得不到一點真實的消息。有時一個正確的消息從城裏傳下來，通過幾張嘴再說出來，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每隔二三天，總有十多個學生，打着小旗子，用藍青官話向鄉下人演說，有時還演戲給鄉下人看，鄉下人不愛這些，耐心地等着，等着他們講完了或停演了，再包圍他們刺探消息，可是，每一次他們都說些假消息給鄉下人聽。

這樣的混沌世界，鄉下人各地窟中的困獸，見不到光明，尋不到出路。

秋季的收穫還不壞，什麼捐什麼稅一樣一樣加起來，數目也大得可怕，動亂時代，做人真不容易。今年從年初一起到現在，鴨子媽媽沒有增加積蓄，一家三口，不過勉強活着。

『噫！又打仗了！今年一個錢積不起來，真急死我啦！』她每天這樣嘆着。大船的影子又遠了！媳婦孫兒女的影子更消失得無影無蹤。十年來腦袋裏的幻像，給一陣一陣謠言的狂風吹走了。

× × × × ×

風聲很緊，『大先生』們向來在茶館裏閒逸地談笑，這幾天可不對了。他們的臉慌慌張張地，平時，他們的嘴吧很緊，現在，他們再也守不住胸中的恐懼。

人人知道局勢不好了，第一是敗兵要經過，接着就是那一套老花頭：要餉，要花花姑娘，要這個，要那個。臨走，總是船戶倒霉。把他們送到老遠老遠的地方，然後才慢慢地摸回來。

一個晴明的秋天的上午，一隻汽船拖着十幾隻『兵船』——滿載兵士的大木船，從大河的那一端衝駛下來，開到莊家橋鎮，解下一隻『兵船』，其餘的繼續向下駛去。

『兵船』一到，立刻招鄉長，莊老頭子不得不出面接洽。

一位營長模樣的軍官，隨帶着軍長的命令，叫各鄉各鎮集中所有的民船，供給軍隊運輸軍需。另外，附帶的說：『現在我們肚子餓了！』

所有莊家橋鎮上停泊的船隻，看見『兵船』一到，全部解纜起錨搖櫓想『開碼頭』，但他們都從下游倒退回來，那一邊的『兵船』，祇准民船向上往城裏航，小艙船可以往下航，但必須把肚丁留下來！

母子三人進退兩難，救了船，救不了人，如果連船帶人再航回去，救不了船，也救不了人。人，如果他或她要為自己而活命的時候，看見有什麼災難，總得逃避，母子三人不能例外，她們誰也不能離開誰，祇得轉舵回去。

月夜，小船又在河面上蠕動，想從一條小河逃到湖邊的蘆叢中去。雙槳輕輕地划着，河水發出細軟的潺潺聲，月影給搗成光白的碎片，在河中心動蕩。夜霧，並不十分濃，却帶些寒意。秋夜的风透過她們的夾衣，加劇她們由恐怖而起的寒顫。整個世界在睡着，除了波動的河水和月影。

『砰！砰！』裂碎了長空的鎗聲。

『媽的巴子！往那兒逃！』一聲粗暴的辱罵。



# 旅 途 隨 筆

## ——自重慶到上海——

蘇 閑

這隻木船停泊在荒山腳下的江岸了。

風，呼呼的叫嘯，爬過山嶺，奔馳在江面；江面掀起了波浪，後浪逐前浪的湧向岸邊，船更顛簸搖動起來。

『他媽的，拴緊牽繩啊！』甲長提高了嗓子喊。他正蹲立在船篷的上面，揮舞着他的右臂。岸邊，有三兩個圍白頭巾的搖夫用盡氣力的把牽繩圍繞在突起的石頭上。風更大了，岸上飛揚起塵砂，木船的搖擺更是厲害了。

『要鎮靜啊！各位！』一個長頭髮的工人站在船頭叫喊着。因了風的吹打，浪頭的衝擊，和乘客們忙亂的移動，木船要失掉平衡了。『要鎮靜啊，不要亂動！』這個長髮工人的叫喊，乘客們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他們仍然忙亂的擁擠的走下甲板來。一個戴瓜皮帽的小商人，或是因為太害怕的緣故，一不小心從甲板滑下水裏去，頓時在乘客中引起了一陣嚷喊叫。喧嚷聲的聲音淹沒了『要鎮靜啊』的叫喊。

這隻木船的乘客共有百餘人。在這些人當中，有工人·學生·公務人員·小學教師和軍人；有男的·女的·老的和小的。他們在抗戰的烽火的光輝下，跋山涉水的投奔祖國的大後方來。他們來自各方，有的住在長白山頭，有的住在吳淞江口，有的離家已近十年，有的別鄉也逾五載。人生的殘酷，世間的不平和變幻，他們是飽嘗夠了。他們牢騷滿腹，藉這乘船的餘暇，盡情的發洩着。他們從大事談到小事，在憤激衝擊着心頭的時候，常常拍胸叫罵起來。有的說抗戰的勝利是從天空掉

下來的，這樣的勝利簡直等於打跑了豺狼引進了猛虎，其結果仍受帝國主義的鯨吞蠶食；有的說中國的政治太黑暗，必須從下道上的澈底改造一番。有的說政府壓制人民起來摧毀日帝國主義及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有的說漢奸都應該完全槍斃，不應該改頭換面仍做大官；有的說貧富相差太厲害了，富者腰纏萬貫，貧者無立錐之地；有的說美國軍隊不應該幫助中國打內戰，蘇聯當局也不應該變相的佔領中國的旅順和大連；有的說投機商人像蛆一樣的各處鑽動，企圖大發復員財；有的說特務強姦了人家的妻子；有的說討老婆要有鈔票才行，有的則反駁說男女的結合必須理想的一致才能幸福；。他們議論紛紛，各說其是，好像自己的話在眾人面前宣佈是件極愉快的事；又好像爲了某種理由必須把自己的話在眾人面前宣佈似的。不管他們的議論怎樣的分歧，他們却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千萬不要發生意外的災難，要平安到達目的地。

這時，木船上的乘客們都湧上岸邊來。他們聚攏在一起交談着。江水的激盪，塵砂的飛揚，山野的荒涼和孩童在風聲裏的哭泣，使人們確實感到驚恐和惶惑了。夜已降臨。灰色的暮靄籠罩住山巒和山面，隔岸的山坡上，偶而傳來人的一兩聲溫長的叫喊。

『嚇人啊！那一輩子造了孽。』一個灰白頭髮的老太太顫抖的說。她的撫摸着胸口的右手哆嗦着。『山神奶奶保佑吧！』

『多麼荒涼的地方，簡直沒有人家。』一個穿黑色制服的青年人惶惑的張望着前面的景色，自言自語的說

。他是一個小學教師。「看！那面山頂上一個人在走動！」

乘客們都隨着小學教師手指的方向望過去。一個圍白頭巾穿長衫的人，在山頂上立住了腳跟望着下面的人羣。突然，他掉轉身體跑動了，漸漸的，他的身體沈沒在山頂的背面去。

『啊！土匪。』乘客們差不多同聲齊氣的叫喊起來。在乘客中引起了騷擾，恐懼籠罩了人們的心頭。

『把甲長喊來，問問他這地方的情形。』長頭髮的工人一面說，一面掃射了大家一眼。

『對！把他喊來。』人們都爭先恐後的說。『甲長，快點來。』

『他媽的，』甲長正對搭好船篷的搖夫們叫罵着。『啥子？就來。』他走上岸邊來，擠進人叢中。大家的眼光都望着他的臉。人們開始問起他這地方的情形。

『常常搶人，他媽的，兇得很！』他說到土匪搶人的事件時，聲音提得特別高，眼睛瞪得也特別大。

『該死的傢伙，你爲甚麼把船停在這鬼地方？』在人叢中有個青年責罵着甲長。他四年前聽說幹過憲兵。這責罵即刻在人叢中引起贊同的回響。

『各位，這不能怪我，他媽的，要不是風大，今天定會趕到×地了。』他邊說邊走出人叢，走上甲板去。人們望着他的背影。

『上船去！我們商量個防禦土匪的辦法，老是把罵沒有用的。』小學教師好像生氣似的說。

『對，商量個辦法。』長頭髮的工人贊同的說。

乘客們尾隨着走上甲板去。船仍然顛簸搖動着。夜色已濃，山巒和江面的界限已模糊不清。船艙內閃爍的微弱的燈光吸引了大家。

當乘客們各就其鋪位時，便開始了商量防禦土匪的辦法。這時，甲長站在船頭指桑罵槐的叫喊，搖夫們也常常哄然大笑一下。起初，大家雜亂的討論着。你說一句，他道一語，當有人站起來發表意見時，別人不等他說完便打斷了他的話，既然抓不住問題的核心，所以廢話說得太多了。這簡直是一個吵鬧的場所。時間是一秒鐘一秒鐘的跑過了，具體的辦法仍然沒有得出來。因為有人根本反對守夜，認為土匪來了，只要給他『打打交道』就夠了，而小學教師，長頭髮的工人及憲兵等，則堅決主張必須守夜，這樣可以事先知道土匪的到來，以便防備一下。雙方爭論了很長的時間，結果第二個意見獲得了勝利。

守夜既然確定了，但是極大多數的乘客都拒絕擔負守夜的工作。這是一個暫時聚集的團體，有甚麼力量能推使每個人來守夜呢？所以只好讓青年人自動的來守夜了。

『我算一個。安逸自在的先生們，你們也學資本家的習慣了：自己坐享其利，讓別人來工作。』長頭髮的工人揮了一下拳頭，生氣的說。

『我也算一個，請他們睡覺吧。』哈哈！憲兵半開玩笑半諷刺的說。

『凡是參加守夜的人，我們應分班輪流。』小學教師向參加守夜的人提議說。

守夜的近十人，他們馬上分成兩班。小學教師憲兵和長頭髮的工人分在第二班中。第一班的人拿着手電筒走上岸邊去了。當他們走過船頭時，有人蹣跚了睡覺的甲長的脚，他惡毒的『他媽的』罵了一聲。

船艙內是片刻的沈寂。外面的風仍然呼呼的吹着。這時，船艙內又恢復了騷擾。有人打開箱子清點東西，有人躺在鋪位上長聲短嘆，有人低聲交談着。小學

教師憲兵及長頭髮工人，他們在閃爍的微弱燈光下，邊喝酒邊談着。

他們首先估計土匪可能來搶劫這隻木船，并預先想像被搶劫時的種種可怕情況。他們都認為土匪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是在貧窮飢饉的基地上生長起來的。事實既是這樣的話，那麼所謂『良心』一類的東西是會拋擲到雲霄以外的。土匪常用『割鼻』，『剜眼』，『火灸』，『灌水』等刑罰來對付富人，藉此可以得到更多的財物；富人也採用同樣的手段來懲罰土匪。這是一種殘酷的鬥爭形式，在我們落後的中國，這種形式更帶有原始的殘暴性。他們川流不息的談着，都把自己所見所聞的有關土匪的事件傾吐出來。從他們的談話裏，我們可以窺見中國的災荒正普遍的展開，另一方面，土匪的生長也像雨後春筍似的增多起來。漸漸的，他們的談話便轉到對土匪的態度和怎樣解決土匪出路的問題上來。

『固然，他們沒有飯吃才幹土匪，可是他們的行為是下賤的。假定我四年前還當兵的話，我要把他們殺個痛快。是的，哈哈！殺個痛快。』憲兵邊喝酒邊提高了聲音說。

『老兄，你既然承認土匪沒有飯吃才幹土匪，你就不能夠說他們的行為是下賤的了。我是一個工人，譬如我們工人爲了生活的改善而罷工，好藉這罷工逼使資本家增加我們的工資，你能認爲我們的罷工是下賤嗎？我們認爲這是崇高的行為。如果在罷工鬥爭中，我們工人毀壞了機器，那只能說我們的行為不高明，而不能說下賤啊！』長頭髮的工人用手把他的散亂的長髮向後掠了一下，反駁的說。

『哈哈！是下賤，偷東西能說不下賤嗎？』

『地主敲剝農民的骨肉才是下賤哩！老兄。』

『哈哈！地主有自己的土地啊！你不要忘記這一點。』

『正因爲地主有自己的土地，所以才有了土匪。』小學教師沒有等長頭髮的工人開口反駁憲兵的話，便搶

先提出反駁的論據來。『正像你今晚所說的，四川七縣的一家地主真富，全縣的土地幾乎全歸他所有。這位地主向他的佃農收六七成的地租，穀倉數不清，他當然是富啊！可是佃農却窮透了。他們除向地主繳納苛重的地租外，還要納稅，當兵，并受鄉鎮長的種種無理剝削。他們真是骨瘦如柴，沒有站腳的地方。他們不願活活的餓死，所以有一部份人當了土匪。』

『這一部份人當然是下賤啊！哈哈！』

『你不應該這樣說，這一部份人如有吃飯的道路可走，他們也會走這道路麼，事實是沒有道路可走。現在中國遍地皆闢荒災，土匪問題在這災荒的推動下，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要解決這一問題，不是殺個痛快所能解決的，必須把土地問題解決，就是說，必須把地主的土地歸到農民手裏，要辦到這一點，則必須改變現社會制度的基礎了。』

『在四年前，聽了你這番話，我個人定要你吃官司。哈哈！請你不要介意，我現在是改邪歸正了。』憲兵瞪大了眼睛開玩笑似的說。

『我曉得你改邪歸正了，所以我才敢同你大談一陣。』小學教師半諷刺半致歉意的說。

『你不會要我吃官司吧，老兄？事實總是事實，土匪不能用槍殺光的。』長頭髮的工人又用右手把他的長頭髮向腦後掠了一下，惡意的說。

『不要談土匪問題，來，請痛飲一杯，哈哈。來，』憲兵解圍似的說。

『對岸山上有燈籠走下江邊來了。』一個守夜的青年人氣喘喘的說，他的身體嚇得有點發抖。

『天啊！』睡在鄰近鋪位的灰白頭髮的老太太祈禱起來了。

『不要慌張，把大家喊醒，小聲點！』長頭髮的工人鎮靜的說。說着，他同憲兵走出船艙去。

船艙內騷動起來，山上的燈籠走到對岸江邊去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完稿。



# 「勝利」在珠江

(廣州通訊)

劉朝眞

春天已話別了羊城，荔子飄紅又在陶醉着無數的嶺南人了。夏天，是南國住民底風情和生活最綺麗的日子，尤其在鄉村，綠波萬頃，紅紅的荔子點綴其間，多少人願爲這情景徘徊嚮往？而且，今年的夏天，是勝利後第一個荔子飄紅的季節。在情理，人們當是以狂歡來度過牠的。然而，一切都是不如意，人們正喘不過氣來，尤其是農民，因了今年的天氣特別亢旱，從春陽照到了大地以後，就沒見過一滴雨點。農民們對着田地流淚，他們付出了更大的勞動，希望這塊田地有所收穫；但有資格這樣希望的，只是三角洲一帶的農民。因爲他們底田地，對於水的灌溉，較爲便利；其他高地的山田，惟有望雲興嘆。四月末才開始降下的雨水，雖然挽救了一部份田地，但總不能消除旱災的陰影！米價也並不因久旱逢甘霖而下跌，反而繼續上升，廣州曾突破了十萬元，而產米區的中山也突破了八萬元，現在才降回五萬元。

戰爭給與農村的破壞，較之城市更爲厲害。人們以爲戰爭之後，因爲米的珍貴，農民底生活當然是優裕了。是的，戰爭造成了不少農村暴發戶，但更造成了無數的貧農無產者。只有大地主和高利貸，生活才能豐裕，其他自耕農和佃農，却是在重重的壓迫下喘息着。他們爲了支付田租，捐稅，和開耕的一切費用，出盡他們所收穫的也不能支付這些重大的負擔，因而，高利貸者的鐵鍊，更緊緊的縛着農民底身心。在農村，高利貸者是最刻薄的，農民向他借一百斤穀，收穫時便要還給他二百斤，還要拿田契或屋契來作抵押。農具和肥料既在漲價，地主也要提高租值，而政府還不斷的以軍穀啦！捐稅啦！來吮農民的血。農民便是在這樣重重的盤剝底下喘息着。而政府的農貸，也不知貸到那裏去了！要農民

交軍穀和稅捐的佈告，宛如十二金牌密密煩，隨處可見；而農貸佈告呢？不但片紙沒出現在街上，連隻字也不見在報端。

與農民底命運一樣的，便是城市中的勞動羣衆。他們是最懇切地期望勝利歸來，也是最熱烈地迎接勝利歸來的。他們寄與勝利後的國家以無窮的希望。然而，他們也是最先破滅了希望的人羣，而且是破滅得最悲慘的人羣。日帝崩潰的消息由以太傳播了以後，工人們便相信着一個活潑的日子快到了，雖然工廠關閉了，他們已失業，但他們相信這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但是從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後，他們等待了一日又一日，一月又一月，半年過去了，希望終於成了泡影。報紙印着的、人們傳述着的、對於他們有利的傳說或諾言，通通成了不兌現的支票。於是他們徬徨着，失業和物價高漲緊緊地威脅着他們！人們說，淪陷區的人民是「僞人」，因此，他們底失業更被加多了一重口實。而不是「僞人」的勞動者，也從四面八方湧到廣州來。據去年十一月的計算，從韶關方面到廣州來的機器工人，便有七千名，而失業的佔了四分之三以上。只有印刷工人在勝利後的四個月內，曾走上了印刷業的黃金時代，他們是求過於供；那時，一般職業的工資都比不上他們。但是好景不常，在限制了全市半數的報紙出版後，他們便又大部失業了。這一大批失業工人，由今年二月起，因了香港工業的逐步恢復，才又大批的湧到香港去。

香港的勞工，現在每日的工資約爲四元至六元，每日的工作時間是八小時，而對於勞工保護，也算有明文的规定，這已比廣州工人好得多。廣州工人的工資，大約除了個人每月的膳費外，所餘的僅是二萬元左右，而對於職業和身體更是絲毫沒有保障，至於工作時間，普

通是九小時，有些印刷工場竟是十小時至十一小時，而且，對於工作時間的延長，是無限制的。這方法對於老板是省下不少錢，而工人也多些收入。但這却是給與工人階級一個很大的破壞。因爲這樣一來，一方面剝奪了失業工人的工作機會，另一方面損害了在業工人的健康，和受教育的權利，再其次，使失業這個陰影更嚴重的威脅着工人，使他們之間互相傾軋。

隨勝利的陽光照耀在五羊城裏的，便是民族文化的活躍。去年八月十五日，第七戰區屬下的挺進隊，共產黨的東江縱隊，和所謂軍委會直轄的先遣軍所發出的傳單便飛滿街頭，而代替了日本的東亞文化，跟着報紙便如雨後春筍似的，先後出版了廿餘家，這些多是接收了某些附敵報社而出版的。文壇的活躍和刊物的繁多是空前的。人們正在提議將廣州市建設成爲一個文化城，而出版自由已在日常被屈服後的中國，遭受到第一次的試驗了，那就是十餘家報紙的奉令停刊，理由是由他們未取得「合法登記」。冷水冰凍了很多人心。

但是，流浪的文化人已從四面八方回到他們底搖籃地；而香港也已確定了主人和開始了它底生活。香港是特殊的，因了這個特殊，文化人便匯流到了太平山下。「文化城」也給搬出了洋。

廣州底刊物是同花撲克，而香港的則是雜花牌；廣州的出版物比之香港大約少了一半，而且他們的銷路也相當可憐。雜誌在書店裏往往擺到殘舊了，再換上一期新的，但是那些前進的刊物，青年們都爭相購閱，霎時便告售罄；因此，政府當局便大發雷霆，密令各地書局禁止售賣「共產黨刊物」。這是一個書店影射告誡筆者的。至於被稱爲共產黨文化機關的，如廣州的華商報分社，立報分社，兄弟圖書公司等也遭受到搗毀。唉！可

談的民主自由！

勝利後復員和建設，是讀教者的中心題目。但是，香港和廣州相差得太遠了；單從水電兩者來說，香港是晝夜供電，食水因為氣候亢旱才每日開放十三小時；而廣州呢，電燈像多雲的夜空中底星兒，自來水則難於有水來。記得廣州出版的原子能半週刊，曾以墨黑一團來表示廣州之夜，事實上廣州的一切都是墨黑一團。人們早就說過，廣州市是電話不靈，電燈不明，自來水不淨，馬路不平，這現象直維持到今天，而且是越弄越糟

。廣州人也在無可奈何中生活着，因為他們知道，廣度工業有如一隻垂死的牛，拉着載重的貨車，在凹凸不平的馬路上走着啊！至於那些建設用的天文數字的款項，人們更是不敢多問而且也不能夠知道的。

南國的原野生長着奇花異草，筆者一個人也難於一一詳細記述，但需要寫的太多了，新奇的事也太多了，相信將有很多人加以逐一詳細的報導的。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寄自羊城

## 本誌優待閱戶啟事

本誌創刊以來，迭承遠近各地讀者，來函徵詢長期訂閱辦法。祇因物價起跌不定，影響成本每期不同，致本誌全年定閱辦法，暫難訂定。茲為酬答各方雅意起見，特別訂出優待閱戶辦法如下：

- 一、請先匯付三千元或五千元，開立『訂戶』；款盡，再行通知。
- 二、照每期定價七折優待。
- 三、郵寄分『普通』『航快』兩種，訂閱時請為註明。所需寄費，照實列入『訂戶』項下。
- 四、訂閱函件或匯款，俱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本誌發行部收。

附註：如因匯款不便，郵票代替，十足通用。

## 求真雜誌社啟

### 編後餘談

本期比之創刊號的內容，顯然有些地方是值得一談的。例如，上期末及刊載戰後經濟政治問題的專論，和較有系統地研究民主問題的著作，但在本期，却承陳人白先生為本誌撰著近二萬言的『論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西岑先生從遠方寄來『波茨坦會議與德國問題』；劉少嚴先生逐譯『戰後蘇聯之經濟』；竹雲龍先生寫作『戰後世界經濟特徵』，這使上期不足之處，充實起來了。

而特別值得我們興奮的是；李季先生和歐伯先生對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不啻使沉寂已久的中國學術界，喚起了勇敢進取的批評精神。歡迎『公開討論』！歡迎『自由批評』！這就是本誌的基本態度和立場。我們竭誠希望各界讀者，學者，專家們，都踴躍發表卓見，展開熱烈的論戰，為思想學術史創造新的一頁！

# 投稿簡章

- 一、本誌宗旨在發揚自由研究學術之精神，故採取絕對公開態度——凡關於各種學術思想：如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理論等，以及中國歷史發展法則，中國社會經濟性質，農業經濟，土地問題，各國社會政治經濟史及其現狀之研究並文藝作品等均所歡迎。
- 二、賜稿請以一萬字為限。如有必要須超過此限度者，請先向本社接洽。
- 三、賜稿務必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譯稿請附原文或指明出處。
- 四、稿費概用現金。從優奉酬。
- 五、凡稿件本社在必要時，有權修改。如不欲修改者，請在稿末註明。
- 六、來稿經本誌揭載後，版權即為本誌所有。作者如欲保留版權，請預先聲明。但本誌將來出版彙刊時，仍得採入。
- 七、稿末務請註明最近通訊處。
- 八、來稿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

#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日出版

本期定價一千五百元

編輯者 求真雜誌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上海南京路六六號 求真雜誌社

印刷者 上海中正路六四九號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總經理處 上海山東路二二二號 五洲書報社

△不許轉載▽

##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地位	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超等	封底之外面	十二萬元	七萬元	
特等	封面之裏及正文首篇之前	十萬元	五萬元	
普通	正文之後	五萬元	三萬元	一萬八千元

- 一 廣告費請先惠付
- 二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價目另議
- 三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總製造廠

延平路南姚橋浜 23 號  
電話 三二一七八號



總管理處

南京路五六二號  
電話 九一〇六四號

大安襪衫

博大鞋廠出品



Bob shoes  
for comfort & for quality

經售處

南京路五六二號  
中國內衣公司  
南京西路七五三號  
第五街公司